舍斯托夫文集

张冰 主编

第3卷

Лев Шесто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НИТШЕ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悲剧哲学

张杰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舍斯托夫文集 第3卷

张冰 主编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НИЦШЕ



Лев Шестов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悲剧哲学

张杰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舍斯托夫文集.第3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俄罗斯)列夫·舍斯托夫著;张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6627-0

Ⅰ.①舍… Ⅱ.①列… ②张… Ⅲ.①舍斯托夫—文集 ②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 Fyodor Mikhailovich 1821—1881)—哲学思想 ③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哲学思想 Ⅳ.①B512.59-53 ②B512.49 ③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5230号

舍斯托夫文集
第3卷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悲剧哲学
张杰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6627-0

2019年7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1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7⅛

定价:36.00元

Лев Шесто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НИТШЕ

Философия трагедии

Фот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ереиздание с первого издания

本书根据圣彼得堡 M. M. 斯塔修列维奇出版社 1903 年第一版译出

《舍斯托夫文集》总序

列夫・舍斯托夫(Лев Исаакович Шестов,1866—1938),原名耶古达・莱布・施瓦尔茨曼(Иегуда Лейб Шварцман),是伟大的俄国哲学家,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和奠基者,白银时代俄国文化杰出代表之一。

20世纪俄国哲学被誉为给世界思想界的"一件礼物",而列夫・舍斯托夫是20世纪俄国哲学的"头把交椅"或"第一小提琴手"。在追溯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思想经由欧洲各国首都等侨居地城市向欧洲思想界渗透、逐渐被吸纳并与之产生深刻共鸣的全过程时,如果缺少了对于列夫・舍斯托夫思想的研究,那将是残缺不全的。列夫・舍斯托夫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国哲学家",对于世界哲学文学界产生了持续而又深远的影响。在欧洲,他是名副其实的"存在主义之父",同时早在生前就被公认为俄国文坛从象征主义问世以来所有俄国现代派的"祖师爷"和"思想前驱"。

1866年1月31日(俄历2月12日),舍斯托夫出生于基辅一个商人家庭,父亲伊萨克・莫伊谢耶维奇・施瓦尔茨曼(1832—1914)系大工厂主兼一级商人,母亲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娘家姓什列伊别尔,1845—1934)系其父第二个妻子。其父所经营的

“伊萨克·施瓦尔茨曼布料公司”坐落于波多尔，以经营高质量的英国布料著称。该公司由施瓦尔茨曼夫妇创立于1865年。从1884年起，公司拥有该城最大的商店，从1892年起，公司在克列缅丘格（乌克兰城市）拥有分公司。

舍斯托夫的父亲系古犹太语文献专家、自由思想者，观点进步，视野开阔，思维开放。他想让孩子继承自己的家业，但在这个问题上也并不强求。列夫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列夫就学于基辅第三古典中学，但很快就被迫转学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后转入基辅大学法律系。1889年以副博士学位从该校毕业。学位论文《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被严禁发表，并被莫斯科审查委员会销毁。为此而未能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列夫在其父在基辅的公司里工作了几年，同时高强度地研究文学与哲学。但把商业和哲学结合起来并非易事。1895年他患了严重的神经紊乱症，翌年出国治病。此后其父的家族企业对这位思想家成了一种家族的诅咒：此后他还将不止一次中断心爱的工作，抛开家庭和孩子，回到基辅整顿被其父放任自流，又因两个弟弟缺乏规矩而变得松松垮垮的公司的秩序。

1896年列夫在罗马娶了正在该地学习医学的安娜·叶丽阿扎洛芙娜·别列佐夫斯卡娅为妻。两年后二人移居波恩。1898年回到俄国。

1898年舍斯托夫的处女作《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出版。该书所勾勒出的问题后来成为贯穿这位哲学家全部创作的主题：对于人在世上的“定向”而言，科学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一般理念、体系和世界观也会遮蔽我们直观美丽而又多样、

丰富而又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眼睛；把具体感性的人类生活及其悲剧性放在前景中加以考察；不接受“规范标准”的、徒具形式的、强制执行的道德和普遍“永恒”的道德律令。

此书问世后，舍斯托夫紧接着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分析俄罗斯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尼・托尔斯泰、安・帕・契诃夫、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费・索洛古勃——创作中的哲学内蕴。舍斯托夫在这些著作中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他在其处女作中提出的问题。在此期间，舍斯托夫结识了俄国著名的文化赞助人佳吉列夫，后者是他在《艺术世界》杂志的同仁。

1905 年舍斯托夫出版《无根据颂——非教条主义思维的一次尝试》，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知识界引起异常尖锐激烈的争论，争论中出现的观点针锋相对，从欢呼雀跃到坚决否定，不一而足。这本书实际上是舍斯托夫的哲学宣言。按照舍斯托夫自己的说法，“……我的全部任务恰好在于要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种类的、被形形色色的、伟大和并不伟大的哲学体系的奠基人以如此莫名其妙的顽强精神所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开端与终结”。

1915 年舍斯托夫婚前所生儿子谢尔盖・利斯托帕多夫战死。1917 年二月革命，舍斯托夫并不感到喜悦，尽管他永远都是专制政权的敌人。1920 年舍斯托夫携家离开苏维埃俄国，在瑞士逗留了不长时间后，于 1921 年定居法国直到逝世。

此时他在哲学上关心的课题是巴门尼德和普罗提诺、马丁・路德、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布莱兹・帕斯卡尔和巴鲁赫・斯宾诺莎、索伦・克尔凯郭尔，以及同时代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舍斯托夫由此进入那个时代西方哲学界的核心精英圈，而和埃德

蒙·胡塞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马克斯·舍勒、马丁·海德格尔、乔治·巴塔耶等有密切交往。他还在索邦大学举办讲座和开设课程,内容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以及整个俄罗斯哲学思想。舍斯托夫还对《路标》杂志(巴黎,1926—1928)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帮助,1925 年该刊第 1 期刊载了他的哲学论文《发狂的演说——关于普罗提诺的神魂颠倒》。

1938 年 11 月 19 日,舍斯托夫于巴黎的布瓦洛诊所溘然长逝。

舍斯托夫通常被人称为“反哲学家”:其主要追求是挣脱意识的束缚,因为意识——由公式和模式等理性抽象物构成的意识——既构成了世界的基础,也遮蔽了真正的现实。自明性即死亡和痛苦的自明性,是世界强加在人身上的。对人而言,这种自明性是在理性主义和人文道德中得以体现的。舍斯托夫没有沿着主流经典哲学家开辟的思辨大道前行,而是剑走偏锋,走了一条“灵魂中的漫游”式的哲学之路,为此他选择格言警句体和评论注释体进行写作。对于舍斯托夫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从普遍必然判断这种幻觉的俘虏下挣脱出来,走向上帝。因此他为自己的哲学研究选择的对象是面对上帝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卡尔、尼采、克尔凯郭尔——的经验(体验)。舍斯托夫完全被圣经的魅力所吸引,尤其是圣经中那些先知们以及使徒保罗。正是圣经以其向世界发出的挑战,以及上帝对这种挑战的回答证明,自明性是一种可怕的幻觉和骗局。“理性导向必然性,信仰导向自由”——这句话完全适合舍斯托夫自己的命题。

迄今为止,舍斯托夫的著作在俄罗斯国内外以各种欧洲语言

出版了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俄罗斯出版的文集从上个世纪初至今,便有所选篇目多寡不等的数十种文集(多数为两卷本)。国际上出现最早的是法文版文集、德文版文集等。

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外国文学界哲学界,自从列夫·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我校董友先生译)、《开端与终结》、《旷野的呼告》(方珊译)问世以来,在读书界产生了持续、持久、恒常的影响,包括上述译著在内的舍斯托夫的著作,在数十年间,持续不断地由多家出版社再版,成为读书界"学术类书籍的常销书",也成为学术低迷、拜金至上时代的一个"思想的奇迹"。有鉴于此,对于舍斯托夫思想在20世纪俄罗斯和世界思想史中的意义与地位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编纂一部信实可靠的列夫·舍斯托夫文集,就成为当今学人对于我国外国文学和外国哲学研究界应该承担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舍斯托夫著作在我国的翻译介绍,可以从以下简表中见一端倪。《在约伯的天平上——灵魂中漫游》(董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版);《旷野的呼告》(方珊、李勤译,华夏出版社,1991年第1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开端与终结》(方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舍斯托夫集》(方珊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初版;2004年第2版);《以头撞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双头鹰文库》(方珊、张冰主编,共6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舍斯托夫文集5卷本》(方珊主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卷《钥匙的统治》,第2卷《在约伯的天平上》,第3卷《雅典与耶路撒冷》,第4卷《旷野呼告·无根据颂》,第

5卷《思辨与启示》)；《雅典与耶路撒冷》(张冰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钥匙的统治》(张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旷野呼告・无根据颂》(方珊、张冰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我们这个即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舍斯托夫文集》，除以上已经翻译过的著作外，增补了最新发现的舍斯托夫著作4部：《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希腊哲学史讲演录》《伟大的前夜》和《唯凭信仰》。这几本书本人在2015年在莫斯科大学访学时全部购齐。目前，拟议中的《舍斯托夫文集》分为13卷。第1卷：《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第2卷：《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第3卷：《悲剧哲学》；第4卷：《无根据颂》；第5卷：《开端与终结》(文集)；第6卷：《伟大的前夜》；第7卷：《钥匙的统治》；第8卷：《在约伯的天平上》；第9卷：《旷野呼告》；第10卷：《雅典与耶路撒冷》；第11卷：《思辨与启示》(文集)；第12卷：《唯凭信仰》；第13卷：《希腊哲学史讲演录》。

舍斯托夫的著作在读书界享有广泛而又良好的声誉，这次中文版《舍斯托夫文集》的问世，必将引起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欢迎广大读者对本文集的编纂和翻译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修订。相信经由我们的努力，一定能使舍斯托夫和中国读者之间的“心桥”更加畅通无阻。

谨以此为序。

张冰

2018年6月

本卷说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悲剧哲学》是舍斯托夫的第三部著作，动笔于1900年11月份，完稿于1901年年底。

1902年该书在《艺术世界》分章连载（第2—9/10期），随后，1903年1月，该书单行本由斯塔休列维奇出版社出版。在舍斯托夫的所有著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悲剧哲学》出版次数最多，并且被译成了8种外语。

由于这部著作，当时彼得堡的名人梅列日科夫斯基称舍斯托夫是俄罗斯写尼采"写得最好的人"。别尔嘉耶夫在书信中说：自己最感兴趣的舍斯托夫的著作，是论述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认为自己与舍斯托夫的交往，是存在主义的交往，是对生活意义的一种探索。他还说："列夫·舍斯托夫是一个以其自己的全部存在进行哲学思考的哲学家，对这样的哲学家来说，哲学不是学院派的一个专业，而是生死之事。"

目　　录

绪　　论

1

悲剧哲学！或许，这一提法会引起读者的异议。读者已经习惯于把哲学看作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概括，看作是当代科学的这座大金字塔的顶尖。读者也许能承认"悲剧的心理学"这一说法，然而，即使是这样，也极不乐意，很有保留。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来说，都认为，我们的一切兴趣实际上绝不应该放在悲剧上。悲剧的哲学，这难道不是一种绝望的、悲观的、疯狂的甚至是死亡的哲学吗?！难道这是在谈论任何哲学吗？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学说是通过表现个体的毁灭来埋葬死，那么我们就立即会理解和乐意赞同这一学说。上个世纪伟大的思想家、著名诗人就曾经独特地把这些自由的言论写入了诗中。他大声疾呼："生命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说明，我们离开死人不够，我们肯定活人的权利不够。我们周围有一些活人，他们的存在比这一学说所说的已被埋葬的死人，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更加引起我们的不安。在我们周围，存在着各种没有生活希望的人、绝望的人，以及因对生活的恐惧而变得疯狂的人。如何对待他们呢？是谁承担起这超人的

义务来消除这些人呢?

乍一看来,这一可怕的任务,在神和上帝的造物中间,没有一个能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承担起它。然而,这仅仅是乍一看来。如果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去杀害他人(如刽子手大部分是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人),那么为什么要认为这是人类最残酷和最无情的行径呢?每当一个人面临着:死与杀人,这两者必取其一的选择时,一切深层和隐蔽的本能都会促使他去保护自己,而抵抗迫在眉睫的危险。刽子手的行径被认为是最可耻的,这不过是一种误解。各民族的精神生活史、"文明"史向我们说明了这类残酷的现象。与这些现象相比较,在断头台上杀死几十个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想说的决不是各个民族的灾难,由达梅尔兰[①]、阿提拉[②]和拿破仑之流带来的灾难,甚至不是指天主教的法庭。至于这些舞剑玩火的英雄,我们不可能找到他们与哲学的一般联系,决不可能。这里说的是精神上的英雄,是善的鼓吹者,是真理和一切美与崇高的宣扬者,是理想的预言家,是至今为止公认的最渴望斗争的人们。他们渴望反对人类本性中的一切凶恶的"粗野"的现象。他们的名字我不想说,我是有充分依据的。因为如果说名字的话,就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去说些本来不该说的东西。很显然,关键不在于名字,而在于发生在各个民族精神生活之中的最重大事件(它是悄悄地逐步变化着的,似乎没有任何个人的努力似的),在于唯心主义的诞生。

---

① 阿拉伯人浑称帖木儿为帖木儿林(意思为跛子帖木儿),欧洲人将此讹传为达梅尔兰。——译者注

② 阿提拉(453年死),匈奴族的首领。——译者注

唯心主义历史悠久,有两千多年了,然而,当今它的作用已不太重要了。正规地说,柏拉图是一致公认的这一崇高学说的鼻祖和奠基人。即使在柏拉图本人那里,您也常常会看到思想和论证的奇怪的不一致性。只需一点就可以说明这种不一致性,即他的观点和我们今天的"地道"的唯心主义观点相差甚远。在他的论著中,用拟人的方法来理解上帝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熟谙科学的当代大学生在读他的对话时,就往往会凭着自己的优势而感到好笑。我们认为,柏拉图还不是一个文明人。他对我们周围各种联系的规律性还一无所知。要知道,甚至亚里士多德也把天空和大地割裂开来。无疑,真正的纯唯心主义是最近这两个世纪的产物。它是伴随着科学的"一元论"的世界观倾向的产生而出现的。

当代思想界和多元论的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它竭力追求一元论,就像我们所说的,追求统一性。更准确地说,探求一个本原。它甚至已经很难容纳二元论。因为承担两个本原对于它来说已是非常沉重的负载了。它千方百计地试图减轻负担。只要能够不复杂化,它甚至打算在需要的时候去容忍任何不合情理的细节。精神和物质——这实在太多了,难道不是一个更好吗?要不精神,要不物质。或者,万不得已时,承认精神和物质是这一或那一本质的不同方面不是更好吗?确实,以前谁也不理解,精神和物质怎么能够成为"不同的方面"。然而在哲学里,特别在最新的哲学里,这种过去谁也不知道的阐释已经远非一家之言了。尤其是,如果这种说法是巧妙和适时的,哲学用它来说明问题就更加有说服力。主要是去掉了那些多余的本原!……

显然，这一思想最符合泛神论的观点和用相应的方式来立论和阐释的观点，以及这一思想的通俗的表现形式——唯物主义。很清楚，唯物主义尽量避免用外来词和抽象的概念，然而，外来词和抽象的概念只能使不熟悉本行的广大群众感到陌生。相反，而在哲学界它们却得到充分的确认，甚至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内行的人知道，这些词和概念的难懂是容易克服的。无论外来的术语、新加的概念是怎样产生的，它们最终不仅一点不会带来麻烦，而且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为陷入困境的问题找到了出路。它们的选用不是偶然的，而是系统的，具有清楚的、非常确定的目的。可能带来麻烦的只会是那些把许多新的不合体系的、牵强附会的现象引进哲学领域的“原则”。因此，哲学家必须具备坚定的力量，以便制止那些讨厌的外来原则的侵入。因此，需要把唯心主义的围墙建得高大而又坚固，建立起能把科学和生活明确隔离开来的墙。哲学千方百计地想成为一门科学，一门像数学那样的科学。如果这一点通过其他任何途径都无法达到的话，那么无论如何认识论是能达到的。认识论证明，不要什么都去问哲学，甚至根本就不要给哲学提问题，而只能听凭它去说。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哲学才能够向求知者展示自己的秘密。由于人们至今无其他地方可去汲取真理，所以他们去求助于哲学，听从它的教诲。人们求助于哲学如果不是为了解决什么生活难题的话，那么至少是为了要“教训”别人。

然而，谁要想把认识论本身提出的任务看成仅仅是一些理论上的追求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假设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大概当代宇宙观就不可能包括如此广泛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就不会

遭到如此多的敌意。尼采认为，任何一种哲学都是哲学家独特的回忆录和不自觉的自我表白。我认为，这还没有讲完。在哲学体系中，除了自白，您最终还一定会找到重要得多的和更有意义的东西：作者的自我辩解。与此同时还有作者的指责，指责那些人，即用自己的生活这样或那样地怀疑这一体系的绝对正确和创造者的崇高的精神品质的人。我们已经不相信，也不可能相信：人们曾爱鼓吹的对真理的无私探索。显然，当我们说渴求真理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去轻信呢？也许渴求真理就是渴望安宁，也许就是渴望斗争的新刺激，而也许就是渴望找到某种独创的、谁也没想的“现点”。一切都是可能的！然而，如果从表面上看，任何体系都试图灵活运用在一切其他方面我们已有的发明，而很少回答无数的“为什么”，那么从内部来看，从内容上看，我重申，任何哲学都无条件地在力求达到自我辩解的目的，尽管它并没解释清楚。这一目的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给人们提出任务，并且推崇那些乐意接受这些任务的人，而咒骂和侮辱那些拒绝这些任务的人，并且不愿忍耐，不想去查明自己学说在一定情况下遭拒绝的原因（常常是这样！），唯心主义早就准备解释自己的任何失败。它把自己之所以不被接受的原因推诿于人们的无理和恶意。它制定了绝对命令的原则。这一原则使它有权把自己视为专制君主，合法地去看待一切拒绝服从的人，一切被用刑和处死的倔强的造反者。每当它的要求受到干扰时，绝对命令就表现出无比极端的残酷性！对于在这方面，尚缺乏经验和难以想象的人，我劝他再读一遍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绝对命令向容易轻信的人们表明，唯心主义要达到什么目的，主要是，通

过什么方法去达到！也许人心就像一块太硬的材料，也许在发生其他灾难时，需要把唯心主义赐予可怜的人。然而，要知道，这只是乐观的推测，而按人道和严格的当代科学的观点，甚至不是推测，而是纯粹没有任何信念的玄学。谁能真正承认打击灾难不是依靠机械规律，而是任何什么崇高的目的？而如果是这样，就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接受这些崇高目的教育的人中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乐意去吻那只惩罚的手……

2

我们，不仅我们，而是整个欧洲（要知道，现在各个国家的思想水平都是一样的，就如同连通器中的水那样）早就把艺术创作看成无意识的精神过程。显然，这种观点促使了所谓文学批评的出现。艺术家仅仅有意识地去创作是不够的，需要有人去检查和说明，从本质上去补充。文学批评家本身大概了解自己的作用，所以他们努力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他们所评论的艺术作品的无意识创作联系起来。有时这一任务比预料的更加艰难。艺术作品和任何公开的思想都不相符合。如若没有这些思想，根本就不可能去“有意识地”理解生活。当这种情况发生在二流作家，或甚至没有天才的艺术家身上，批评家一般不去思考。思想的缺乏往往被视为是天才的不足，不仅如此，还常常被看作是才华不足的原因。所以，这就仿佛成了一条“永恒”的真理。诗人们只要不想让自己的劳动白费，他们就不会怀疑应该追踪批评家说的目的。最终，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诗人的无意识创作总是成为和应该成为批评

家的有意识创作。这样，危险的因素也就成功地消失了。

然而，常常又会发生另一种情况：批评家拿到一本著名艺术家、一流明星的作品。批评家早就对作者有好感，并打算对他采取最宽容的态度。他原谅作者缺乏政治理想，尽管他很想正好从这位艺术家那里获得对自己党派的支持。他克制着自己，原谅了作者，原谅他对社会任务和为其服务的漠不关心，而按批评家的意见，国家的一切力量都应该投入到这些任务中去。然而，他确信，在新的作品中，他将能发现至少是不由自主地披露出的对永恒的精神理想的追求。至少是这一点，哪怕就只有这一点。如果有这一点，就让诗人去歌颂真、善、美吧，批评则去关心其他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点呢？如果艺术家忘记美，嘲笑真，忽视善呢？有人对我说，这绝不可能。然而，我建议，我们从抽象的议论转到个别的例子上来，当然只谈一个例子。绪论要容纳相当多的文学材料显然范围太小了一点儿。但是我想，这一例子能提醒那些不再害怕回忆的人，提醒许多诸如此类的其他人。

我现在谈谈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众所周知，别林斯基就这部长篇小说写了一篇极其富有激情的文章。文章论证了，毕巧林之所以恶作剧，是因为在上个世纪初的俄罗斯找不到去发泄自己旺盛精力的真正地方。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在《当代英雄》第一版或第二版时，这篇文章是否已经写成。然而，无论如何，莱蒙托夫本人也认为必须解释自己的长篇小说，并且在第二版的序言中作了说明。序言不长——不超过两页。但是它无疑证实了一种情况：莱蒙托夫只要愿意的话，就能够非常“有意识地”来对待自己的作品，并且比任何批评家都更善于提出“思想”。在自己的序言

中,他直率地声明,不管那些众说纷纭的评论,在毕巧林身上,无论是作者自己,甚至是主人公本身,作者都根本没去描绘,也不想去描绘。作者只有一个目的,即揭示我们一代人的“缺点”。您要问:为什么呢?回答是有的。社会首先必须认识自己,说明自己的病症。“他在结束自己的解释时说,情况已经是这样:病症被暴露了,而怎样医治它,这只有天晓得了。”显然,莱蒙托夫在序言中的观点和别林斯基的观点是相似的。毕巧林的肖像是病态的肖像,是社会可怕病症的肖像。只是在莱蒙托夫的解释里没有冲动和激情。这样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他对社会的病症很感兴趣,而却几乎没有医治它的愿望,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来医治……

为什么一个善于揭示和描写病症的人一点都不想去医治这一病症呢?总之,为什么描写得那么激动,而在序言中又如此平静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您可以在长篇小说中找到:在小说的开头几页,您可以确信,如果说毕巧林的肖像是病态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在作者看来比任何健康都更珍贵的病。毕巧林是病人,那谁又是健康的呢?是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上尉、格鲁希尼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或者,如果干脆把妇女也算在内,是可爱的梅丽公爵小姐,或野姑娘贝拉?只要提出这个问题,您就立即会明白《当代英雄》的创作目的,以及后来写序言的原因。在长篇小说中,毕巧林被写成一个胜利者。在他的面前,所有人,一切其他的人物都黯然逊色了。甚至不像普希金的“奥涅金”那样,没有一位塔吉娅娜来提醒主人公,世上还存在着某种比他,比毕巧林更加神圣的东西,存在着自由;提醒他存在着天职、思想等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在

自己的道路上，毕巧林遇到过暴力的袭击和诡计的暗算，但是他都凭着智慧和性格的坚强不屈战胜了它们。请试一试这样来评价一下毕巧林：他除了残酷以外，没有任何缺点。他勇敢、高尚、聪明、深沉、有教养、英俊甚至富有（这都是优点！）。至于残酷，他尽管承认自己有这一毛病，并常常提到它，然而，唉！当一个极有天才的人表现出某种缺点时，这一缺点是和他相称的。况且，他本身一开始就承认这是他的品质，是美的品质。毕巧林本人由于自己的残酷，把自己比作厄运。如果许多小人物都在成为大人物的牺牲品的话，那么毕巧林的残酷有什么关系呢！"主要在于，指出病症，而如何医治——天晓得。"作者自己在长篇小说的简短序言中撒的这个小谎很具有典型性。您不仅仅可以在莱蒙托夫一个人身上可以发现这一点。几乎任何一位大诗人，都是这样，普希金也不例外。"病症"的描写有时是很有诱惑性的。"病症"很快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就像一个魔杖，最聪明的人也无法摆脱它的诱惑。普希金也是这样：请想一想他笔下的冒名称王者、普加乔夫关于鹰和乌鸦的话和格利涅夫的回答。在批评家指出病症的地方，"无意识"创作也意识到自己的反常，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可怕和有猜疑的方面。然而，除了病症，批评其他什么也看不见，并仍然急于寻找医治的办法。而艺术家根本不去考虑这一点，并仅仅出于礼貌才用一般可以接受的句子来缓和自己的观点……由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已经使用了"无意识创作"的说法，那么它应该不是针对艺术家的，而恰恰是针对批评家。这些批评家总是力图把某种预备好的、主观臆想的思想扣到诗歌作品中描写的生活事件上。艺术家没有"思想"，这是真理。然而，艺术家的深度就表现于此。艺术的

任务绝不在于,听命于由各种人依据这种或那种基础想象出来的规则和标准,而在于冲破那桎梏追求自由的人类智慧的锁链。“毕巧林们是有病的,但怎样医治,只有上帝自己知道。”只要变换一下形式,在这些话的背后,您一定能发现莱蒙托夫心灵最深处的思想:无论毕巧林们多么难以琢磨,作者并没有让他们成为中庸之道和规则的牺牲品。而批评家却真想去医治。他相信或应该相信当代思想,即人类的未来幸福,相信地球上的和平,一元论,用普加乔夫的话来说,相信为保护吃死尸的乌鸦,必须消灭一切吃活肉的鹰。鹰和鹰的生活是“一种反常现象”……

反常的现象!这一可怕的词,科学的人们以此来吓唬过,并且至今继续在吓唬那些除了统计和“铁的必然性”还不死心仍在世上探索另外一些东西的人!任何一个人只要想用与当代世界观不同的方法来看待生活,就可能并且应该等待着被划入反常人之列。这种划入没有一点关系,可能甚至是优秀的标志!显然,可怕的在于:没有人,没有任何现在还活着的人,能够去长期思考另一种世界观的可能性。每当人想到,当代的真理还只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并且我们的“信念”也许还是错误的,就像我们最早的祖先的“信念”那样,他自己就会开始以为,他偏离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并且直接走向反常。托尔斯泰伯爵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他是多么反感和仇视整个当代思想的体系呵!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对科学所“肯定”的一切提出了“异议”,甚至冒着有被说成荒谬的危险也不让步。他打算去相信不识字的农夫、愚蠢的村妇、孩子、穿着原色粗呢外衣的市民、肥胖的商人。因为只有他们和科学的人们说得不同!然而同时他主要接受的却是科学所教给的一切。他也具

有“良好的”理想，就像欧洲大多数改革者那样。他所信奉的基督都是合理的人类的理想。为了艺术，他要宣扬善的情感。为了科学，他要去帮助农民。他不理解，为什么诗人忧郁，为什么诗人追求表现最细腻的情感。他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一些不安分的探索者在北极走来走去，注视着满天星斗的天空，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追求探索那些未知的和未探寻过的东西呢？这一切是无益的，是反常的。“反常”这一奇怪的幽灵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压抑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使得他和普通人和睦共处，使得他在自己身上寻找着普通人的特点。他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尽管现在又重新提出了关于天才和疯狂相近的思想，但是我们大家都像过去一样，甚至比害怕死亡更害怕发疯。无论这两者多么相近，天才毕竟是天才，而疯子就是疯子。宁愿让疯子来毁坏天才的名誉，也不愿让天才去承认疯子。我们完全可以去怀疑，然而这对我们来说是条公理。我们亲身的各种经验都告诉我们，疯狂的可怕。龙勃罗梭①的研究一点都没照亮由我们的无知和当代实证科学笼罩在疯狂上的阴影。当然，龙勃罗梭并不是干这个的行家。他最终也不过是一个实验者，他仅仅根据外部特征来评论别人的心理状态。如果他自身哪怕闪烁着一点天才或疯狂的火花，他探索的结果也许会更有益。然而，这两方面他一点也不具备。他只是一个有才干的实证主义者而已。他的理论没有让人了解反映疯狂的特征。托尔斯泰伯爵也回到了实证理

---

① 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e，1835—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犯罪学和刑法学中人类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有的人生理上有天生特征，因而生来具有犯罪倾向。——译者注

想的方面来。人类存在着无意识的精神领域:人们只是不由自主地步入这一领域的。

这就是悲剧的领域。一个人进入了这一领域,就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愿望。大家所感到亲近和珍贵的一切,对于他来说,是不需要和格格不入的。确实,他还和自己过去的生活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在他身上还保留着孩提时代就已有的某种信念。一些过去的恐惧和愿望多少又在他身上复活。也许,他不止一次地苏醒过来,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状况的可怕,并且力图回到自己的平静的过去。但是,“过去是回不来的”。船被烧了,一切后退的道路都被断绝了。只能向着混沌和永远可怕的未来前进。人向前走着,几乎已经不清楚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开始感到,年轻时代所行不通的那些幻想是虚假的、骗人的和反常的。他痛恨而又无情地抛弃了曾经相信和热爱的一切。他试图告诉人们自己新的心愿,但大家都害怕他,误解他。在他那张被可怕思想所折磨的脸上,在他那双闪烁着陌生光泽的眼里,人们想看见疯狂的特征,以便有理由回避他。他们求助于唯心主义和可靠的认识论。由于这些理论,很久以来他们一直能够平静地生活在眼前发生的莫名其妙的可怕现象之中。要知道,唯心主义是能帮助人忘记许多东西的。难道它的力量和魅力消失了吗?难道它应该让位于新的敌人的进攻吗?唯心主义和认识论带着难以掩饰的恐惧和激动,重复着一个老问题:究竟是谁,是谁有权利来说些什么呢?最终,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那么他们给了我们哪些指教呢?……

然而,他们却没有给我们任何“指教”。毫无疑义,在俄国公众

中有这样流行的说法，作家为读者而生存。反过来说，读者为作家而生存。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言论并不是为了在人们中宣扬自己的信念和阐明相关的问题。他们自己也在寻找着光明。他们并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认为的光明就正是光明，而不是骗人的不定的火光。或者甚至比紊乱的想象的错觉更坏。他们把读者看作见证者而吸引到自己这里来。他们想从读者那里获得自我思考和希望的权利，即生存的权利。唯心主义和认识论警告他们：他们是疯子，是精神失常的人、犯人、死人。而他们却在发出最后的呼吁，希望这一可怕的判决将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许大多数读者不想知道这一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作品的意义不在于回答，而在于提问。这一问题就是：人们究竟有没有为科学和道德所不容的欲望，也就是说，是否存在着悲剧哲学呢？

列·舍

... Aimes-tu les damnés? Dis-moi, connais-tu l'irrémissible?

……你喜欢惩罚吗?

告诉我,你懂得什么是不可饶恕吗?

夏尔·波德莱尔

第一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说："我很难述说我的信念蜕化的历史，况且，也许这并不太有趣。"[①]难，也许是有点。然而不太有趣——这未必会有人赞同。信念蜕化的历史——是否是整个文学领域中的一种历史，一种充满诱人趣味的历史呢？信念蜕化的历史——首先应是信念诞生的历史。在人到了具备足够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的年龄时，在人身上，在他的眼前，第二次产生出一些信念，以便追踪自己心灵的这些伟大而深邃的秘密。如果说这一过程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可以是悄悄地过去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个心理学家。如果他不把自己的观察告诉人们，他就不会是一个作家。显然，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面上轻视自己，但上面引用的话的后半部分是不成立的，是出于作家的谦逊。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信念诞生的问题会对我们有多么大的决定意义。他也知道，无论怎样说明，要说清这一问题只能有一条途径：叙述自己的历史。您还记得《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所说的话吗？"正派的人能够最乐意说些什么呢？……回答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Соч.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第9卷，第342页，圣彼得堡，马尔克斯出版社。

是:说自己。那么我就来谈谈自己吧。"[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完成着这一纲领。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他的成熟和才能的增长,他愈来愈大胆和真诚地谈论着自己。然而,同时,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一直总是或多或少地用自己小说中主人公的虚构的姓名来加以掩饰。当然,这里已不是在说文学或日常生活常采取的那种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文学生涯的晚期并不害怕破坏人与人关系中的重要礼仪。但他常常却不得不通过自己的主人公来说一些他意识到的东西。对于他来说,如果这些东西用他自己本人的形式,而不是以杜撰的小说主人公的思考和希望的虚假形式来表现,也许它们就不会形成明确和固定的形式。在《地下室手记》的注释里,您就会特别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在注释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手记的作者和手记本身一样都是虚构的"。他只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描写"行将死亡的一代中的一个代表"。这种手法实际上却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读者从作品的开头几页就能知道,虚构的不是手记及其作者,而是它们的注释。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后来的作品中还坚持那种注释的方法,他的创作也就绝不可能引起众说纷纭的解释。然而他的注释也并非只是一个无用的形式。他自己感到恐惧:他生动描绘的那个"地下室"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而就是自己的、非常熟悉的。他自己害怕那些他经历过的可怕情景,就集中内心的一切力量,尽可能地,用最早想到的理想人物来抵挡它们。这样就塑造了梅什金公爵、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一系列形象。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3卷,下册,第74页。

他在《作家日记》中的那么多激烈的阐释也正源于此。所有这一切仅仅是想让我们记住，拉斯柯尔尼科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基里洛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在说着自己的话，他们和作者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地下室手记》注释的新形式。

非常遗憾，这次注释和正文联系得太紧密了，以致已经不可能机械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感受和他臆想的“思想”分得一清二楚。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指出，在一些方面是能够区分的，例如，所有的老套话和共同的地方没告诉我们任何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东西。这一切是借用来的。甚至不难猜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哪里汲取这些材料的，说实话，他是相当善于猎取的。再一个特征是叙述的形式。只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中能听到歇斯底里的发作，非常高的声调，不自然的喊声，您就一定可以断定，这是开始“注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了。他试图用“情感”和口才来弥补信心的不足。这种绝望和激动的演讲也许对于那些粗心的人来说是无法辩驳的。然而，较有经验的人听起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上面所指出的那些特征还远远没有为解决我们这里的问题提供精确的方法。它们还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多的疑虑和不解。所以，在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某些部分，甚至整本整本的小说时，就可能出现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应依靠什么呢？依靠批评的嗅觉?！然而读者不满足这样的回答。它有点神话、陈旧、发霉和虚伪的味道，甚至有点故意虚伪的味道。那么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任意想象。也许这一词以它的坦诚更能吸引有更

高要求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怀疑批评嗅觉的真实性的人们。如果他们猜出了寓意，这种任意想像就不再是随意的了。

无论如何我们的任务已经确定。我们需要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提出的、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叙述他的信念蜕化的历史。我在这里仅仅指出，蜕化确实不一般。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的信念，他最初加入别林斯基小组时所相信的一切，现在一点也没有了。人们习惯把被推翻的偶像还看作上帝，把被保留下来的寺院看作教堂。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是这样。他诋毁了过去曾崇拜的一切。他不仅仅憎恨自己过去的信念，而且唾弃它。这种例子在文学史上不多。在最当代，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外，可以说就只有尼采了。尼采也确实经历过这样的历史。他和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与老师的决裂是很坚决的，而同时又是极其痛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自己信念的蜕化，尼采说要重新评价一切价值。实际上，两种说法只是措辞不同，说的是同一种过程。如果注意到这种情况，也许现在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尼采会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高的评价。这就是他的原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的一位能使我学到东西的心理学家；我把和他的结识看作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成就"。[①] 尼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自己的亲人。

确实，如果使人亲近的不是出生的关系，不是共同的生活或性格的相同，而是内部经验的一致，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称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兄弟，甚至是一对孪生兄弟。我想，如果他们生活

① 《尼采文集》(*Nietzsche's Werke*)，第 8 卷，第 158 页。该书中所有引注的《尼采文集》均出自瑙曼出版社，1895 年、1896 年、1897 年版。——译者注

在一起，那么他们会相互憎恨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恨，就是基里洛夫和沙托夫（在《群魔》里）一起从美国旅行回来后所有的那种恨。那时他们不得不半饥半饱地在一间棚子里躺了四个月。然而尼采仅仅是从书本上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而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去世了。死者可以原谅一切，甚至可以原谅他知道了基里洛夫和沙托夫在棚子里明白的秘密。他不会出卖……

但是，尼采错了。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谁都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出卖他。然而，相反，尼采却用自己的作品揭示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许多秘密。我们第一次指出一个惊人的情况。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预言。他最爱预言，俄罗斯一定会把在那里被遗忘的博爱思想还给欧洲。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曾是对欧洲人有影响的第一批俄国人中的一个。为什么他的说教曾风行一时？人们谈论过它，甚至感到惊奇，然而它又被遗忘了。欧洲曾怀着感激的心情从俄国接受的第一个礼物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学”，也就是地下人及其变种，拉斯柯尔尼科夫们、卡拉马佐夫们和基里洛夫们。难道不是多么深刻的命运戏弄吗？但是命运最喜欢嘲笑凡人的理想和预言。应该想想，这里说明了一个伟大的思想。

第二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活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穷人》(1845年)开始,到《死屋手记》(1861—1862年)结束。第二个时期从《地下室手记》(1864年)开始,到《纪念普希金的讲演》(1880年),这一忧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创作的尾声。这样,《地下室手记》就写于这两个时期之交。从《手记》中,读者就会突然和完全意外地看到,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其他的一些小说和文章时,他的身上出现了一种最可怕的危机,这种危机只有人的心灵才会产生和经受。是什么原因呢?是苦役吗?也许不是,至少不是直接的原因。在服满苦役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没有否定自己过去的信念,而且以他年轻时代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才力量来表现它们。要知道,在苦役以后,他写成了长篇小说《死屋手记》。这部小说受到了一致的赞扬,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思想的敌人也至今仍在称赞它是一部"特别"有价值的作品,是一部和他所有的其他晚期小说所不同的更真实的作品。这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仍然是第一部小说在别林斯基小组里得到热情传阅的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思想"和"信念"上来看,《死屋手记》的作者无疑是一个"激进

的"维萨里昂的忠实信徒,是乔治·桑[1]和上半世纪法国唯心主义者们的忠实信徒。

这本小说的内容几乎就是《穷人》中的内容。当然,这里也有新的东西:有现实的鉴别力,有力图揭示生活本来面目的企图。然而,谁竟会想到,现实的鉴别力会影响到,哪怕是稍稍地影响到信念和理想呢?所有的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都完全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现实当然是黑暗和丑恶的,尤其是服苦役的现实,而理想是光明和美好的。然而这种对立正是产生理想的土壤。因为它不仅没推翻,还证实了这些理想。剩下的只是去加速现实的发展,直到现实和理想的界限达到无穷小,达到零为止。因此描写黑暗的现实要努力达到一个唯一的目的,就是和现实做斗争,并且用很远的,但感觉很近的未来来粉碎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穷人》和《死屋手记》源于同一经验,有着同样的任务,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作者的技巧,作者在 15 年间写作艺术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在《穷人》以及《双重人格》和《女房东》里,您所看到的还只是不太娴熟的、尽管是很有才华的小学生。他在竭力使艺术大师果戈理的创作通俗化。读着上述的小说,您自然会想起《外套》《狂人日记》《可怕的复仇》,也许您自己会默默地想,不需要再通俗化了。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初的一些小说永远留在作者的头脑之中,那么读者也许多少会有点失望。但是作家需要创作这些作品。早在非常年轻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浪漫主义中民主派的代表者。——译者注

仿佛已预感到自己未来的任务，开始尝试描写阴暗和沉重的画面。他的摹仿是暂时的，很快他的时代就来到了，他不再照自己老师那样去创作，而写自己的恐惧。当然，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可以很奇怪地看到一种追求灰暗色彩的倾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也不知道其他的色彩。您要问，难道他不敢面向光明和欢乐吗？难道还在年轻的时候他就下意识地感到要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自己的创作才能吗？然而，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天才就是可憎的天赋。他很少让自己的读者享受尘世的欢乐。

陀思妥耶夫斯基默默地感受了天才的滋味将近40年。在他看来，这一滋味是轻松和幸福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他非常高兴地回忆起自己最初的创作经验。用他的话说，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刻不是当他的作品发表的时候，不是当他最早从当代优秀作家和文学专家口中听到非同寻常的高度评价的时候。不是的。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是谁也都不知道的时刻：他独自一人一边写着稿子，一边由于艺术想象，由于胆小如鼠和备受折磨的小官吏马卡尔·杰渥什金的命运而痛哭流涕。我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是否说的全是老实话，是否他确实感到因艺术想象而痛哭流涕是最幸福的时刻。也许，这里有点夸张。然而即使是这样，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出这样的坦白，仅仅是过分地重视了一时控制住他自己的感情，那么他的古怪的言论至少能够而且应该唤起我们的不安和疑虑。这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这些人竟会这样无缘无故地由于一个不幸的马卡尔·杰渥什金的虚构的厄运而感到高兴呢？怎么可以把“幸福”和眼泪联系在一起呢？用这种人的话说，他们的这些眼泪是由于可怕的想象而淌下的。

您能发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创作风格和《穷人》完全一样。15年的间隔在这方面一点也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改变。过去他流泪为杰渥什金,现在为的是娜塔莎。很显然,创作的幸福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作家。

乍一看来,似乎没有比把眼泪同幸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切更令人费解和反常的了。幸福怎么会产生,来自何处呢?人应该去说,马卡尔·杰渥什金或娜塔莎在遭到侮辱、折磨和摧残。看起来并没有幸福可言。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整整几个月、几年后,一点也不难为情,反而显得很骄傲地公开声明,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这类作品的读者应该有的正是这种情感。他们在流泪的时候,同时也别忘了高兴。确实,这些要求是有根据的。作者打算这样来唤醒善良的情感:"心在激烈地跳动,清晰可见,最受折磨的最底层的人也是人,并叫作你的兄弟。"[①]正是为了在读者中间宣扬这一思想,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整个一生中主要从事的工作是,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观察地球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一切可能出现的恐惧和变形,并在自己的书中把它们描绘出来。描绘的画面应该是清晰、生动和扣人心弦的;它们应该以神秘的力量来震撼人心。否则它们就要受到指责,否则它们就不能达到预期的影响。

我们先不谈读者及其心灵和善良的情感。那么,作家肩负着通过描写各种恐惧来唤起他人良心的可悲使命,他们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如果作家成功地吸引住人的良心,哪怕是暂时的,用预先

---

①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第29页。

构思好的图画来影响其他人，潜移默化地影响，这就是好的。

当然，这会被说成反常。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心理学上来说是可能的。纵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分夸张了自己最初和缪斯的对话，但无论如何在他的小说中有着不容否认的真实。也许可怜的马卡尔·杰渥什金给他带来许多甜蜜的时刻。年轻，缺乏经验，前人的优秀人物的例子——这些因素可以构成不合情理的情况。请想一想，在前方，哪怕是在远处，当在人们面前闪烁着“思想”的光环的时候，人们什么事情没有决心去干过。一切都被遗忘了。一切都曾为思想而牺牲了（不仅是虚构的杰渥什金，和他在一起还仅仅需要像对待自己人，实际存在的人那样），但是当说起为思想而服务的时候，真正的活人，甚至是熟悉的人都被忘记了。面对被污辱的小官吏的虚构的脸面，能感到幸福，这有什么可以吃惊的呢?！然而，无论如何，无论写什么，艺术家把黑暗现实描写得越危险、越可怕，也就越真诚、越全面、越有天才。我再重申，天才就是可憎的天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果戈理迟早都应该感到，天才的负担是多么沉重。

第三章

“显然，最受折磨的、最底层的人也是人，并叫作你的兄弟。”这句话充分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初入文坛时的思想。很清楚，这一思想现在看来并没有新意。即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写作的时代，这种思想也没什么新颖。它并不是最早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来的。在50年代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期里，这一思想一直是所有优秀的俄罗斯人的思想。他也受到了以西方迷人的博爱为名义的这一思想的影响。虽然从文学活动的职责看，别林斯基是一个批评家，但是从心理气质来看，也许更应称为一个伟大的说教者。确实，他总是从一种道德思想来看待所有最出色的文学作品。他关于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的文章有四分之三全都是称颂人道思想。别林斯基力图，至少在文学中，如果在其他的，他的影响所不能涉足的更广的范围内办不到的话，宣布那个人的权利的庄严声明。这一声明当时曾使法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众所周知，新思想主要是从那里传播到我们这来的。与人的社会权利的声明一起传播到我们这的，还有对世界合理解释的思想。它是作为声明的补充（当时是这样想的），作为声明的必要的假设。

合理解释确实在西方起过解放思想的作用。为了解开自己的双手，改革者们需要把整个过去的社会制度说成是各种力量盲目

游戏的结果。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一点。然而同时我们不能把这种具有功利意义的说法看成是真理。真理首先是真理。合理解释和博爱是同等重要的原则。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两种思想中的悲剧因素直接放在眼里。(在某种意义上说,除了别林斯基本人,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说。)谁也没感到,我们在谈人对社会权利的声明同时,还有一个人在大自然面前毫无办法的声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少怀疑这一点。他以青年人和好学者的满腔热忱追求着新的思想。他还是很早通过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认识别林斯基的。和他的当面结交更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确信他的信念。后来,在许多年以后,他在《作家日记》中说:“别林斯基不喜欢我,而我却当时狂热地接受了他的学说。”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详细地说明,为什么别林斯基不喜欢他。他只是一般地说了一下,尽管这些话的意义十分重要:“我们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分手了,而且是些在各个方面都很不重要的原因。”②很清楚,确实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的误解。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又存在着这样的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感到在别林斯基小组中很舒服。在那里,大家(包括别林斯基本人)都侮辱他。可以想象,这些侮辱给了这位当时已经体弱易病的青年以多么强烈的影响,它们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灵,以至于后来,过了25年,在别林斯基去世后,他利用了第一次机会来进行报复。就在登载上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话的那一期《公民》杂志上,您能看到许多最恶毒的、长期以来一直埋藏在心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9卷,第175页。

② 同上书,第172页。

中的针对别林斯基的意见。如果需要对早已死去的教师说如此恶毒的话，那显然是旧伤在剧烈地作痛，尚未雪耻的侮辱又被记了起来。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对的。有些东西人确实不能原谅，无法忘记的侮辱就是这样的东西。当你非常高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热情接受老师的信念时，而老师却把你推开，嘲笑你，这真是无法容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关系就是如此。当年轻而又充满激情的学生去老师那里做客时，他想倾听老师关于"受折磨的，最底层的人"的主题的评论，老师却在玩朴烈费兰斯[①]，说着不相干的事。这刺痛了当时还十分软弱、充满信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别林斯基又把他的学生看作负担。您知道吗？对于其他的老师来说，世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有太追根寻底的忠实信徒。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时，别林斯基已经要结束文学活动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他深深感到，有多么大的危险隐藏于任何思想的过分狂热之中。他很清楚，在思想的深处隐蔽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他力图停留在思想的表面意义上。他知道，事物的自然性在嘲笑人性。人性也只能在不可战胜的敌人面前俯首帖耳。您想一下，别林斯基的那封著名的信。在信中，他要求认清"每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兄弟"。这就说明，他的矛盾已充分暴露出来，他已不再满足于人性了。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理解这一点，也不能够理解。他以新信徒的满腔热忱在自己的言论和作品中常常醉心于"最底层的人"。可以想象，别林斯基怎

① 朴烈费兰斯，一种纸牌游戏。——译者注

么会听这位年轻的朋友的呢？而且别林斯基本人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自己的这些感觉和思想……

结果这位学生没有“重要的原因”就抛弃了老师。而老师甚至对《穷人》也已感到厌烦。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作品称为“呓语”。显然，他们的交往并不愉快。但即使是野兽也会跑向猎人的。两位朋友各自保存着短暂接触的沉重记忆。别林斯基很快就死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得不把这个敌对的老师保存在记忆之中长达30多年，不得不同那痛苦的矛盾搏斗。这一矛盾是他从激进的维萨里昂那里连同人道思想一起吸收来的遗产。在自己的晚期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使用“人道”这个字眼仅仅是用于讽刺，而且总是标上引号，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个词不简单，它真的值得！当他在为自己的杰渥什金而高兴，在和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以及格里戈罗维奇拥抱的时候，他能够相信这一点吗？

和别林斯基的决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经受的第一个考验。但他很正直地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他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而且恰恰相反，他仿佛更狂热地信奉它，尽管从一开始他就非常狂热，也许，这里用比较级是不合适的。第二个考验是由于彼特拉舍夫斯基的事而被逮捕一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先被判死刑，后又改为苦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变得坚强起来，不仅是外表，从他自己本人的回忆中看，而且甚至在他的心灵深处也没有任何动摇。他的回忆是在1873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对自己的过去感到厌恶和愤恨，在那个时候，他甚至打算唾弃过去。所以这个回忆有着特殊的价值，我们在这里完整地援引一下这个回忆：“枪毙的死刑判决事先向我们大家宣读了。这一宣读一点也不是

在开玩笑。几乎所有被判死刑的人都相信，判决就要执行，至少忍受了等待死亡的极其可怕而恐怖的十分钟。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我很清楚这一点）本能地陷入沉思，飞快地回忆着自己还很年轻的一生，也许在追悔自己的其他过错（这些过错每个人都一直秘密地隐藏在心中），我们常常为此而自责。但那些支持我们精神的思想、观念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不需要去悔恨，而且纯洁了我们，促使我们去受苦受难，为此我们要做出许多牺牲！这样持续了很久。流放的岁月，痛苦并没有毁掉我们。恰恰相反，没有任何东西能毁灭我们，只有我们的信念及责任感来支持我们的精神。"[①]这个人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就是这样回忆自己的过去的。就是说，他的心灵接近"最底层的人"，就是说，他和别林斯基的思想有着血缘关系，并且说明了最近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种看法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是被别林斯基小组误认为自己人的，而那时实际上他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倾心于另外的世界。顺便问一句，为何需要这样的捏造呢？难道是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誉吗？这又有什么名誉呢？难道必须当人还在幼年时期就具有足以信奉一生的"信念"吗？我以为，这里没有任何必然性。人一边生活，一边在向生活学习。那些活到老也没发现任何新东西的人更会以自己的免疫性使我们惊奇。这要超过我们对他的尊敬。然而，我这里并不想夸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免疫性。总之，这里不是谈论他的精神素质的地方。无疑，作家是一个超群的人，至少在那些决心研究他和在他死后许多年还在谈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 9 卷，第 342 页。

论他的人的眼中是这样的。然而正因为如此就不太需要再去描写和杜撰他的特殊的精神品质了。这里比任何地方更需要善于严厉地控制个人的好恶感，并且别用自己的信念来影响读者，无论这些信念多么崇高。在我们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心理学的谜。要找到解开这个谜的钥匙只能有一种办法，即尽可能地严格按照真理和现实去探寻。即使他自己公开说明了“自己的信念的蜕化”的事实：但他却对一生中最恐怖的事件不闻不问，这就使我们能够得出任何难以意料的和不合习惯的结论，这是对他本人的最无情的否定。这里说“恐怖”是不合适的。或者，换句话说，需要在自己身上找到战胜恐怖的力量。新的、刚被揭示出来的真理总是不像样的，就如同新生儿那样。但是，这时需要把它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生活和一切活动分开。因为他的生活是一种对刚才所说的“不像样的”东西的无意而不断的探索。要知道，人不是白白在地下室和苦役中度过许多年的。要知道，他不是无缘无故就从少年时代起看不见天堂，而只知道杰渥什金、戈里亚德金、娜塔莎、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卡拉马佐夫们的。显然，要寻求真理没有别的途径，只有通过苦役、地洞和地下室……然而难道通往真理的一切道路都在地下吗？任何深奥的东西都在地下室里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又告诉了我们其他的什么东西呢？

第四章

苦役刑满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满腔热忱地投入写作。他重新创作的第一个出色的成果是短篇小说《斯捷邦契科伏村和它的村民》。在这部作品中，最敏锐的眼睛也不可能发现作者是个苦役犯的迹象。恰恰相反，你会感到小说家是个无忧无虑、善良而很聪明的人。至于无忧无虑，例如作者给紊乱的状况安排了一个幸福的结局。当然，叔叔受尽了折磨，吃尽了福马·奥比斯金和将军岳母的苦头，但在关键时刻，他却表现出无比旺盛的精力，顺便说一下，和更加无与伦比的体力。福马·奥比斯金挨了叔叔的一下就被打出门去，滚到台阶上，又从台阶上滚到院子里。就这样，这位长期以来一直折磨大家的"霸王"立即威风扫地。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惩罚性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多写。他甚至不想把这位霸王惩罚得太重了。福马很快就回到了好客的斯捷邦契科伏村，当然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胡作非为了，尽管他为了不太难过还一直有点唠叨埋怨周围的人。大家都很满意，叔叔娶了娜斯坚卡。这种大团圆的结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任何一部作品中，无论是服苦役前，还是服苦役后，都一次也没写过。无论什么命运落到他的主人公头上，他们总是要自己不使别人痛苦，要别人不使他们痛苦。他们有的神魂颠倒、自缢、患震颤性谵妄症，有的因痨病而将要死

去,有的去服苦役。然而,在斯捷邦契科伏村,在最后一章为“福马·奥比斯金在创造共同的幸福”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再也没有在他的小说中重复出现。而结尾简直就是田园牧歌。……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惊讶地问:难道对于这个人来说,苦役就这样无影无踪了吗?难道有这样的坚定不移的理想者吗?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坚持自己的理想,并能够把任何的地狱都变成天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中还有什么没有看够呢?而在自己的作品中他还是很天真,就像正好20岁的青年人那样,还在用善来战胜恶……什么时候还会有杀人的现象呢?

无论这有多么奇怪,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刑满释放后只有一种感觉,一个愿望。这就是自由的感觉和忘掉一切受过的苦痛的愿望。为什么总要去想他曾经待过、现在别人仍在受苦的地方呢?他摆脱了负担,他振作起来,欢乐起来,并且重新又投入那个曾经抛弃过他的生活的怀抱。您瞧,“创作”和“现实”并非是一回事。创作时可以掉眼泪,用马卡尔·杰渥什金来写文学作品,但却应该回避苦役。他和作品的悲惨形象在一起可以一连几夜都过得很幸福。这就叫艺术的鼓舞力。这里愈深入地描写欺凌,愈无止境地描绘苦难,愈忧郁地揭示过去,愈没有希望地表现未来,也就愈具有作家的真诚,精通作家的本行。要知道,对一个艺术家的最高评价是这些话:“他捕捉并真诚地表现了悲剧的时刻。”然而,悲剧时刻的表现者却害怕现实的悲剧,害怕生活中的悲剧,这一点也不比一切其他的人更强些。

我说这个并非要责怪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如果读者能永远记住,我的目的不在于宣布有罪和无罪的话,那么我总是非常感激

他的。这会使我用不着做那些多余的,总是令人烦恼的说明。尽管这个话题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起的,但不是在说他,至少不仅在说他。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仅仅在于下面的铁的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每一个人那样,并不想要悲剧,而且千方百计地躲着它。如果躲不掉,由于外部的、不由自主的原因,那么就违背自己的意愿。他尽一切努力来忘记苦役,然而苦役却忘不了他。他全心全意地想和生活友好,但生活则不愿同他友好。这不仅从上面所说的小说中可以看到,而且他在苦役期满之后的最初岁月里所写的一切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从自己的新经验中仅仅只意识到,在地球上存在着巨大的恐怖和最凄惨的悲剧(对于作家来说这并不算多),应该把一切可能被解救的人都从这些恐惧中拯救出来。就正像在一艘就要沉底的轮船上救出一部分人来那样。正如他在《死屋手记》中清楚地写道的,当他独自思考时,究竟是什么使他振奋,什么给他信心、勇气和力量呢?是一个思想:他不该总去想那些被捕的同志,新生活在等待着他。他接受现实,他顺从命运,因为他在期望着别的东西。这就是他本人的话:"……我的心那时充满了各种期望。我想过,下过决心,起过誓,在我未来的生活里我不再犯我过去所犯过的错误,不再像过去那样消沉。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未来的计划,并坚定地执行这个计划。在我的身上复活了一种盲目的信心,我要完成这一切,我一定能够完成……我等待着,呼唤自由早点到来。我想重新认识自己,在新的斗争中。有时我急不可待。"[1]

---

① 《死屋手记》(*Эаписки иэ мертвого дома*),第 289 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苦役的。他想并能够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临时的考验。他仅仅把它和新的、伟大的期望结合起来评价。他也把整个苦役生活看作是这种新期望的光芒。这就使得《死屋手记》蒙上了一层温和的色彩。因此《手记》在评论界占据着特殊的位置。甚至那些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作品只看作是过分的、不需要的残酷现象的读者也对它予以肯定。在《死屋手记》中,残酷现象被认为正是需要的,当然,对读者是需要的。显然,这里也有可怕的、令人震惊的描写,囚犯的放纵和监狱官的冷酷。然而,他们大家都有"精神思想"。一方面人们想到,囚犯——"也是人,并且被叫作你的兄弟"。为了这一目的,在讲述苦役犯的兽性时,也描绘了一些死屋居民们的善良情感的图画。圣诞剧院、购买枣红马、监狱里的动物(山羊、年轻的鹰)——这些都是田园诗体的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正是以这样的艺术和真诚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艺术大师和一个具有伟大心灵的人的应有荣誉。如果他的心灵在苦役中没有变得冷酷,如果他经受了无法忍受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以后,还能够保留对一切人的同情心,那么显而易见在他身上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呵!从这里还可以得出一个哲学的结论,任何苦役都不可能战胜深邃的、真诚的信念……由于这一切令人鼓舞的东西和结论,最后一个留在"死屋"或者任何其他的监狱之中、戴着镣铐和锁链、终生受到宪兵监视的人被遗忘了,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其和活埋相提并论的无期苦役(天才的比喻,难道不对吗?)被遗忘了;同时人们忘记去探寻,究竟是什么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免于生锈呢?是不是他的心灵就是由纯金铸造而成的,还是这里有其他的原因呢?显然问题是有趣的。

最好不妨来看看金子心灵的说法，尽管证明它的真实性完全是多余的。

上面的那段引文已经会引起读者的疑虑：一颗金子的心期待的实在太多了！然而新生活的希望总是伴随和安慰着苦役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每次当故事中的人物只要有点特别感到自己的艰难处境，就会想起"新生活"。例如，在剧院的第一次演出后的夜间，戈良奇科夫偶然醒来。他说，"在恐惧中，我抬起头，借着六支一磅的公家蜡烛的颤抖的烛光，看了一下熟睡的同伴。我看着他们苍白的脸，白色的被褥，看着所有这些地道的穷光蛋和贫民。我真希望相信，这一切不是倒霉的梦，而是现实。"[①]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样处理这些可怕的景象的呢？要知道，最好的方法是用眼泪。因为任何其他的构思都不能说明他看见了。然而，在苦役中人们是不哭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能更详细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知道。这就是他的间接的回答："我不会永远地在这里，而只是待几年，我想重新把头枕在枕头上。"听见没有？只有这种回答才适合于上面提出的问题。我相信，你们已经发现了问题。在这里，剧院、山羊、枣红马的描写不是主要的。《手记》的其他地方遇到的人性的议论也不是主要的。关键可能就在于一点：苦役不是永远的，而只是暂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只是暂时的囚犯。他说，"在刑满之后，我还想生活。"[②]

① 《死屋手记》，第3卷，第168页。

② 同上书，第232页。

第五章

《手记》的序言严重地影响了正确理解《死屋手记》。为什么需要这一部分呢？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要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呢？好像《手记》是由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良奇科夫先生，一个因杀死妻子而服苦役的囚犯写成的。是为了检查吗？然而，要知道，《手记》中丝毫也没有隐瞒，戈良奇科夫是由于政治问题而被迫服苦役的。例如，当他忽然想参加囚犯们的意见时，其他的政治流放犯就提醒他，他的参加只能把一切都弄坏。“他们对他说，请想一想吧，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还有其他的地方也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手记》的作者不是一个刑事罪犯，而是一个政治犯。一句话，序言不可能蒙骗检查。如果说它欺骗了谁的话，那么就是欺骗了读者，使读者对说书人戈良奇科夫本人有一种不真实的理解。从序言部分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生活而已经永远死去的人。他没有同任何人说过话，甚至没有读过任何东西，他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的日子。他走出自己的小室只是为了用劳动来获得可怜的几个戈比。他在孤独地死去，他被大家所遗忘，他也忘记了大家。当然，还有一些被活埋的人不仅在监狱里，而且是在外面。然而这些人一般不写自己的回忆。如果写的话，也大概不会用《死屋手记》的腔调。他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可以看见囚犯

欢乐的眼睛呢？他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可以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中找到的各种“善”的感动的生命力呢？戈良奇科夫也许可以去描写暗无天日的永恒地狱（我重申，即便开始描写，这种人也写得很少）。他没有希望——难道这不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希望都完了吗？这我不想作为一个原则来引用（读者还没什么可以异议的），我暂时仅仅“从心理学上”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写《手记》的时候，在服苦役的时候，就曾是戈良奇科夫的直接对头。他首先是一个充满希望、伟大希望的人。所以他认识世界的方法，他的哲学也是希望的哲学。这就使他的心免于生锈，这就是他之所以能原封不动地保持服苦役前的那个完整的“博爱”思想的原因。如果他的心灵和戈良奇科夫的心灵一样总是在诅咒，那么博爱能帮助他吗？是像他自己所说，“信念”的精神在鼓舞着他，还是相反，无论它多么崇高，“信念”本身需要支持呢？这一问题提得非常恰当。戈良奇科夫没有写成《死屋手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成了。如果在这部小说中有时能发现明显的不一致，如果有时你看到一些个别的场面和意见突然破坏了“博爱”情绪的总的和谐，这就应该被看成是希望的表现。要知道，希望是最变化莫测的。因为它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许，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的时候，希望不止一次地抛弃过他，甚至长时间地抛弃过他。就在他感到自己确实永远和最后一个人一样的时刻，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些新的、可怕的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后来应该发展成完全是另一种哲学，一种真正的苦役哲学，没有希望的哲学，一个地下室人的哲学。所有这一切我们还不得不费许多口舌来说清。但是暂且不谈这个；暂且把“博爱”看成是不可动摇的，暂且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

只有一个想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去干过去的事业,只要更好,更纯洁,不后退,不软弱,不让步。暂且先不说信念的“蜕化”。事物的自然属性还没提高自己的嗓门,人性胜利了。

在这方面极其重要和有趣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时期写的政论文章。文章并不多。它们发表在1861年的《时代》杂志上。尽管这些文章大部分具有辩论的性质,但是平静的语调,对敌人的礼貌的态度,以及个人间体面的感情,相应的语言和思想的激情,确实是前所未闻的。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也不都是前所未闻的,他的政论(例如,他反对格拉多夫斯基的文章)有时也简直是不体面的,然而在整个文学界他的政论是前所未闻的。对手们往往只是力图用灵敏、机智、辩证法和学问来互相竞争。可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文章里,这类东西一点也没有。他不喜欢剑,而喜欢和平。喜欢杜勃罗留波夫的和平,尽管他的观点偏激,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喜欢斯拉夫主义分子的和平,尽管他指责他们极端轻视整个非斯拉夫文学的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求和解,这是值得注意的。就是那个在纪念普希金的演说中狂热地鼓吹团结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听到反对意见就忍受不住,立即抛掉了“披在”自己身上的全人类的爱的外衣。然而,同时不应该忘记(特别是那些认为他有预言才能的人),他是因为当时开始出版报纸《白天》,而反对斯拉夫主义者的。其实,也许相反,他们应该很快完全忘记和《白天》的争论,因为争论彻底毁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才能的名声。是呵,如果他不能预料到自己的未来,甚至是很近的未来,那么还有什么预言可谈呢?如果在1861年他还严肃而真诚地指责斯拉夫主义者不善于正确评

价西欧主义者的功绩，热烈地维护西欧主义者，而后来又亲自看到这些西欧主义者只是些嘿嘿窃笑的自由主义者，那么还有什么预言可说呢？一个人，即使是杰出的人，甚至是天才也会犯错误的。但是要知道，预言家之所以才是预言家，就是他总是准确无误地知道未来。我在这里谈的这篇文章很少有人知道。所以在这里引上文章的两三段并不多余。引文能最终使读者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中没有忘记自己的信念。这是第一部分（我几乎没有专门地选择，整篇文章都是用这种精神写成的）："说得很清楚：斯拉夫主义者的代表们显然是些诚实的人，而如果是这样，又怎么能谈论整个文学（特别是西欧文学），怎么能说文学'对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呢？怎么能够说：'对我们民族的指责不是由于愤怒的狂热（着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的），而是由于内心的不诚实，是由于本能地对任何荣誉和职责的仇视呢？'这是多么强烈的敌视呵！除了极端气愤的人，谁能这样说！……这里散发着火药味"。[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指出的句子引自《白天》的一篇文章。这句话使他生气，他不能忘记它，重新写下它，感叹着："你是怎么抬起手写下它的哟！"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举起手不再写这样的话了。谁一边谈论西欧主义者，谈论他们同改革前制度的斗争，一边又怀疑在他们的可见的笑容下面流着不可见的泪水呢？难道斯拉夫主义者由于"内心的不诚实"理解过别的什么东西吗？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暂时还怀疑他后来不得不补充说的一切。他暂时还"确信"站在西欧主义者一边："仿佛在西欧主义者那里没有斯拉夫主义者的那种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 9 卷，第 154 页。

俄罗斯精神和民族性的辨别力(着重是我打的)吗?有,然而西欧主义者不想像苦行者那样,对一些他们不理解的现象闭起眼,堵起耳来;他们不想把这些现象留下不解决,无论如何不想像斯拉夫主义者那样来敌视它们;对于光明他们不闭起眼睛,并且想运用智慧分析,通过理解来求出真理……西欧派早已开始转向现实主义,然而斯拉夫派至今还坚持自己的模糊而不定的理想。……"[①]还有,"西欧派走的是无情分析的途径,我们社会中只要可能的一切都能分析。现实主义者不害怕自己分析的结果。让这大量的现象中有虚假的东西吧,让你们津津有味地去反复读那些现象中的七拼八凑的假象吧。我们并不害怕对我们毛病的幸灾乐祸的指责。尽管这还不是真理,但真理在接近我们。我们相信这一点……"[②]等等,通篇文章都是这样的。从内容上来看,它并没有什么出色的。这类文章在60年代的杂志上到处可见。这里重要的只是一种情况,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不怀疑,他将会远远地离开这一切想法,尽管当时他已经40岁了,尽管他已经经历了许多,有和别林斯基的争吵,有苦役,有当兵。他不能想象,信念很快要抛弃他。他狂热地推崇现实主义、分析、西欧主义。而同时,他已经面临伟大的心灵转折的前夜。这是他给人道思想的最后贡献。过了不久,原来的理想崩溃了,无影的敌人使得它动摇。地下室时代开始了……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9卷,第159页。

② 同上书,第157页。

第六章

这一时代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显然，就正好是那个时候，当50年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的时候。农奴制废除了。一系列计划和已经完成的改革应允在生活中实现别林斯基所献身的理想。为了这一理想，当伊万·彼特罗维奇给娜塔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读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时，她哭了。以前只是在书籍中讲“最底层的人”，而现在他的权利是大家公认的。以前“博爱”只是抽象的，而现在人们却在生活中广泛地运用它。最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在60年代初也应该承认，平时非常缓慢和不太变化的现实这次和他们的理想相距已不太远。文学界举行过盛大的庆祝活动。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没分享大家的欢乐。他站在一边，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寻常的事一样。不但如此，他还躲进了地下室。因为俄罗斯的理想并不是他的理想。这一切和他没有关系……

如何解释这位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对我们文学界认为的俄国历史新纪元的事件是如此漠不关心呢？流行的解释很简单：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艺术大师，但是一个不好的思想家。这一流行的解释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更高的价值。然而，就像任何一个公认的东西一样，它受到了注意。它不是无缘无故地来到

上帝的世界上来的。人们需要它，但不是为了开辟真理的道路，而相反，为了堵死通往真理的一切道路，以便窒息真理，不给它以出路。其实，这并没什么奇怪的，如果知道，这里谈的是什么样的真理！怎么能不窒息它呢？它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感到恐惧！我在这里只引一小段地下室人的《手记》。这就是他对从公共房屋里走出来向他请求"精神支持"的妻子所说的话："……实际上为什么我该知道呢？这就是你倒霉的原因。我需要安静。我要别人不来打搅我，整个世界现在为了一个戈比就被出卖了。要不世界完蛋，要不我没茶喝？我说，世界完蛋吧，而我要永远有茶喝。"[①]谁会这样说呢？谁会想到让自己的主人公说出这样极端无耻的话呢？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不久前还以热诚的情感几次说过我所引用的那些关于最底层人的话。您现在知道，要把他抛向这样一个极端，需要多么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的打击呵?！您现在知道，他要揭示的是什么样的真理？噢，我们的政论家曾多次正确地找到过替换这种真理的替换物！

《地下室手记》，这是撕裂心灵的可怕号叫。这一号叫发自一个曾经使自己和别人深信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为最底层的人服务，而现在突然醒悟他一生都在撒谎、都在作假的人的肺腑。以前他一直认为是命运安排他来从事伟大的事业的。现在他却突然感到，他一点也不比别人更好，他很少有任何思想，就像一个平常的凡人一样。尽管他的思想多次取得胜利，尽管他们解救过农民，尽管进行过公正和宽大的审判，尽管破坏过服兵役，但是他的心灵并

---

① 《地下室手记》(*Эаписки иэ подполвя*)，第3卷(2)，第171页。

不因此而变得有任何轻松和快乐。他被迫对自己说,如果能出现一种不幸来代替这一切对俄罗斯是伟大而幸福的事件,也许他自己会感到不很坏,也许甚至更好些……怎么办,您说,当一个人在自己本人身上揭示出这种不合情理和讨厌的思想时,他该怎么办呢?特别对于一个作家,一个习惯于想他应该把自己心灵中的一切和读者分享的作家,该怎么办呢?说老实话吗?跑到广场上去,并且公开当众承认,整个过去的生活,一切说过的话都是谎言,是假的和伪善的,当他在为马卡尔·杰渥什金哭泣的时候,一点也没想到这有什么不幸,只是描绘几个图景抚慰一下自己和读者吗?而这一切又是在40岁的时候,当已不可能开始重新生活的时候,当和过去决裂就意味着重新埋葬自己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继续像过去那样说。几乎和《地下室手记》同时,他又写自己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小说中他努力表现弃绝私利的思想,不顾在这一思想的重压下所倒塌的一切。然而从哪里去获得这种经常不断的欺骗和自我欺骗的力量呢?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他已经很难坚持这种腔调了。在这本小说里,就已经有些篇幅披露出新发现的不祥的光芒。当然,并不太多。在那里地下室人仅仅可以在公爵和伊万·彼特罗维奇的谈话中看到(夜间在旅馆里),然而这就足以说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里隐藏着多么深的危机呵。公爵一直用最无耻的形象来嘲笑"理想"和"席勒",而可怜的伊万·彼特罗维奇坐着,就像落入了水中,不仅不敢辩护,而且甚至哪怕是维护一下自己的自尊也不敢。在小说中只要允许任何人这样尖刻地嘲笑自己的神圣的东西,这就意味着迈出了对这一神圣物否定的第一步。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让公

爵胜利了一次，而且很短暂。然后，在后面的篇幅里，所有的人物都仿佛在相互炫耀自己的高尚和自我牺牲精神。然而一勺焦油坏了一桶蜜。何况，蜜还不是真正的，而是人工的、伪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激情耗尽了。行善，为思想服务不再能继续鼓舞他了。

《地下室手记》是一个公开的（尽管还不是彻底的）和自己的过去决裂。“我不能，不能再继续伪装了，我不能生活在这种思想的谎言之中，而别的真理我又没有；随它怎么样吧”，这就是这一《手记》所说的，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注释中如何回避它们。没有一次，没有一个俄罗斯作家会说出这样没有希望、这样绝望的“话”。这句话说得是前所未闻的大胆（托尔斯泰伯爵说过“厚颜无耻”，要知道，这是他说尼采的），说着这句话，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自己唾弃最珍贵和神圣的人的情感。我已经说过，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叙述着自己亲身的故事。可是，不应该把这些话解释为，他自己其实不得不和自己偶然的女朋友关系这样难堪。不是的，当然，和丽莎的故事是虚构的。然而《手记》的可怕之处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哪怕是在思想上，哪怕是在幻想中做出这种难堪。他在这里不是把丽莎从自己身边赶走。我深信，在他的心灵里总是充满着由于要抑制愤怒和激动的强烈表现而带来的直接痛苦的感觉。他需要丽莎的形象只是为了要唾弃和诽谤“思想”，那个他一生为之而奋斗的思想。叙述这一可怕故事那章的篇首引文援引自一首著名的涅克拉索夫的诗的开头：“当从迷雾中走出的时候”。就是对这首诗，对那些他曾“狂热”地从他们那里接受新学说的人们的圣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疯狂而侮辱地谩骂起来。但是这对于他来说是唯一的出路。他不能再沉默了。在他的

心灵里一种自发的、无形的和可怕的东西苏醒过来了,但是他无力控制它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尽了一切努力来维护自己过去的信念。甚至就在他的心灵里已几乎没有任何想要他的祈祷被听见的愿望的时候,他还在继续为自己过去的上帝祈祷。他一直感到,疑虑就要过去,这仅仅是一种诱惑。在他临终的时刻,他(已经只能用嘴唇了)还在继续低声地祈求着:“显然,最底层的人也是人,并被叫作你的兄弟”。但是这些祈求的话不仅没有安慰他,而且它们是一种毒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毒药,尽管在这些话中出现过,至今仍然看见一些不危险的并且甚至能坚定意志的话……谁在这句话中感到的仅仅是兄弟情谊的诗,谁就会有好处!然而当最底层的人的渺小和荒谬还是放在首位的时候,怎么能谈得上这一点呢?如果你根据个人的经验了解到最底层状况的一切恐怖,又怎么会提出兄弟情谊的诗呢?什么时候兄弟情谊的诗已将为新进入生活的人所用,而你自己却不得不扮演马卡尔·杰渥什金,一个崇高心灵大为感动的角色呢?博爱的伟大思想当时说明了什么?对未来的希望,当然,还很遥远,是其他幸福地安排人类的生活的幻想吗?……而一切“美和崇高”的鼓吹者现在还一直起着讨厌和伪善的作用。……美和崇高用引号括起来不是我杜撰的。我是在《地下室手记》中发现的。在那里一切“理想”都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在那里的席勒、那里的博爱、涅克拉索夫的诗、水晶楼,一句话,那里所有的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灵振奋和感动的一切,——这一切都毁于一场最恶毒和最原始的讥讽。因此理想和激动在他身上唤起的是极其厌恶和恐惧的感情。不是他想对实现理想提出异议。关于这一点他现在不去想了,也不想去想了。

如果什么时候注定要应验他少年时代的伟大的内心的幻想，那么则更坏。如果什么时候人类幸福的理想在地球上实现了，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会咒骂它。直率地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没有一个人胆敢说出这种想法，尽管也有相应的注释。只有极大的绝望才能在人的头脑中产生这些想法，只有超人的胆量才能把它们提到人们的面前。

这就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也不承认这些想法是自己的，并且常常保留一些装装门面的理想。但是他越为这些理想歇斯底里地叫喊，它们就越深地和他秘密的愿望相分裂，看来，和他所有的愿望相分裂。他的最晚期的一些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渗透着这种分裂的两重性。试问，我们要在这些作品中寻找什么，珍惜什么呢？用托尔斯泰喜欢的话说，不管“良心和理智”，是迸发出来的他的心灵需求呢？还是或多或少老一套的崇高生活的方法呢？真理在哪一方呢？“良心和理智”一直被认为是最终的法官。我们的理想和希望的所有一切都是由它们来构造的。然而，现在，在这些法官的上头又出现了一个法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听从他的声音，还是依然坚持永恒的传统，重新使他沉默呢？我说“重新”，因为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个声音了，但总是充满了恐怖，为了老的法官们而用高声的吼叫来压倒它。即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是这样做的，尽管在这方面他的作品很像以同不道德做斗争为借口而描绘着诱人的有趣图画的那些说教者的言论。无论人们对传统说些什么，但已不可能怀疑它。应该了解人的本来面目。早些为他减轻些罪过。让他只说真话。也许(谁知道呢?)，也许在这种非常难听的真话里，第一眼看上去就存在着某些比最冠

冕堂皇的假话的诱惑力更好得多的东西吗？也许，完全不应该把痛苦和绝望的一切力量用于为人们准备适用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学说和理想，就像至今人类的导师们所做的那样？这些学说和理想总是热衷于使自己本身的疑问和不幸免被别的眼睛发现。也许应该抛弃骄傲，揭开蒙在死亡外面的色彩和一切外表的伪装，重新努力窥视那遭诽谤的真理呢？如果按老的说法，认识之树就是生活之树，这有什么错的呢？值得认真研究一下这种偏见及其自然发展的决定论了！也许，受到这一神圣理论折磨的痛苦心灵将在自己身上找到新的斗争的力量……

第七章

这就是一种信念产生的最初时刻：对在苦役中曾幻想的新生活的希望消失了，同时对以前曾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和永远真实的学说的信仰也熄灭了。毋庸置疑，不是学说支持着希望，而是相反，希望支持着学说。按照这种思想来看，对于人来说，千年的“理智和良心”的国王结束了。新的时代——“心理学”的时代开始了。这一时代在我们俄国首先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开拓的。顺便说说，“理智和良心”，作为一个方面，“心理学”作为另一个方面，它们之间的直接对立至今很少有人敢公开地承认。大多数人事先就认为可以维护旧的等级。按这种等级，心理学就不得不处在从属的地位。它的任务只是说明人心理中发生的一切，而过去最高的立法权属于良心和理智，由它们决定“什么应该”和什么不应该。即使那些最能促使心理学发展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例如，托尔斯泰伯爵至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在几十年的岁月中曾以自己的作品破坏了我们对任何必然的规律性的信任，却至今仍在继续把“理智与良心”赞美得高于一切。他有一种特殊的艺术，在说这些词的时候，运用一种语调，使得任何对这些词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的怀疑开始成为可恶的亵渎神明的行为。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来都不能和托尔斯泰伯爵相比的。可是，无论是托尔

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能够把无法结合的东西联系起来。他们竭力追回老的“褒义的词”的努力只证明了一点，破坏一点也不比建设更容易些；而且要难得多。只有决心破坏的人，才是已经不能过另外一种生活的人。如果在这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走着托尔斯泰伯爵的道路，那么绝对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诚实和正直的人。绝不是这样的，决心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别的原因。人总是尽力维护他在遗产中得到的信念，只是当完全不可能坚持的时候才罢休。从《少年》的后记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用托尔斯泰伯爵的精神来创作。他说，“还是普希金就在‘俄罗斯家族的传统’中发现了自己的未来小说的题材，请相信吧，我们以前的一切确实是美好的，至少我们多多少少做了一点事情。”然后，他进一步谈那位利用普希金发现的主题的小说家，他继续说：“这种作品，由于伟大的天才，与其说已是属于俄罗斯文学的，倒不如说是属于俄罗斯历史的……这些作品的主人公连续出现了三代，并且和俄罗斯历史联系着。他们构成了一幅反映中高文化层的俄国社会图景。这些人物的后裔继承了祖先的衣钵，他们作为现代典型只能被描写成厌世的、孤独的和必定忧郁的样子。甚至应该是一个怪人……”如果回忆一下，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安娜·卡列尼娜》称托尔斯泰伯爵是中高层的历史学家，那么在上面的引文中谈到《战争与和平》以及这本巨著中的主人公时就一目了然了。托尔斯泰笔下形象的美和完整性征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渴求生活的稳定、明亮和充实；但是他应该承认，这种“幸福”已经永远被历史吞噬了，现代人只能够在记忆中保留那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他屈从于命运，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孤独的、

厌世的怪人。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判断不完全正确。当然,他自己在《战争与和平》的人物中间没什么可做的。对于他来说,这些人是历史,仅仅是历史,然而他们的创造者,托尔斯泰伯爵却用另一种态度来看待他们,根本不愿把他们送回到过去的幻影中去。相反,他想在他们身上看到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娜塔莎、罗斯托夫、玛丽亚公爵小姐是些刚刚过时的人物,他们不得不让位于新的"孤独和厌世的人",也就是地下室的人。托尔斯泰却坚持,他们都是当今的主人公。确实,有时坚持得太过分、太强烈了,以致在某些程度上已露出了马脚。《战争与和平》是那种不仅需要回忆和叙述,而且还需要遗忘和沉默的人的作品。这里没有在《上尉的女儿》中能感受到的那种自然的稳定性和坚定性。托尔斯泰伯爵不再像普希金那样,用叙述者和艺术家的作用来限制自己。他常常检查自己的主人公的几乎是每一个词的真诚和真实性。他要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知道往哪走。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也是心理学家,也在寻根。然而要知道,一切的根都深深地埋在地下,也就是说,托尔斯泰伯爵熟悉无声的、地下的、地下室的工作。人们常常归咎于他的那种荷马的、古代的幼稚,他却没有达到,尽管他全力追求着它。在这些方面"自由的意志"改变着人。他希望有一个信念,但检查却否定了每一个信念。托尔斯泰所以使得读者难以琢磨,应归功于自己的伟大的艺术天才。为了创作出杰出的作品,俄罗斯大地上的这位艺术大师多么需要艺术,我几乎要说,多么需要艺术性呵。不仅是创作,而且托尔斯泰伯爵的一生都烙下了和"心理学"、和地下永远斗争的印记。但是现在谈他的生活还为时过早。他的作家活动是一种

不懈的努力，用各种方式（力量、狡猾、欺骗）来战胜那个在最深层挖掘幸福和光明生活的可能性的顽强敌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十分重视地下活动，正确地、经常性地注视，然而总是装出根本不重视的样子，认真地用“理智和良心”来解决一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地下室人发现了自己生活的虚伪，就感到恐惧并立即和自己过去的一切决裂。在托尔斯泰伯爵那里，他的主人公们从来也未停止相信“美和崇高”，即使在那个时刻，当在他们面前充分明显地表现出现实和理想不一致的时候。他允许现实行使自己的权利，但一分钟也未终止对理想的尊重。例如，俄国军队的失败、莫斯科的沦陷等等没给任何未直接参加军事行动的《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们以过分忧郁的影响。托尔斯泰伯爵不止一次指出这种情况。所以他自己说，应该获得地下室人对丽莎说的那些话的同样印象：“我说，让世界完蛋吧，而我总是要喝茶的”。然而这种印象却没得到。例如，尼古拉·罗斯托夫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谈话，当然，在他们的谈话中没有回避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但是他们是怎样对待发生在他们眼前的这场大悲剧的呢？“谈话是最简单和无足轻重的！他们谈论着战争，不由地像大家一样，夸大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悲伤。”托尔斯泰伯爵还进一步说明：“显然，关于俄罗斯的不幸，她（玛丽亚公爵小姐）可以去虚伪地说，但是她的兄弟却和她心心相印，她不想，也不能稍稍地提起他。”这些言论对于《战争与和平》来说有着特别典型的意义。托尔斯泰伯爵在所有只要可能的地方，都提醒我们，对于1812年的优秀人物来说俄罗斯的不幸要比他们个人的痛苦小得多。然而，从表面上来看，他说这些话时，善于保留不平常的心灵的明晰性，就像什么

事也没发生那样，就像确实理智和良心能够平静地看待这种骇人听闻的利己主义的表现那样。的确，理智和良心是平静的。显然，它们需要的只是表面的荣誉，需要和它们说话只能够像和为所欲为的霸王说话那样，用众所周知的语调，这样它们才变得完全顺从。例如，如果玛丽亚公爵小姐不“伪善地”说俄罗斯的灾难使她痛苦，而直接声明，用地下室人的方式：“是俄罗斯毁灭，还是我没有茶喝？我说，让俄罗斯自己毁灭吧，而我要有茶喝”，那么理智和良心会怎么看呢？其实，在托尔斯泰伯爵那里公爵小姐玛丽亚、尼古拉·罗斯托夫都正是这样说的。而这部长篇小说的所有的其他人物（当然是优秀的人物，只能是优秀的，最坏的人物不会让自己这么坦诚）在爱国激情方面都只稍稍超过了他们。最后，托尔斯泰伯爵用迂回的方法把一切都归为人的利己主义的表现。然而美和崇高不要用引号，它们仍保持着自己过去的荣誉。托尔斯泰伯爵以为可以不费劲地反映出生活的本来面目。他小心地，不让读者发现，从理智和良心那里抽去了主权，使之成为事物本身的尺度，简单地说，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尺度。然而他渴求理论上的彻底胜利（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真理的准许”）并且所以不公开打破一切旧的权利，而只是用事实和逐步地（托尔斯泰伯爵总是逐步地做事）消除它们对生活的任何影响。他知道怎么办。他在某些场合还必须维护旧权威的威望和魅力。当然，他已不再为它们服务了，但是它们还要为他服务。在一切那种场合，当他自己个人的力量不能够去斗争的时候，他就去请求它们的神奇的帮助，而它们就用自己权威的声音在困难的时刻来帮助他。

第八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研究《安娜·卡列尼娜》时，顺便指出："安娜·卡列尼娜绝不是一个无辜的女人。"当然啦！他自己想要成为一个非常公正的人，以便在托尔斯泰伯爵的创作中只看到诗的意境。可是，奇怪的是，在《安娜·卡列尼娜》最后部分出版前不久（是分几次出版的），也就是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列文称为一个具有"纯洁心灵"的人。难道真的在某些场合中应该非常小心谨慎地对待公认的话吗?！要知道，纯洁心灵的人，这就是一个"无辜的人"，而列文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主人公，在他的身上包含着长篇小说的全部思想。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角色在说话的，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仍然坚持任何一种理想。所以他对列文用了非常幼稚天真的温柔的修辞语。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清楚列文的价值。既然他一开始就打算把自己的看法埋藏在心里，那么这就是他如此评价列文的重要原因。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一部分中托尔斯泰伯爵让自己来嘲笑自愿运动的热情。这一部分的出版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恼怒，并且使他比文学界和一个忠实的宣传者的职责所要求的要说得更多些。而且托尔斯泰伯爵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给"地下室的人"以非常广阔的天地。例如，列文就直接表明，"对斯拉夫人的痛苦没

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直接的感触”，并且他在一位老公爵（从长篇小说的进程来看，显然是一个作者认为是非常善良的人物）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公爵说，“我真是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罗斯人突然都如此热爱斯拉夫兄弟，而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爱……但是，我到这里来，心情就平静了。我看到，除了我以外，还有人只关心俄罗斯，而不是斯拉夫兄弟。这就是康斯坦丁。”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的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嘴里发表出这样的议论是不合适的。大家都可以这么说，但要附上相应的说明，至少哪怕是这类形式的东西，就像《战争与和平》中说的那样。在那里，人们即便是感到自己对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也至少要装着非常关心战争，这样仿佛是在承认自己的“罪过”。这里的列文毕竟是一个直率的人，他表明，不想知道任何关于斯拉夫人的痛苦。还需要补充一点：只要我一切都好就行。但托尔斯泰伯爵没有这样大的胆量，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已不得不自己让列文说上几句这类的话。[①]

就对斯拉夫人的痛苦的同情，这两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理智和良心”，这些在托尔斯泰伯爵看来是绝对正确和值得赞扬的法官却被这两位一样杰出的伟人加以不同的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分歧的可能性中痛苦地感到非常遗憾，并且悲伤地结束了自己的文章：“像《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那样的人是社会的老师，我们的老师，而我们只是他们的学生。而他们究竟教我们了些什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 11 卷，第 264 页。

么呢?”

然而,预言家们的分歧是纯属偶然的事件!如果不是斯拉夫人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找到像《战争与和平》中那样吸引他的一切因素,而读者也不会知道,“理智与良心”并非总是用同一种语言来说话。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白白自寻痛苦了。就让列文比应该的更尖锐地表达自己对斯拉夫人命运的麻木不仁吧;就让他去泄露“歌手的秘密”吧。但是他一有机会,要不就没有任何机会,就奉承别的、非常崇高的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完全陌生的理想。和斯拉夫人脱离关系并不标志着他准备侵犯“良心和理智”的主权。相反,按自己的一般习惯,托尔斯泰伯爵如果决定干什么不平常的事,只是因为“良心和理智”的大仁至圣的赞许。例如,请想一下,在长篇小说第六部分第三章里列文和妻子的谈话,列文一会儿“不满意自己”,一会儿感到自己“有罪”和“与别人相比是个坏人”,甚至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相比(这个人他一直在心中仇恨着,并千方百计努力鄙视他),一句话,最严格的良心和最严密的理智应该由非常忠实的感情来加以满足。列文心灵的特别易感动和柔软在这种场景中已几乎像是在演喜剧。他的这种“善”的表演使人想起果戈理的执事对索洛哈的照料。然而托尔斯泰伯爵没有讽刺自己的主人公。不,他是一个严肃的人,尽管看来在心灵深处能感到在这方面隐藏着对理想的冲击。他的列文越更多地把自己锁在个人兴趣的狭小圈子里,他就越“无耻”地赞美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无耻”这个词用来谈尼采,正义感要求他把它用到列文身上)……

噢,《安娜·卡列尼娜》绝不是一个无辜的东西!列文在绝望,

列文看见自己站在通往永恒的地下室的道路上，站在走向露天服苦役、死亡的道路上，他想逃避，又不知道逃避的办法。“心灵纯洁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无缘无故地夸他的。因为老鸦闻到了腐烂的气味就会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只请好好地想一下列文的生活，您就会确信，当他对善表示深深的谢意时，他不仅对善说谎，而且当他使自己和吉提相信他是幸福的时候，他还欺骗了“幸福”。一切都不真实，从第一个词到最后一个词。列文从来也没幸福过，无论是当他成为吉提的未婚夫时，无论是当他和她结婚的时候。他只是假装幸福。确实，难道像吉提这样的老实姑娘（谁愿意，就可以把这个修辞词去掉）合适做列文生活的女友吗？难道他会爱上她吗？总之，难道家庭生活对列文来说是一种合适的气氛吗？描写这奇怪的一对的场景，无论它们是由多么特殊的努力和不平凡的天才所写成，都为我们把列文描写成了一个有决心的人。他决心完成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幸福和相爱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婚礼的前夜，列文一整夜都没有睡，头脑糊糊涂涂的，就像一个未婚夫所应该的那样，至少要准备拥抱所有的人，等等。吉提怀孕了，列文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四处张罗，担心。最终，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和幸福的丈夫来做客，就像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机会，他为妻子安排了一个最荒唐的嫉妒场面，眼睛里冒着火，拳头捏得紧紧的，做出了在这种场合下所能做的一切。这一切的结局是赶走了瓦先卡。信仰基督教的温顺的列文并不想去侮辱土耳其人，但想也没想就直接粗暴地把客人轰出去。而且他不仅没因此而后悔，还感到高兴。这不是因为自己的大胆，这一点他根本没想过。他高兴的是，他可以和所有的人一样去嫉妒，并且由于嫉妒而跨越

任何界限。在自己的一封信中，托尔斯泰伯爵说，他极其厌恶地写着《安娜·卡列尼娜》。我以为，如果这里是指列文给他出了个什么难题，那么我相信是可以说通的。还有什么比无论如何必须描写一个幸福和“善良”的人如此和善格格不入，远离幸福更令人厌恶的呢？而且同时托尔斯泰伯爵的一切用意却恰恰在于此。他无论如何也要把列文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也就是让他去经营，给他家庭，等等。在省里选举的时候，列文和一位熟悉的地主有过一段看起来不重要却值得注意的谈话：

“我听说，你们结婚了？”地主问道。

“是的。”列文自豪地回答道。

自豪！这里有什么可自豪的呢？一个人结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对于列文来说，结婚并不是一个像大家一样的简单的结婚。结婚对于他是一个证明，证明他并不比别人更坏。因此，他，不管自己的习惯怎样，与其说在相信自己对吉提的爱情，倒不如说是在为这一爱情寻找相应的外部表现。因为他原谅了吉提的过去，愿意接受渥伦斯基抛弃的猎物，就像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公爵那样。放弃家庭对列文来说就意味着注定要使自己的财产减少很多，就意味着丧失了一个大家公认的生活基础，而这对他是最可怕的。他和吉提结婚了，就像和杜丽或者随便一个对他来说不是太不舒服的、很体面的自己圈子里的女人结婚一样，为的是给生活的表面披上一层优雅的色彩。而他的爱情、关心、嫉妒——这只是想在别人和自己的眼前演一出喜剧。

当然，这样的结婚会在人身上唤起一种自豪的感觉：他自言自

语地说，我是有依靠的。列文所做的一切，确实是一切都有一个目的：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牢牢地扎根于大地，所以任何风暴已不能把他吹倒。列文的任务同时也是托尔斯泰的任务。而且伟大的作家知道，也存在着正在堕落和已经堕落的人，这些人已爬不起来了。他常常谈论他们。他在构想使我们和堕落和解的理论。然而自己应该和堕落者同流合污，把自己的财产减少到最低限度，放弃人类和上帝法律的庇护吗？关于这一点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同意。任何都比这好。最好是娶了吉提，最好是去经营产业，最好在善的面前伪装起来，最好是欺骗自己，最好是像大家那样，只是别脱离人们，只是别被“活埋”了。这完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而区别在于，在托尔斯泰伯爵那里还有回归人的纯表面的可能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已经没有。托尔斯泰伯爵还有希望，并且一直到自己一生的终结，他还在同那从来没使他长久安宁的、无望的可怕幽灵做斗争。

第九章

这一斗争本身决定着托尔斯泰伯爵的整个创作。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天才人物无论如何渴求把自己和平凡人相比，自己企图成为平凡人这样的唯一例子。当然，他并没有成功。不管他多么想使自己免于本性的质问，本性却每次都不可抑制地在他的身上闪烁着。显然，在《战争与和平》中他就已经给自己一生的情况和观察做了最后的总结。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确定的和牢靠的，有自己的分量。主要是描写了总的说来令人鼓舞和振奋的图画，尽管在这幅图景中一点也没忘记生活的恐惧，这恐惧在动摇着人们对亲人和上帝的信任。安德烈公爵在经历了生活的折磨之后痛苦地死去，法国人打穿了别佳·罗斯托夫的头，在我们的眼前，老伯爵夫人在变成半个白痴，伊利娅·安德列耶维奇伯爵弄死孩子，悄悄地逃掉，索里娅成为一个食客，等等。然而所有这一切在画面中呈现出来不仅没有减弱，而且更加强了整部小说鼓舞人心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也不能够知道托尔斯泰艺术的这个秘密。他以为，严厉的吆喝，命令的语调和坚决的肯定，说些有道德的和神圣的话，总是能够平息他自己和每一个人心中的不安的。例如，在《白痴》中，梅什金公爵起着调解人的作用。他碰上了下面一段最有代表性的对话。在花园里的夜读之后，注定要死的伊波

利特在花园遇到了梅什金公爵，并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请您直率地告诉我，”他问道，“依您看，我怎样死最好呢？也就是说怎样更合乎道德呢？喂，您能说吗？”你们喜欢这个“问题”吗？！按照长篇小说的意思，梅什金公爵应该总是出类拔萃的，他应当善于理解一切，并且能够胜利地摆脱最艰难的处境。然而，这一次，应该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遇上伊波利特，就是决定嘲笑一下自己的主人公。难道会有其他的目的来提出这种问题吗？无论你怎么费劲，你永远也不能够回答清楚，甚至哪怕是稍微满意一点的回答。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为了更合乎道德哩！”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按照地下室人的老习惯，突然不可抑制地想表现一下自己聪明的语言了。如果说伊波利特的提问是粗鲁的，那么梅什金公爵的回答则是可恶的。这就是他的回答：“请别问我们，原谅我们的幸福，公爵轻声地说道。”伊波利特当着他的面哈哈大笑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足够的决心让这个生病的孩子顺从公爵的权威。轻声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最有影响的，但它却没起到任何作用，即使是像“原谅”这样具有魔力的词……噢，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利用深色调。他以为，给图画好好地想出一个虔诚的名称和内容就行了。或者说得更清楚些，他想得到对伊波利特的问题的真正回答，而不是仅仅给读者一部文艺作品。托尔斯基伯爵则不同。他深信，答案是没有的，而需要的是用艺术虚构不仅把读者，而且还要把自己和现实分开。《战争与和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一部杰作的。在那里一切都是故意安排的。因为小说中无论细节还是重要的地方，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粗鲁的问题并没被遗忘，但它们不仅没有使读者不安，而

且在阅读时甚至感到已经解答出来了。任何人都没走到正在死去的安德烈公爵身边,轻声告诉他自己是怎样洞察世界的秘密的。相反,周围的人都沉默着,只是沉默着。他们被这一事件的神秘和严酷所吓倒,不知所措。大家对安德烈公爵说的都是一个要到另一个世界上去的人所只能够希望的恭敬话,谁也不敢再用苛求去激怒他。要知道,这是根本和永远埋葬这个早逝的人的唯一真正和可靠的方法。托尔斯泰伯爵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学会了这一方法。更多的悲痛、顺从、眼泪、庄重——所有这一切开辟了一条通往新生活的途径,所有这一切最终将弥补任何损失。然而即便是托尔斯泰伯爵,这一点做得也是不够的。他只是这样把一些死人送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因为这些死人已完全不可能对活人有任何意义。为了这一目的,他甚至不嫌弃利用叔本华的哲学,这一哲学刚刚才依照文艺创作的要求修改过。安德烈公爵死的时候没变成"任何东西",没有。他只是回到了他来的那个地方。丧失的仅仅是个性,但是丧失得太多了,以至于还在死前的一段时间里一切活的东西,甚至自己的儿子,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和无所谓的。这种纯粹的叔本华的"心灵不朽"在托尔斯泰伯爵的描写中特别抚慰和鼓舞了活着的人。死就是从生活中醒来……"就生活的延续来说,他(安德烈公爵)并没感到它比就梦的延续来说从梦中醒来更慢些"。上面引的几行话由托尔斯泰伯爵几乎逐字逐句地引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就像是整个关于死的理论一样。这很奇怪,托尔斯泰伯爵一般说来不喜欢引用,但是这次却是例外。显然叔本华的观点是非常急需的。当然,他承认的并不是真正的不朽,也就是说,不是死人的不朽,而是活人的。谁会去想死人呢!让他们

在棺材里好好地躺着吧，而活人却要把握生活。所以，应该不是从死人的角度来研究死，而是从活人的角度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托尔斯泰伯爵的描写是完善的顶峰。看起来，仿佛他已达到了人类认识的极限。看起来，再往前一步，生活的伟大奥秘就将展现在你的眼前。然而这却是一个错觉。其实正好相反，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秘密永远是秘密。死完全是一种和生活迥然不同的东西，因此活人是根本不会理解的，安德烈公爵死的时候，丧失了自己的人性，而人性逐渐地融化和消化在完全是别的东西之中，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这个别的东西，这个"自在之物"(Ding an sich)或者"意志"，无论如何是康德和叔本华创造的东西，就是等待人的"不朽"。对于活人来说，这么大的概念是非常有趣的。而死人对于这个不朽又不会说什么。顺便说说，海涅是托尔斯泰伯爵所喜爱的诗人，关于这一方面他晚期的一些诗歌向热心的人说了许多。因为这位伟大的德国抒情诗人是非常正直和真诚的。然而托尔斯泰伯爵不想把自己和那些没有确切希望的人们混淆在一起。安德烈公爵的事情不是他本人的事情。只是需要用适当的形象使安德烈公爵从生活中消失掉。需要把他更深地埋入地下，并且在坟墓上再压上一块巨石，以便死者不会站起来并且不再搅扰活人夜间的睡眠，或者最好，应该把他变成"自在之物"。托尔斯泰艺术的任务就在于此，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也在于此：生活的一切可怕问题，应该都这样或那样地把它们变成不可认识的东西。这样，曾被幽灵吓坏的人们所认为在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宁静才会降临大地。在康德那里这还不太明显，他的恐惧总还是具有纯理论的、抽象的性质。只有威胁要破坏科学的必然性信念

的休谟的怀疑主义才是他的幽灵。然而托尔斯泰伯爵碰上了另一个怀疑主义: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威胁要吞噬他的深渊,他看到了死亡在地球上的胜利,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具活尸。他充满着恐惧,他诅咒自己心灵的一切最高要求,他开始学会平凡和中庸地生活。他确信,只有平凡和中庸这些因素能够建立起一堵墙。这堵墙哪怕不能永远,至少可以长久地使眼睛避开可怕的“真理”。这样,他先验地找到了自己的“自在之物”和自己的结论,也就是说,知道了怎样摆脱一切疑问,并建立坚定的原则。人可以按照这些原则来生活。我认为,谁也不会对这个“也就是说”的合理性提出异议。因为,要知道,这些先验的结论的重要意义不是在于它们的产生,而是在于它们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普遍性和必要性。而关于“自在之物”在后面还要谈。

第十章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对自己的弟子们说:"为了谁也不能够了解我的内心深处和知道我的最后的意愿,我让自己永久地保持沉默。我曾见到过许多聪明人:他们都遮住自己的脸,并且把水搅浑,以便任何眼光也不能看清他们。但是向他们走来一些更聪明和好怀疑的会猜谜者,并且从他们那里捕住了最好的隐藏着的鱼……光明的、勇敢的、毫不掩饰的人是最聪明的沉默者。因为他们的底是非常的深,以至于最清澈的水也不能照见他们。"尼采本人不是这样的聪明的沉默者:他把水搅浑了。然而这些话能够完全适合于托尔斯泰伯爵。他光明、毫不掩饰、勇敢,但谁都能想到,还需要更深入到他的心灵底层去,在这个底层有些什么怪物呢?他本人就爱称自己的生活是"尘世间特别幸福的"。而且早在青年时代你读他的作品,就会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一光明、清晰和毫不掩饰的内心深处!看来,托尔斯泰伯爵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理解;看来,搅扰人的生活之谜和矛盾只是诱惑人的诱饵。而一切现实的不稳定性仅仅是欺骗的幌子。在托尔斯泰伯爵那里没有"不稳定性"这个词。例如,请想一想《战争与和平》的结语。在尼古拉·罗斯托夫的舒适的餐厅里,在茶桌旁边聚集着这个大家庭的心满意足而又兴高采烈的成员,难道他们还有这样没有解开的疑团吗?

确实，彼埃尔从彼得堡带来了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威胁着并仿佛要破坏秃山居民和平幸福的生活。然而，要知道托尔斯泰伯爵拒绝写“十二月党人”，而写《战争与和平》。十二月党人跟着安德烈·包尔康斯基一起被送入了自在之物的领域，按照康德的理论，人类意识的一切二律背反都属于这一领域。而对于生活的先验(a priori)结论是由这方面最合适的人来作为表达者的，即尼古拉·罗斯托夫。您乐意听听先验论的语言吗？彼埃尔·别祖霍夫含糊不清和发音不准地谈论着自己在彼得堡的交往的一些事情。“在法院里到处都是偷窃，在军队里只有一条：步法操练，迁居折磨着人民，教育窒息着人民。一切生气、正义都遭毁灭！大家都清楚，这不可能长久。所有拉得太紧的东西，很快就会断裂。——彼埃尔说，自从有政府存在以来，无论什么政府人们总是要注意它的行动，谈论它”。你们明白，这是休谟怀疑主义的论调。让它们自由泛滥吧，对《战争与和平》的一切努力原来是徒劳的。就是说，必须改变谈话的方针。这就是尼古拉·罗斯托夫说的话。作为一个爱臆想的人，他不爱证明而只重视普遍性和必然性。他是这样直率地向彼埃尔声明的：“我不能够向你证明。你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可恶的。我并不这样看……阿拉克切耶夫让我和骑兵连上你们这来(指彼埃尔和他的彼得堡的朋友们)，我一秒钟也没想到杀人就来了。”……话说得不是真的太妙了吗?！确实，难道彼埃尔能够证明什么吗？因此，难道康德不对，难道我们能够没有先验的结论而生存吗？这里说的所没有的，不是总充满矛盾的和不确定的深奥的想象，而是任何时候也不会改变的力量，换句话说，是必然性。托尔斯泰伯爵在写《战争与和平》前不久就经受了许多“良心”的体

验。这不是康德和罗斯托夫的那种有行为准则的良心，而是一个天才自己本人的良心。你们知道，这意味着：这里不仅先验的结论，而且几乎任何结论都没留下。然而人又怎么能没有结论，没有信念生活呢？这位俄罗斯大地上的伟大作家终于看见了信念是如何诞生的，并且明白了罗斯托夫比包尔康斯基有多么大的优越性。所以包尔康斯基决不能再活下去了。还能把他往哪安排呢？而罗斯托夫，哪怕让他活上100年，他也不会把你引上陌生的、虚伪的道路（在这里，陌生的和虚伪的显然是同义词）。请看，托尔斯泰伯爵对罗斯托夫有多么深的敬意呵。“他对我们说，在他（尼古拉）死了以后，在人民中间长期一直保留着对他的管理的十分虔诚的记忆。”十分虔诚的记忆！长期一直保留着！请再看一看托尔斯泰伯爵所写的一切吧，他对自己笔下的任何一位主人公都没说过如此赞赏和感人的话。你们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平凡的人凭什么赢得如此的赞赏呢？然而这恰恰是因为他自己的平凡：罗斯托夫知道怎样生活，所以一直是坚定的。托尔斯泰伯爵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整个创作活动评价为像这样牢固的认识和坚定正确。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发现过。他只能够塑造罗斯托夫，当然，他就不得不夸耀自己崇高的形象了。这个“十分虔诚的记忆”，就像《战争与和平》的整个尾声那样——是一个大胆的、有意大胆的召唤。这一召唤是托尔斯泰伯爵向所有有教养的人，看来是向我们时代的整个良心发出的。这确实是一个有意识的召唤。因为托尔斯泰伯爵清楚，非常清楚他在做什么。“我拜倒在罗斯托夫的脚下，而不是普希金或者莎士比亚的脚下，这一点我向大家公开声明。”——这就是《战争与和平》尾声的思

想。应当注意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①]杂志时代和他的最早的文学政论经验产生的时代,那时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也遭否定,他们至少不是和一个有知识的地主相对立,而是和整个俄罗斯人民相对立。这还并不太奇怪。俄罗斯人民总是具有伟大的"思想",一条飞毯。在这条飞毯上不是一个读者或者作家能够完成自己云外的游行的。然而罗斯托夫,要知道在他身上甚至没有任何东西和这一思想相像。这是一个最纯洁的物体,保守、不活动。因此能够给他加上"十分虔诚的记忆"这一修辞语!这就能够使人相信托尔斯泰伯爵是天真的、无辜的,他的内心深处是清楚的,并能看到他的底了吗?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嗅觉比托尔斯泰伯爵的其他读者要更敏锐些:《安娜·卡列尼娜》决不是一个无辜的东西……

在彼埃尔和尼古拉争论之后,托尔斯泰伯爵还把我们引进了一对对幸福的情侣们的卧室一会儿。在这些卧室里,托尔斯泰伯爵笔下的谈话完全是用一种特殊的语调进行的。夫妇之间生活得非常好,非常亲近,非常融洽,以致一个只要说半句话,给一个暗示,另一个就会明白了。那里仅仅反映了家庭幸福的基调:我们现在继续快乐地过家庭生活,而一切更高的欲望都是来自魔鬼的(Wir treiben jetzt Familienglück, was höher lockt, das ist vom übel)。而且托尔斯泰伯爵总是几乎十分真诚地描绘着这一首田园诗。"让莎士比亚们去描写自己的悲剧吧,而我不想知道任何类

---

① 雅斯纳雅波良纳,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诞生地和居住地,他的坟墓也在这里。——译者注

似的东西。”也许当他把自己笔下的一对对情人送进卧室的时候，他是这样想的。然而他却没有公开说出这一点。他在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赞扬这种家庭的幸福。这一幸福认为，一切“最崇高的”来自魔鬼。其实，托尔斯泰伯爵没有忍住，在这种赞扬之中有一点讽刺。然而，嘿！讽刺不是针对罗斯托夫的，而是针对彼埃尔的，不是由于他的家庭琐事，而由于彼得堡的臆想。但是这种讽刺只是勉强能够被发现，总共只有两次，仿佛是偶然的，对彼埃尔用了一个词“自负”……

在罗斯托夫家的卧室里，一切都是美妙的。玛丽娅伯爵夫人给丈夫读着自己写的十分虔诚的作品，而丈夫读着妻子的日记，并且意识到在她的崇高心灵面前自己的渺小。此外，由于彼埃尔和尼古拉的争吵，玛丽娅伯爵夫人提出新的理由来维护先验论。这一理由被尼古拉高兴地接受了，尽管他自己说他不需要任何理由，他的崇高品德正是在于此……玛丽娅伯爵夫人说：“依我看，你是完全正确的。我也这样对娜塔莎说。彼埃尔说，大家都在痛苦，受折磨，堕落，我们的职责是帮助穷人。当然（这个“当然”好极了！），玛丽娅公爵小姐说她是对的；但是她忘记了，我们还有其他更要紧的责任，这是上帝亲自为我们指出的；忘记了，我们可以拿自己去冒险，而不是拿孩子们。”故事就是这样写成的！然而这还没完。爱臆想的人抓住了玛丽娅伯爵夫人的理由，立即就从孩子身上把话题转到了事业、地产、赎金、付款以及自己的财富上来。这种转变对于玛丽娅伯爵夫人来说太突然了：“她想对他（丈夫）说，人不是靠同一块面包吃饱的，他把这些事看得太重了（托尔斯泰伯爵强调指出），但是她知道，不需要说这些话，说也没用。她只是拿起他

的手吻了一下，他把这一吻看成是对他思想的赞同和肯定”……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举动吗?！说说看，除了托尔斯泰伯爵，还有哪位作家敢于公开地做这样危险的游戏呢！玛丽娅伯爵夫人是“一个总是追求无穷、永恒和完美的女人”。在她刚刚本能地看到她和丈夫的“精神”联盟受到危险的威胁时，还若无其事地对那最极端的伪善表示赞同。要知道伪善再往前一步就是法律，就是良心的法律(说起来可怕)。看来，再多走任何一步都是不必要的。这一步已经由玛丽娅伯爵夫人的话来完成了。然而，托尔斯泰伯爵一点也没说明，什么是最有趣的，什么是他知道的，刚刚越过的深渊。他像平常那样光明磊落、毫不掩饰。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这一点引出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心理学”！然而托尔斯泰伯爵已是老练的。他知道，每次当要出现二律背反的时候，需要以神圣、无辜、孩子般的单纯的面目出现，否则就要永远失掉任何先验性、普遍性、必然性、稳定性、基础和土壤！……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利用这种巧妙的艺术。也许，这里说明了“一种人”，一种许多代总是要求正面人物，并“为之而奋斗的”前辈产生的缘故……托尔斯泰伯爵用这种方法达到了两个目的：他说出了“真理”，而真理并没破坏生活。在托尔斯泰伯爵以前，唯心主义不知道这些细致的手法。为了达到自己的效果，他总是要求撒大谎、有“狂热的”感情、善辩以及虚饰甚至涂上一些简单的色彩。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得《战争与和平》的尾声，他就会明白，因列文漠不关心斯拉夫人的灾难而生他的气，是不合适的。气应该生得早些，生《战争与和平》的气。如果《战争与和平》该这样，那

么《安娜·卡列尼娜》也必须如此，整部小说都应这样，没有任何限制，包括最后一部分。要知道，其实斯拉夫人的事情也非常乱。其中间隐藏着一个二律背反：毁灭或者不毁灭。那么为什么又要把它们归咎于自在之物呢？为什么不像列文认为的那样，把它们仅仅让给政府来处理呢？例如，祖先们就曾把管理的一切事情故意交给被请来的国外的公爵们。

整个托尔斯泰伯爵的活动，包括他晚期的哲学政论文章以及长篇小说《复活》（一部不多的、几乎是唯一的一部相对不成功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伯爵仿佛在自己身上，在曾经是文学泰斗的身上搜罗一切思想），并没有超出我所指出的任务的界限。他无论如何想驯服那些用外国语称之为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狂暴野兽。他没让它们避开我们的眼睛，反而把它们关进最牢靠的笼子里来展览，以致哪怕是最有疑心的人也开始认为它们是没有危险的、永远驯服的。托尔斯泰伯爵作为整个不倦的、多年的斗争的总结，并且在《什么是艺术》一书中以特别庄严宣布的最后公式声称："善，兄弟的爱——这就是上帝。"在这里我不想谈这一公式，因为我在其他地方有机会详细说明它的思想和意义。[1] 我只想提醒一下，托尔斯泰伯爵坚信不疑的这一"信念"把最纯粹的理智和实在的良心奉为圭臬。它的产生根本不是那么高尚的，它仍然还是源于对"自在之物"的恐惧，源于几乎是盲目的，"回到康德去"的追求（不久前最新德国哲学的代表人物们还这样激动地说过）。因

---

① 见舍斯托夫：《托尔斯泰和尼采学说中的善》（*Добро в учении гр. Толстогои Ницше*），1900年，圣彼得堡。

此，安德烈公爵被赶走，罗斯托夫受到推崇，玛丽娅公爵小姐被理想化了，等等。所以，就像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托尔斯泰伯爵作为最伟大和最崇高的真理而描写的东西，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会是可耻的、丑陋的和讨厌的虚伪。

第十一章

这样，同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斗争的方法之一就是认识先验性的本质和“自在之物”，说简洁些，就是唯心主义。用托尔斯泰伯爵的话来定义，“善就是上帝”。然而，同时从上面的话来看，唯心主义需要外部的依托。列文必须娶吉提，经营产业，打猎，等等。为了建立这座空中楼阁，只有一个“理智”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物质的”、充分的物质基础。然而，基础躺在很深的地下；谁也看不见它。这总是对地球上一切“崇高”的胜利是很有帮助的。最好请回想一下欧洲唯心主义的鼻祖——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他们关于善的学说。显然，他们的学说是由许多纯洁的思想所构成。这些思想厌恶地回避同任何与理智无关的东西接触。可是，在这些思想的纯洁的领域中，禁止的东西还仍然浸透了进来，这是多么厉害的禁止物呵！原来，关于善战胜恶的学说不能够（我几乎想说不愿意）抱定一个辩证法，无论这个辩证法多么“神奇”。它为了使自己得到巩固，就需要像报应这样深的、实际的信念。其实，在证实了自己经受不公平比让别人遭到不公平要好些了以后，还需要什么呢？但是确实这太少了。在柏拉图的对话中（《高尔吉亚篇》《理想国》《斐多篇》）用最平常的人类的方法来支撑善。那里说，恶到时候（在未来的生活中）将受到惩罚，而善会得到奖励……既然善必

将取得胜利，那么，也许，可以使得任何一个辩证法都安宁了，最不发达的理智也能够明白善的优越性，它有一个哪怕是离得很远的，但是确实存在的并且强有力的保护者，然而真奇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报应你们几乎在所有的唯心主义的道德体系中都会找到。一切道德家都认为必须用一个善的庇护者的形象来塑造一个上帝，或者甚至，像托尔斯泰伯爵那样，把善和上帝混为一谈（这已进入了最新的时代——实证主义、进化论等的时代）。显然，道德家们的善本身，“本体”，并不太吸引人，人们之所以接受它仅仅是因为害怕激起上帝对自己的愤怒。唯心主义远非是理想的，它不能够期待先验性得到它的预言家们所说的那种胜利。最终它还是靠最实际的愿望生存，并且它的“先验性”以及“自在之物”仅仅都只是一些把自己和最疑难的现实生活问题隔离开来的高墙。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唯心主义就像东方的专制独裁：从外表上看总是闪光、美丽和永恒的；内部却充满恐惧。这就是一种不解现象的原因所在：这个乍一看来无辜的学说却经常成为那些最少被怀疑是“天生”好恶的人们的最痛恨的对象。然而，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唯心主义的死敌自己本人都曾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那样，曾是一个极端的唯心主义者，并且在新时代盛行的“心理学”是唯心主义的厌弃者们所关心的学说。确实，什么缘故使得人开始挖掘自己心灵的深处，为什么人要去审视那些无疑是闪光的、美妙的和有趣的信念呢？当然，这里无论如何，确实，笛卡儿的二元论（de omnibus dubitandum）做了说明：由于方法论的规律，人一点也不愿失掉自己的基础。恰恰相反，丧失掉的基础常常成为任何怀疑的因素。只有当事实说明唯心主义承受不住现实的压力的时候，

只有当人的命运的意志和实际生活面对面发生冲突，突然恐惧地看到一切美妙的先验论都是虚伪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第一次产生极大的怀疑。这一怀疑一下子就摧毁了旧的虚幻的看来是很牢固的墙。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一切过去的天使和那些使人的无辜的心灵免于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侵蚀的圣人，他们的善、人性和思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人面对自己最可怕的敌人第一次在生活中感到可怕的孤独。因此人无论如何不能保持一颗纯洁和火热的心。这就开始了悲剧的哲学。希望永远地丧失了，生活却存在着，在前面还有许多生活在等待着。而死又不可能，哪怕是想去死。一位古俄罗斯公爵曾说过，人已死了，不咎既往。他错了。请问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吧。他通过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嘴向你们说了另外一些话："在这一夜里我知道了许多。我所知道的不仅是活着，而且是不能够像下贱的人那样去死。"明白吗？一切先验论都完蛋了，康德和托尔斯泰伯爵的哲学结束了，开始了自在之物的领域……你们愿意跟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进入那个领域吗？这里没有一点强迫的意思：谁愿意，谁就有权"回到康德去"。你们不必相信，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们所需要的东西，那种无论如何是"美的东西"。也许这里除了不定形的没有任何东西。无疑只有一点：这里有现实，一种新的、听不见的、看不到的，或者更明确地说，至今尚未出现的现实，以及那些不得不把这种现实称为自己的现实的人，那些不能够返回简单生活的人，在这种生活中对吉提身体的关心、与科兹尼舍夫的争吵、购置地产、写书等使得列文所经历的一切归入了人类生存的一般常规，那些人将用和我们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我们可以否定这些人，因为我们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至今我们还是在这样做。

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①]在自己的著名的、在许多方面都很出色的那篇文章中，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残酷的天才”。这一定义是非常准确的：我想，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是合适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批评家想用这两个词不仅仅来评论艺术家的特点，而且还对他的整个活动作出判决，残酷的——就意味着被完全歪曲的、被毁坏不堪的，所以是不合适的。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仅仅只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天才，而同时不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献身者而感到悲伤。批评家的这一结论依据的是这样一个前提，人性无疑比残酷更崇高些，更好些……一定是这样吗？然而，怎么看待刚刚谈到的笛卡儿的原则呢？怎么看待二元论呢？当然，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尽管这一原则很清楚，要成为受欢迎的(bienvenu)，就要一直跟在别人后面，可是它却照样不去努力那样做。

也还是那个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当在自己的另外一篇文章中谈到蒲鲁东的时候，他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位在俄国他的名字和为崇高思想战斗的最优秀的战士联系在一起的著名的法国人在生活中是一个“有点滑头的”人。他用下面的话来结束自己的叙述：“实在不乐意收集这些不光彩的特点，因为一边收集它们，心里就一边不得不失去一些东西”。然后，由于奇怪的联想，直

---

① 尼·康·米哈依格夫斯基(Н. К.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的民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接就这一点补充说:"这不是空话"。我不知道,其他读者是怎样理解的,而我所感觉到的是什么呢,我恰恰想到,上面引的那些话是空话。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没什么不能够从心里丢掉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蒲鲁东的思想漠不关心。我并不太想说,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为了谈话而谈话:相反,在他的作品中"空话"是很少见的,就像大多数其他作家很少有严肃的思想那样。然而这一次作假却是无疑的,因此需要加以附加说明。显然,甚至突然揭示,一个伟大思想的创造者在生活中不完全是一个诚实的人,并不能够使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感到吃惊。他本人因自己的平静感到不安,并且不能够说明,或者没时间来思考这一奇怪的现象,就急忙用陈词滥调来掩饰。这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心理学现象却说明了非常多的问题。对于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来说(尽管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做出了相反的结论),蒲鲁东本人显然无足轻重。蒲鲁东只是人道的伟大思想的体现者(我是在最广义的意义上来用这个词的)。喏,难道众多的蒲鲁东骗子,甚至蒲鲁东强盗和凶手能够对这些伟大的思想稍微有一点怀疑吗!人道不为法国作家的权威所控制,它是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本人心灵的一部分,是最牢固的一部分。在他的《文集》的新版序言中,在这篇总结了他多年文学活动的序言中,他自己就这一点清楚地说道:"每次当'真理'这个词进入我的脑海时,我不能不为它的惊人的内在美而赞叹。看来,这一词在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中都没有。看来,只有俄语的真实和公正与这一词相称,就仿佛它们汇聚成一个伟大的词。真理,在这个词的伟大的含义之中总是包含着我的探索的目的……我从来也不曾能够相信,并且现在也不相信,不能

够探索到这样一种结论：真实的真理和公正的真理是一致的、互补的。”这些话说明了为什么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在坦率地谈论蒲鲁东时很平静，尽管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很不痛快。当一个人的心里有一种像花岗岩那样，牢固的、永恒的（aere perennius）思想，还有什么不能谈蒲鲁东呢！这就是一种对思想、仁爱、真理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就把揭示蒲鲁东作为不十分重要的事情了。（也许，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止一次这样坦诚并且不止一次发现自己心灵的冷酷，甚至可能为此自我鞭挞。）它影响了对心目中的不平常现象“残酷的天才”的批评。要知道，不是残酷的庸才，而残酷的天才，是一种人的特性，由于这一特性，最极端的实证主义者也不会不愿记起上帝的名字的。然而突然天才在为残酷服务！可是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是一个幸运的优秀人物，这种人应该一生都为思想而服务。同时思想也在为这些人服务，使他们免于受到最可怕的折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是这样。他一直到死也不能够成为自己新的信念的献身者。他命中注定是一个变节者、叛徒、叛变者。思想要报复这些人，残酷地报复，坚决地报复。不存在看不见的、内在的羞耻，不存在他们所没遇到过的侮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不是经历了四年，而是整个一生。……当然，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是正确的。他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受的经验来解释陀氏的世界观。然而，问题在于，这些经验真的妨碍人们看见“真理”吗？不是相反吗？要知道，也许，平常人间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日常生活的哲学！但谁能保证，这种哲学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哲学呢？也许，为了找到真理，应该首先从任何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这样苦役不仅

没有推翻“信念”，而且证明了它们；而且真正的、真实的哲学是苦役的哲学。如果一切是这样，就意味着，产生于自由人之间的仁爱无权把残酷钉到耻辱柱上去，无权埋怨它是黑暗和受罪的根源，而应该给自己的卑躬屈膝的敌人让出它至今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无法计算的权威和特权，首先让出诗人、艺术家、哲学家和传教士的闪光的长袍，这些人几千年来不断地高度赞扬仁爱……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公正，我们至少要公正地和认真地听完地下室的、残酷的人的呼声。无论是托尔斯泰伯爵的恐惧，无论是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对真理的坚定信念都不会难住我们。

第十二章

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在地下室人身上唤起了一种神奇的恐惧感，就像在托尔斯泰伯爵身上那样，然而要返回日常生活，甚至适当地在自己和其他人面前假装已返回日常生活，他都不能够（也许，他力图这样做过）。他知道，时过境迁，花岗岩，永恒性（aere perennius）一句话，人们至今所以为的所有的“稳定性”，对于他来说，他们的一切先验性都一去不复返了。他毫无希望地决心立即转向注意厄运的特点，迈出了那可怕的一步。从此过去的遗教和已经经历的40年的亲身经验向他发出警告。但要用唯心主义战胜自己的不幸和疑虑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一切斗争的努力都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在我的40年里，这种‘美和崇高’沉重地压迫着我的后脑”，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说道。只好这样：放弃无益的斗争并且跟着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走，看看它们把人引向何方。这就意味着对自己说：“一切珍贵的东西，一切被认为是美和崇高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在这种生活中是被禁止的东西。但我还要生活，我还将在新的、可怕的条件下长期地生活。这样我为自己创造自己的美和崇高。”换句话说，开始“重新评价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唯心主义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由一个问心无愧的法官变成了一个被告。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起自己曾是个唯心主义

者，就感到羞愧。他想根本抛弃自己的过去，并且由于不能欺骗自己，力图想象自己不久前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为自己想出一些能减轻罪过的情景。“一般说来，在我们，在俄罗斯人这里，从来就不曾有过愚蠢的、超然物外的、德国的，特别是法国的浪漫主义者。而无论什么东西都影响不到这些浪漫主义者，哪怕是大地在他们脚下裂开，哪怕是整个法国在街垒战中沦陷，他们都一切照旧，甚至连礼仪都没变，大家都还要唱自己的超然世外的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直到走进自己生活的坟墓，因为他们是傻瓜。而在我们这里，在俄罗斯大地上没有傻瓜”……[1]难道我们这里真的没有“傻瓜”！那么是谁每夜都在歌颂马卡尔·杰渥什金呢？是谁甚至当大地已经在他脚下裂开的时候，还在为娜塔莎流泪呢？唉，无论怎样滑头，过去的这些历史没有从记忆中抹去。在所有的我们的浪漫主义者中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是一个最富有幻想的、最超然世外的和最真诚的。

现在，当可怕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一审判的程序和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说得不一样的时候；当他知道，无论他有怎样的美德，人们还是在左边驱赶着他和他类似的一群人的时候，他想哪怕是稍微证实一下自己的无罪。也许，他记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记忆总是纠缠不清的，也许，他记得，人们本来就警告过他。人们对他说过，一切真正的信徒在审判时决不会像一个悔过的罪人那样感到高兴。他应该知道，在最后的审判中，信徒，所有这些“超然世外的浪漫主义者”一共有 12 个，他们作为平凡的人，不可

---

① 《地下室手记》，第 107 页。

能指望得到饶恕。然而以前他没听见或者不理解警告的声音，而现在——现在已经晚了，现在后悔、自怨自艾已经无济于事。当然，他永远都是有罪的。在这种可怕的审判中，没有其他的判决。这和托尔斯泰伯爵不同，他所指的良心是有条件的、人的判决。在这些判决中有真理、有仁慈，主要是有宽恕。而这里却没有宽恕。而且更坏的是，这里就连道德家们总是指望的顺从天意也毫无用处。这一点你们可以从地下室人这方面的言行得到证实："……在一堵墙的面前，站着一些直率的人，……他们真诚地低着头。墙是不会为他们让路的，例如，就像我们……没有理由回头一样。是的，他们非常真诚地低着头。对于他们来说，墙有点令人感到安慰、有点精神上使人解脱和彻底完善，也许，甚至有某种神秘性。"[①]当然，换一种说法，谁不知道在这堵墙里包含着康德的在"自在之物"前所确定的先验性呢？他们使得哲学家们非常满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上最需要的便是这种"令人感到的安慰、精神上的解脱和彻底完善"，他认为宁肯把头在这堵墙上碰破，也不愿意同墙的不可测性相妥协。"落入活人的上帝的手中真可怕！"你们清楚，"永恒的"真理是由聪明人想出来的，这不仅仅是为了那些需要安慰的人，而且是为了安慰者，也就是说为了自己本身。由于这一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恐惧之中。要知道，他的整个一生，他的全部的过去都在体现安慰者的思想。他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曾教导过人们去相信，要用作家和读者的眼泪去洗刷被侮辱和被压迫人的可怕命运。他的幸福、他的灵感曾来源于"最底

---

① 《地下室手记》，第 77 页。

层的人""兄弟"……只有在那个时候，当人亲眼确信，他多年来一直珍藏在心中并且奉为伟大而神圣的真理却是这种该死的谎言的时候，只有这时，他才开始明白，不能相信"思想"，并且我们的最低级的动机都会成为非常美的和诱人的形式，既然它们应该控制我们的心灵。这就是为什么这位用马卡尔·杰渥什金和娜塔莎的泪水来洗刷文坛的"穷人"的歌手感到恐惧的原因。

现在已经清楚了，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够回到过去的那种平静中去，不能够回到对直爽的人来说是精神解脱和彻底完善的那堵墙那里去。他对自己说，任何真理都比谎言好，因此他有勇气面对现实。请想一下，莎士比亚笔下李尔王的几乎是无意义的但却是天才的话："遇到熊你一定会跑开，但是在路上遇上狂吼的大海，你会回头送到野兽的嘴边吗？"（第二场，第四幕）陀思妥耶夫斯基逃避现实，但在路上遇到唯心主义，他就回头了。因为生活的一切恐惧都不像由良心和理智杜撰出来的思想那么可怕。与其为杰渥什金流泪，倒不如说明真理更好：让世界完蛋吧，而我要喝茶。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这种"真理"并不轻松，那么这个人是怎样对待这一真理的呢？他过去写马卡尔·杰渥什金和苦役，而现在写癫痫病，写这位挣扎着的、已经不年轻但几乎是刚起步的彼得堡的作家每天生活中一切有魅力的东西。人们曾经以为，"真理"为人解忧，使人坚强，使人保持旺盛的精力。然而地下室的真理同它的宽宏大量的前辈们迥然不同。它一点也没想到人，而如果，比方说，它可能有一些想法，那么无论如何一点也不是善意的。安慰——不是它的任务。不过嘲笑、侮辱——它还是擅长的……地下室人说道："自然的法则常常并且一直都在折磨着我"。感到奇

怪吗？他无论对待真理，还是对理想都不能够采取温和的态度，如果这是其他的人，那么自然的法则、崇高的精神学说都是尽善尽美的，只会知道，要凌辱和贬低的无论如何不是有罪的和像孩子一样容易轻信的人。什么可以用来回答这种权威人士呢？除了永恒的、毫不妥协的仇恨，对待自然秩序和仁爱还能够有什么感情呢？斯宾塞曾鼓吹适应。道德学家鼓吹对命运俯首听命。然而按照推测这一切都是好的，适应还是可能的，而俯首听命带来的就是安宁。"按照推测！"但是心理学已经告诉我们，一切的推测都仅仅是为推测者而想出来的，甚至托尔斯泰伯爵也一起来共同反对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感奇怪，为什么他会如此莫名其妙地努力拒绝崇敬仁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却独霸着60、70年代我们的文坛，其原因就在于此。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公正地把他看成是"恶毒的"人（当这一修饰语刚一出现在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的《文集》中时，我们就习惯于在其他的地方遇到它）。例如，地下室的人是怎样议论"人类的未来幸福"，也就是，是怎样议论曾确立并且至今仍在确立着仁爱的人们的一切"信念"的那块基石的呢！他说，"到某个时候，降临了新的经济关系、已经完全成熟的……这样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下子都将消失，这是因为问题都可以得到圆满的解答。那时精心炮制的体系就能建立起来，唉，一句话，卡甘[①]鸟就飞回来了。"[②]这位企图破坏自己同类的平静和幸福的恶人所说的话是很清楚的。然而这还没什么，暂时只

---

① 卡甘是俄罗斯民间文学中的一种鸟。——译者注

② 《地下室手记》，第3卷(2)，第89页。

有一点讽刺的意味。而进一步要求的就已经几乎是"要求转入正题"了。"例如，"他继续说，"如果突然，无缘无故，在按推理可能出现的未来之中，出现了一位绅士，他长着一副卑贱的或者，更好地说，反动的和好嘲弄人的面孔，他手撑着腰，并且对我们大家说：'怎么，先生们，我们是否应该一脚就一下子推翻这种推理，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一切的对数都见鬼去吧，我们要按自己的意志重新生活呢？'这我是丝毫不会感到奇怪的。"[①]显然，你们不是在和一位辩论者打交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在争论，完全不是在争论。要知道，他在扼杀的并不是别人的希望，而是他自己的希望。"我说这些根本不是因为我喜欢显示自己的语言。"他进一步承认，"我，也许，正是因此在生气，从你们的一切的方法中，至今也找不到一种能够不显示语言的方法。"也就是说，人长着一副反动的和爱嘲弄的面孔这里没有任何关系。问题在于，能够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心炮制的体系和他的过去、现在和他的永恒的苦役一致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不，不可能。如果人的任务是在地球上获得幸福，那么，就意味着，一切都永远地完了。这一任务已经是完不成的了，因为难道未来的幸福可以抵偿过去和现在的不幸吗？难道马卡尔·杰渥什金的命运虽在19世纪横遭侮辱，而会因为22世纪任何人也不会侮辱自己的同类，能变得更好些吗？不仅不会好些，而且更糟。不，如果已经这样了，那么就让不幸永远地留在人们中间，让人们去横加侮辱未来的杰渥什金们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不仅不想为精心建造的宫殿的未来

---

① 《地下室手记》，第90页。

的富丽堂皇奠定基础，而且他仇恨地、恶毒地、而同时暗自地想到，将来总会有一位不让世界安宁的绅士，并因此而幸灾乐祸。绅士——当然是完全虚构的人物，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他当然是不可信的。然而要知道这里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信。问题的实质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希望在未来有普遍的幸福，不希望由未来来抵偿现在。他需要别的补偿，他宁愿在疲惫不堪之时把头撞在墙上，而不满足以仁爱的理想来安慰自己。人们往往在墙面前低头，为自己选择好的命运。然而，这样的命运不是大家都有的。先验性只是对于那些天真的性格才有意义的。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怎么样呢？

第十三章

在《地下室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抛弃自己的理想，抛弃那些在他看来是由于苦役而提出的纯真的理想。我说："看来"，因为其实，他在监狱生活中和获得自由的最初岁月里所拥有的理想，只是（现在我相信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一种靠不住的信念，即苦役期满后他将是一个像过去一样的自由人。像所有的人一样，他把个人的希望看成理想，并且急忙倒出关于苦役的一切印象或者至少使它们适应于新生活的环境。然而他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或者更准确地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苦役的真理，无论他怎样加工和怎样整理它们，都充分地保留了它们自己产生的明显痕迹。忧郁的苦役犯穿着豪华的衣装，盯着读者，光头闪现出来。在喧哗嘈杂声中可以听见锁链镣铐声。只有《死屋手记》被读者和批评界看成是某种自己的、平常的、自由的东西。确实，在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一生中第一次）几乎是托尔斯泰的把现实和通常的理想相调和的艺术。读者由于《死屋手记》而变得清醒、高尚、容易激动、准备同恶做斗争，等等——完全像当代美学要求的那样。顺便说说，读者情绪高尚地和成熟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和自己本人一样的好人和善良的人。然而同时哪怕稍微注意一下，少高兴一点，就能发现在《死屋手记》中可以揭示出，在地下

室里无法找到的珍珠。例如，长篇小说结尾的话就是这样的："在这些墙里白白地葬送了多少青春，多少伟大的力量在这里浪费！要知道已经应该说出一切。要知道这种人是不平凡的人。要知道，也许，这是我们民族中最有才能、最强有力的人。然而强大的力量白白地消耗尽了，不正常地、不合乎规律地、一去不复返地耗尽了……"有哪个俄罗斯人不记得这几句话呢？长篇小说的荣誉有一半不是属于它们吗？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多么善于把这种不成体统的和讨厌的思想伪装起来。怎么？优秀的俄罗斯人都在服苦役?！最有才能的、最强壮的、不平凡的人，这就是杀人犯、小偷、纵火犯、强盗吗？是谁这么说的？是一个和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格里戈罗维奇以及一切至今俄罗斯仍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但要知道这真是精神错乱。然而同时两代读者都把这种意见看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人们认为，他在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来克制自己，热爱他人，他在歌颂最底层的人。甚至为了面子没有发现，这位歌手这次竭尽全力已经走得太远了。只是到最近，最终把注意力（这其实也是偶然的）转到这种克制的不合理性上来。但是仍然还是不敢公开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由于上面所引的那段话已经确立了圣名。人们只是努力用相应的解释来削弱他的意义。他们开始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苦役犯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罪犯，而仅仅是（大部分）一些叛逆者，他们起来反对农奴制的弊端。

尽管解释已太迟了，但是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令人遗憾的是，它完全丧失了任何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中就不太喜欢新教徒，只是刚刚能够容忍他们。请想一下，他是怎样谈论政治犯

的。他的高兴属于真正的苦役犯，属于那样一些人，关于他们，他的盟友波兰人姆-茨基说：我恨那些强盗，只是属于这些人的。在他们身上他找到了力量、才能和非凡。他把他们看得比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和捏克拉索夫更高明。我们会对这种观点表示愤恨，会嘲笑他们，尽情地咒骂该一观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只想说出这一观点。

与波兰人姆-茨基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这些强盗身上了解到，如果“已经应该说出一切”（要知道我那时候已经在想），说出自己的“理想”，那么就应像曾经从别林斯基那里，现在是从他们身上，接受他们的一切，尽管这一切没写进任何一本书，但它们无疑是非常明确的生活学说。确实，这种接受并不令人高兴，也无准备。然而因为不想到这一学说对他的告诫：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去想创造幸福……，是别无他法的。甚至即便是他本人也不想承认，他在向苦役犯学习。他一方面维护自己的新观点，一方面把一切推诿于人民：“……某种其他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心灵。这个其他的东西和人民有着直接的联系，它们由共同的不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其他的东西以为，自己就和人民一样，和人民一致，甚至它被视为和人民的底层一样”。[①]

然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生活的那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这是些苦役犯，这是些被人民抛弃的人。就是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和人民没有联系，而且远离人民，比任何一个我们中间的常常远离祖国的人离人民更远。这一点是一分

---

① 《公民》(*Гражданин*)，1873 年，第 50 期。

钟都不应该忘记的。而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个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赢得如此多的忠实而又狂热的崇拜者的对人民的虔敬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而且俄罗斯的、“忠诚的”读者残酷而空前地上了自己导师的当。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第一位欺骗自己学生的导师。但是对于这种欺骗并非是许多人都有足够的勇气。我以为，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一切理想和信仰（他是“宗教大法官”的作者）有非凡的洞察力和敏锐感，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彻底认清自己所做的一切。他并不情愿相信苦役犯，如果在上面引的《死屋手记》的片断里他把他们提到了不可及的高度，那么他只是模模糊糊地希望，仍然可以使苦役犯服从于更高尚的思想。在自己的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多总共只有一次公开地屈从于自己的盟友。而这也许是因为《死屋手记》以自己统一的色调排除了读者可能产生怀疑的任何可能性。在《手记》中充满着善的感化力，有相当高的艺术性。读者早就不再注意个别的思想了：说你想说的吧，一切都在为着崇高的思想。

然而同时，就其意义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所经历的感受，和崇拜苦役犯的这种可怕的必然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的朋友，你知道蔑视这个词吗？你的正义感折磨着你，谁在蔑视你呢？”尼采问道。确切地说，生活中没有更大的痛苦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不得不承认它们。苦役犯曾“看不起”他。关于这一点，几乎《死屋手记》的每一页都能证实，但意识、良心、“正义感”不允许他去复仇，不允许他用蔑视去回答蔑视。他和尼采一样，被迫站到了自己的确定无疑的敌人一边，我重复一遍，不得不承认他们，不是由于恐惧，不是因为迁就最底层人的心灵的伟大，而是为

了良心，为了自己的、最高的、最有天才的人们的，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别林斯基等导师的良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用自己的生活来说明生活中的一切丑陋的、微不足道的和不需要的东西。

这种可怕的负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自己的苦役中承担起来的。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一负担不仅没再减轻，而且越来越重地压迫着他。一直到他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他也不能减轻自己的负担。应该背着它，应该使它避开所有的眼睛，同时还要“教育”人们。如何胜任这项任务呢？

第十四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文学活动的始终就是回答。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以后已几乎不写了，除非按老习惯顺便写写。现在他所心爱的主题是——罪行与罪犯。在他的面前总是摆着一个问题："苦役犯是何许人呢？为什么我感到他们仍然有权来蔑视我，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在他们面前是如此地渺小，如此地软弱，说得厉害些，如此地平庸。难道这是真理吗？需要把这个告诉人们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问题是毋庸置疑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文章关于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在文章中人不是分善人与恶人，而是分为凡人和超人，并且一切"善人"都属于凡人的行列，他们在精神上局限于服从道德规范；而超人自己创造规则，对于他们——"一切都是允许的"。拉祖米欣准确地概括了文章的思想，他向拉斯柯尔尼科夫说："所有这一切里(也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文章和注释里)确实是独创东西的，的确就属于你一个人，让我焦急的是，你仍然还在让良心流血，请原谅我，甚至还如此狂热……你的文章的主要意思就在这里。要知道，这种良心的流血，这……这，依我看，比官方的、法律的流血更可怕。"[①]（陀思妥耶夫

① 《罪与罚》，第五章，第260页。

斯基本人在“独创”和“良心”这两个词下打了着重号)。这样,“良心”迫使拉斯柯尔尼科夫站到了罪犯的一方。良心的准许、赞同、同情已经不是善意的,而是恶意的了。“善”和“恶”这两个词本身已经不存在。它们已由“平凡”和“非凡”这两个术语来取代,同时前者包含着卑鄙、无用、不必的概念:后者则是伟大的同义词。换句话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站到了“善与恶的彼岸”,这已经是35年以前的事了。当时尼采还只是一个大学生,并还在幻想着崇高的理想。拉祖米欣说得对,思想是完全独创的,并且整个都是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在60年代,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谁也没有梦想过任何这种类似的东西。甚至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当时也被描写得像一幅对世上罪人进行良心谴责的有教益的图画(勃兰兑斯[①]即使现在还是这样评论《麦克白》的:教导结束了[fabula docet])。

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完全是独创的,那么任何人,除了它的创造者,都根本没有想过,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反对它呢?为什么毁坏思想的复制品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和谁斗争呢?回答是:在和自己,只是在和自己本人斗争。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嫉妒罪犯的精神世界的伟大,但他不能够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正思想,为此他创造了各种不同的“环境”。首先,他在《死屋手记》中以把最“善良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人们吸引到他这边来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苦役犯的崇敬。然

① 勃兰兑斯(George Brandes,1842—1927),丹麦文艺批评家,实证哲学和美学的拥护者。他的名著是《19世纪文学主流》(六卷本)。——译者注

后把苦役犯纳入了人民的概念。以后一生都在同“善的”理论上的厌弃者作斗争，尽管整个世界文坛只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家——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要知道，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务确实是同恶作斗争，那么他就应该会自我感觉很好。他的笔友中谁不具有这样的任务呢？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自己的独创的、非常独特的思想。他在同恶作斗争时提出了即使是恶自己从来都不敢奢望的为其辩护的理由。良心本身就是在和恶打交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文章的基本思想在尼采那里以另一种形式详细地展开，在他的《道德的系谱》和更早的《人性，太人性的》之中，我不想说，尼采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借鉴了思想。因为在他写自己的《人性，太人性的》时，在欧洲人们还尚不清楚任何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然而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如果不是感到背后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支持，这位德国哲学家在《道德的系谱》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叙述得如此大胆和直率。

显然，不管长篇小说的情节怎样，无论如何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真正悲剧不在于，他决定违法，而在于他认识到自己无力迈出这一步。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是杀人犯，他没有任何罪过。放高利贷老太和利扎韦塔的故事是捏造的，是诬告、冤枉。并且伊凡·卡拉马佐夫后来也没参与斯梅尔佳科夫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诋毁了他。所有这些“主人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血肉相连的。他们是超然世外的幻想家、浪漫主义者、未来的完美和幸福的社会建设计划的制定者、人类的忠实朋友。他们突然为自己的清高和超然世外感到惭愧，认识到，关于理想的言论是空洞的废话，没有给人类财富的宝库带来任何一点东西。他们的悲剧在于不能够开始

新的、另一种生活。因此这一悲剧的悲惨程度是非常深的，且毫无出路，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难用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杀人的痛苦折磨作为原因，来构造悲剧。然而凭着这一点就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犯罪心理研究的内行和专家，这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尽管他熟悉苦役犯，但他是在监狱里认识他们的。他们过去的自由生活，他们的犯罪历史对于他来说就和我们一样也是秘密的。罪犯关于这一切是从来也不说的。而告诉我的是创作的虚构。然而依我看，在这方面没有必要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古代歌手那里就已有虚构了。确实，每天夜晚都会有诗神飞到他们那里，托给他们一些绝妙的梦。到天亮时，阿波罗的热爱者们就把这些梦写下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地下室里的人，一个苦役犯，一个俄罗斯的文学家，一个把女人裙子拿到贷款处去抵押的人。这一切神话对于他是不合适的。他的思想在自己个人的心灵沙漠中徘徊。由此它经受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以及地下室人的悲剧。这些无罪的罪人、这些无过的良心的谴责就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人物的长篇小说的内容。这内容包含着他本人、现实以及真正的生活。其余的一切则是"说教"。其余的一切是由旧建筑的碎片急忙盖起的可怜的窝棚。谁需要它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必须指出这一点）曾赋予自己的说教以很大的意义，就像托尔斯泰伯爵、尼采以及几乎所有的作家那样。他认为，可以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怎样生活。当然，这些可笑的意见永远也只是意见。人们过去和现在都不会按书本去生活。

在《罪与罚》的结尾，您会读到下面一些耐人寻味的句子："……然而这已是一个新故事的开端，这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如何逐

渐获得新生，逐渐蜕变，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逐渐认识到迄今为止他完全不了解的现实。这可以成为一篇新小说的主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篇小说就到此为止了”。这些话没有做出庄严的诺言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没像一个老师那样，承担起义务来告诉我们这一新的现实、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新的出路吗？但是教师并没进一步许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前言里，这已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作品，我们重新遇到了同样的许诺。一部长篇小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够的。为了描写自己的真正的主人公，他还需要一部长篇小说，尽管在洋洋一千页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应该有足够的篇幅来写“新生活”。而且要知道，在《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整整三部长篇小说以及一切重要的作品：《白痴》《少年》《恶魔》！但是都没提及诺言。显然，写梅什金公爵的《白痴》不能够算。即使只有这种“新的东西”在等待着人，即使梅什金公爵这个可怜的影子、这个冷血的幽灵应该为我们的“理想”服务，那么不去看未来难道不是更好吗？最卑微和最受凌辱的人，甚至马卡尔·杰渥什金都拒绝那种返回自己贫困的过去的“希望”。是的，梅什金公爵有一个思想，就是空虚。他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呵！他真像中国的木偶，站在两个女人之间，忽儿倒向这一方，忽儿又倒向另一方，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让他好好地说话。但显然这并不算什么了不起：作者本人也说话。梅什金公爵就像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一样，希望能具备特殊的预见能力，这能力几乎近似于远见。然而即便是这一点，也不过是长篇小说主人公身上的一个小优点。小说中的一切人物思想和行为都受作者的支配。而除了这些品质以外，梅

什金公爵是一个地道的渺小的人。他总是为悲伤者感到悲痛,却不能够安慰任何人。他把阿格拉娅从自己身边推开,但却不安抚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遇到罗戈任,预先知道他的罪过,但却不能够做任何事。尽管他应该理解与他亲近的人的处境的悲剧性!然而他却没这样。因此他很容易说一些希望和安慰的话。他甚至给伊波利特吃了一颗自己创作的宽心丸,然而因此人们欢迎他,或者看来,按功劳来迎接他。不,梅什金公爵——甚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崇高人物中的败类,尽管这些崇高人物也或多或少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并善于描写的仅仅是不安定的、矛盾的、探索的心灵。只要他一努力描写探索清楚的、平静的、理解透彻的人,他就立即会落入可耻的陈腐思想之中。请想一下佐西马老人关于"人们的未来的,已经是完美的联合"的幻想。难道这些幻想不带有最陈腐的未来性(Zukunftsmalerei)吗?这种未来性即使是在地下室里被嘲笑的社会主义者们也早已加以拒绝了。然而在所有这种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不愿意去想。他不加选择地在必须的地方挥舞着手,在斯拉夫主义分子那里,在社会主义分子那里,在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中。显然,他自己感到,他的任务并不在于此,并且十分粗心大意地对付着它。但是他却不能够拒绝道德说教和预言。因为只有这一点把他和其余的人联系起来了。人们最容易理解、评价他身上的这一点,由于这一点人们把他抬到了先知的地位。然而没有人们,完全没有人们是不可能生活的。马尔梅拉多夫说:"让任何人可以去任何地方,要知道这是应该的。因为常常有这样的时候,必须应该去任何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大家可以接受的礼服。要知道,这对于说

着地下室人的话、屈从于苦役、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头脑中的一切“独创”思想的人来看是不合适的。人们不愿听见这种人，把他们赶走。人们无论如何需要唯心主义。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把整把地把这种善扔给他们，因为最终即使他本人也有时开始思索，这样确实没有任何价值。然而这仅仅是有时，过后他就又自我嘲弄起来。关于伟大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是说谁呢？谁是那位亲身给予人民面包的红衣主教呢？难道这个传说不是象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预言“活动”吗？奇迹、秘密、权威——要知道这些因素，只有这些因素构成了他的说教。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故意不把主要的东西说完。这位大胆着手修改基督教的伟大的宗教大法官本人竟是如此软弱和可怜，就像他所蔑视的那些人一样。他极其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他所能够说出的仅仅是真理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可怕的部分。人民从他那里不加分析地、毫不检查地接受了理想。然而这仅仅是因为，对于人民来说，理想是一种娱乐、是外表的东西。除了他自己表述的那些话以外，孩子的、天真的、还没有怀疑的信念不要求他说出更多的东西。因此人民几乎跟在任何一个想领着他们前进的人后面走，并且很轻易地就更换自己的礼服：时而愿国王死，时而又呼国王万岁（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然而老的、长期受到思想磨难的、痛苦的红衣主教却自认为，他的虚弱的思想能够帮助那些混乱的群众确立一个坚定的方向，应该对千百万人行善……这种错误是多么幸福和奇妙呵！要知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不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大法官拥有这种想法。所有的说教者在任何时候都想把世界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在把自己的信徒引向幸福，引向欢乐，引向光明！

其实羊群需要牧羊人要比牧羊人需要羊群更少些。如果伟大的宗教大法官没有高傲的信念,那么他会怎样呢?没有他全人类会灭亡吗?他生活得如何呢?正是这位机智敏锐的深邃老人在我们人的一切秘密中不能够(也许,表面上不能够)看见对于他来说是最主要的一点。他不知道,不是人民的一切归功于他,而是他所以有信念应归功于人民,哪怕这一信念只告诉了他一点长期的、愁闷的、痛苦的和孤独的生活。他用自己的关于奇迹和秘密的故事来欺骗人民,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副一切都知道和一切都理解的权威模样。他把自己称为上帝在人世间的全权代理人。人民信以为真地接受了这一骗局,因为人民并不需要真理,不想知道真理。但是尽管红衣主教老人具有自己的一切几乎是长久的经验,具有好钻研和不疲倦的精明头脑,却也没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自己设置的骗局的牺牲品。他把自己想象为人类的行善者。他需要这一骗局,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获得自己的信念,他就从他曾鄙视的、渺小的人们手中得到它。

第十五章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并没相信这一骗局。他不能够满足于这种“自己的信念”。尽管他非常美妙和诱人地善于谈论自己笔下的伟大的宗教大法官的“高傲的孤独”,但他却知道,这些崇高而伟大的字眼所组成的一切冠冕堂皇的假面舞会仍然不是他本人需要的,而是别人,是人民需要的。高傲的孤独!难道当代人会独自高傲吗?在人们面前、在语言中、在书本里——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当谁也没有看见和听到它的时候,当人在宁静的半夜,在寂静和沉默中总结自己的一生时,难道他能够使用哪怕是一个大的字眼吗?普罗米修斯很好,他在任何时候也不独自一人,宙斯总能听见他的声音。他有仇敌,他曾以不屈的方式和高傲的语言来辱骂和激怒仇敌,这说明“一种情况”。然而当代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相信宙斯。当人们离开他的时候,当他独自一人呆着的时候,他不由地开始自己说出真理,我的上帝,这是多么可怕的真理呵!按照诗的口头传说,我们认为是孤独的人的通常陪伴者的那些迷人和奇妙的形象,在这一可怕的真理中真是太少了!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思考是(尤其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但我们看来,反正都一样):“他把牙咬得咯吱直响,补充道,‘我所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虱子,是因为也许,我自己比一只

被打死的虱子更可恶、更龌龊，我早就预感到，在我杀人之后就会对自己说出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和这一恐惧相提并论的吗！噢，卑鄙，噢，可耻！噢，我怎样理解'先知'，带着军刀，骑着马：阿拉伟大，顺从吧，颤抖的坏蛋！对的，先知是对的，当他在某个地方，在街上横着排开一个好——好——好的炮兵连，并且向着无辜的和有罪的人横扫过去的时候，这甚至无须说明。顺从吧，颤抖的坏蛋，别去希望了，因为这不是你的事！噢，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我不宽恕坏老太太'"。[①] 多么可恶的侮辱性语言和形象呵！难道拉斯柯里尼科夫不是"为了小说"而给坏老太和利扎韦塔一击，以便自己来解释这些情绪的吗？然而其实这里并没有流血，并没有刑事犯罪。这种一般的"惩罚"迟早总在等待着一切"唯心主义者"。对于每一个唯心主义者来说，末日迟早要到来，他恐惧地并且咬着牙喊道："对的，先知；顺从吧，颤抖的坏蛋！"早在 300 年前最伟大的诗人就对最伟大的唯心主义者作出了可怕的判决。请想一下哈姆雷特的疯狂吼叫："时代的联系完蛋了！"从那时起这句话在作家和诗人的笔下不断以各种各样无穷的方式出现。但是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想直率地对自己说，既然没任何东西能把破裂的链条联系起来，那么就不可能重新把时代引入它已脱离的轨道。大家都在做再三的努力，力图恢复旧的幸福的幻影。人们不倦地对我们喊着，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毁坏了一切，需要重新去"相信"，"返回过去"，成为"简单的人"，等等。人们始终认为，旧"思想"是联系一切的基础，并且努力拒不思想，在思想中总是蕴藏着

① 《罪与罚》，第 272 页。

我们的不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你们声明，他“就真想用剪刀把自己和大家以及一切在这一瞬间剪开”[①]的时候，你们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些什么呢？你们会让他去对别人行善吗？然而他早已尝试过这条道路，并且写出了“伟大的宗教大法官”。只要谁愿意，就让他去鼓吹崇高的真理和骗局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知道，如果时代的联系在于此，那么它已经永远被毁坏了。他说出这一点的时候，不是一个刚刚开始写作的一知半解的爱好者，而是一个能用自己的眼睛洞察一切、用自己的双手感触一切的人。在第五本书《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第四章标题用了一个词“暴动”。这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不想为恢复旧的“联系”而张罗，而是准备尽一切努力来表明，这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希望。伊万·卡拉马佐夫起来反对当代道德观中的牢固基础。这一章直接是由下面的话开头的：“伊万说，我应该向你承认一点：我从来就不能够理解，怎么会喜欢其他的人。我以为，恰恰是别人才不可能喜欢，而难道会喜欢陌生人。”[②]阿辽沙打断了兄弟的话。他本应该向我们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不同意伊万的意见。然而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位青年人的一贯言论，而且他的言论很少使我们费解，况且，记忆告诉我们另一段话，这一次已经直接来自作家在1876年间的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里说，我声明，没有对人类灵魂不朽的一致信任，全人类的爱甚至是完全不可思议、不可理解和完全不可能的”。[③] 事情很清楚：在伊万·卡拉马佐夫和陀思妥耶夫

---

① 《罪与罚》，第115页。

②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80页。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10卷，第425页。

斯基本人的言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伊万·卡拉马佐夫确实一直在说着那种意见，灵魂不是不朽的。真的，他并没为自己的“意见”提出任何根据，然而要知道，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也“暂时没有依据”。无论如何，无疑，不管是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还是作者，都不相信“爱他人”的思想观点。如果方便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走得比伊凡·卡拉马佐夫更远。他写道，“况且，我肯定，当我们完全确信人类因意识到自己完全无力帮助受苦的人，或者给他们一些好处，减轻他们的负担而感到痛苦的时候，那么这种意识甚至可能在我们的心中把对人类的爱变成对人类的恨。”[①]（着重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打上的）。这时没有出现拉祖米欣，没有人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他的思想是非常独特的，这难道不可惜吗？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文章里，要知道也有类似的内容：良心允许对人们的仇恨！如果不能够帮助他人，那么就不应该去爱他。然而，要知道，正是那些一般希望得到我们的爱的人绝大多数是不能够帮助的，我已经不是在说全人类了。人们曾经大肆宣扬受苦受难者，为他流泪，把他称为兄弟。现在这种情况少了。人们无论如何想来帮助他，力图使最底层的人不再是最底层的人，而成为上等人！如果这个不能实现，那么爱就见鬼去吧，取代它的就是永恒的仇恨……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认为，在引了上面几段话以后，人们就不会再把他和阿辽沙混淆在一起了）已经不再相信爱的万能了，并且不珍惜同情和感动的眼泪了。对于他来说，无力帮助是最终的和毁灭一切的结论。他在探索力量、权威。你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10卷，第425页。

们在那里会发现,他的最终、最真正、最秘密的目的是追求那个由尼采已明确表述过的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他能够在自己任何一部长篇小说的结尾,像尼采那样用大黑字母写下这些话,因为在这些话中包含着他的一切探索的思想!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创作活动的基本任务,由于巧妙地蒙在小说表面的复仇思想里,而变得隐蔽起来。轻信的读者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审判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法官,而不是被告。然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问题就非常清楚,作者的意图已不会有任何疑义。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有罪的",根据他自己的坦白,他犯了罪,杀了人,尽管这种坦白是因痛苦折磨所迫的,所以是不可信的。人们正在摆脱痛苦的责任,无论它们多么可怕。伊凡·卡拉马佐夫知道这个逻辑。他明白,如果把自己的命运提出来讨论。那么人们立即就会揭露他,无论如何他"吃了果子",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也就是有罪的,如果不是在行为中,那么也是在思想之中。所以他不想谈论自己。他提出了关于孩子的非复仇泪水的著名问题。他对兄弟说,"告诉我,我自己直接叫你,回答:想一想吧,你自己建造起了人的命运大厦,目的在于使人幸福。给人们,最终,和平和平静,然而,为了这一点,你必须一定要去折磨唯一的最小的创造物,这就是孩子本身,他用小拳头擂着自己的胸部(关于这一点,伊凡早就对阿辽沙说过了),这座大厦就是建立在他的非复仇泪水之上的。你愿意以这些为条件来当建筑师吗,告诉我,别说谎",阿辽沙也低声地回答着这一问题,就像梅什金公爵回答伊波利特那样,当然,回答却已不同。没有用"宽恕"这个词,并且阿

辽沙直接拒绝了提出的建议。他现在公开发表了声明，这在《地下室手记》及其注释中已首先作了说明，从最远古到最当代聪明人想出的一切，一句话，任何东西都不能够证实一个人命运中的无意义和荒唐的行为。他谈论孩子，但这只是为了"简单化"和没有那个复杂的问题，准确地说，为了使得在争论中很巧妙地使用"罪过"一词的敌人解除武装。确实，难道这个用小拳头打自己肚子的小孩比那个突然感到自己"就像一把剪刀把自己和大家及一切剪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拉斯柯尔尼科夫更可怕些吗？请想一下，拉祖米欣所遇到的一切，当他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疯狂和痛苦的与母亲和妹妹告别场面之后，跟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出的时候，突然领悟到，在他不幸的朋友的心灵中产生了多么大的痛苦。"你明白吗?"脸被疾病所扭曲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问他，由于这个问题，头发都在头上竖了起来。是的，在地球上存在着这样一些恐惧，即使是最有学问的学者的知识也没有梦见过。在它们的面前，卡拉马佐夫的关于土耳其人的兽性和父母虐待孩子的故事等就相形见绌了。并且这里"苹果"，当然，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需要的是或者为这些眼泪"复仇"，或者——然而对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来说，他自己流着眼泪，难道能够再用任何"或者"吗？这里可能的回答是什么呢？"回到康德去吗?"谁也不能保留住上帝。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前迈进，无论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他。

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以后就确信，他永远不会返回过去的生活的时候，当他看见，世上最喜爱他的亲爱的母亲不再是他的母亲(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谁能够想象这些恐惧可能吗?)，并

且那个同意为了他的前途，永远做卢任的奴隶的妹妹——已经不再是他的妹妹的时候，他本能地跑到索丽娅·马尔梅拉多娃那里去。为什么？他在这个不幸的、没有文化的、一无所知的姑娘那里能够找到些什么呢？为什么他宁愿选择这位沉默寡言的和顺从的姑娘，而不愿选择很善于谈论崇高品德的、自己的、可靠而忠实的朋友呢？他甚至根本没有记起拉祖米欣！尽管这位朋友随时准备帮助人，却不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秘密。也许，他还是要建议人们从善并且用这种方式来安慰可怜的良心！但是拉斯柯里尼科夫一想到善，就怒气冲天。在他的思想中已经能感觉到绝望的激情，这一激情后来给伊凡·卡拉马佐夫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既然这是很值得的，又为何要去说这讨厌的善和恶呢"。您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的就是讨厌的善和恶。要知道，人的胆量不能够再使他继续往下说了。要知道，不仅在书籍里，而且在人们的心中，我们的一切希望至今都一直在于相信，为了善战胜恶，牺牲任何东西都没什么可怕的。突然不知从哪冒出一个人来，他庄严地、公开地、几乎一点也不害怕地(几乎，是因为阿辽沙总是喃喃地说些反对伊凡的话)让所有的人千百年来一直顶礼膜拜的东西见鬼去了！但人们很容易受骗，从阿辽沙的可怜的闲话中来谅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卡拉马佐夫的可怕哲学。在整个俄罗斯文坛上只有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一位作家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残酷的"人，是自古以来大家一直认为的敌对的黑势力的追随者。甚至即使是他也没想到这一敌人的整个危险性。他认为，只是应该揭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意"，用现代的名字来称呼它，以便永远消灭它。在 20 年以前，他不可能想到，地下室思想

注定很快重新复兴并且提出自己的权利，不是胆怯地，不是用熟悉的、缓和的老套话来掩盖，而是大胆地和自由地充满必胜的信心。“讨厌的善与恶”看起来似乎是出于和长篇小说作者格格不入的人物口中的一个偶尔的句子，现在却成为了一个“在善与恶的彼岸”的难解的公式，并且这一公式向至今为止的一切智者的信念提出了挑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善”究竟在什么面前低下了自己的高傲的头呢？卡拉马佐夫谈论关于遭受痛苦折磨的孩子的命运。然而拉斯柯尔尼科夫要求为自己回答，只为自己。在善那里他找不到合适的回答，他就抛弃了善。请想一下他和索丽娅·马尔梅拉多娃的谈话。拉斯柯尔尼科夫来找她不是为了忏悔。因为他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是无罪的，并且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为了按照习惯的方法才指责他杀人。这就是他的思想，已经是最后的、在苦役中的思想：“噢，如果他能指责自己（指在杀人时），他该是多么幸福呵。他那时会忍受一切，甚至是羞愧和耻辱。然而尽管他严厉审判自己，但是他的残酷的良心在他的过去，除了失算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没有发现有任何特别可怕的罪过，而失算是任何人都可能会有的……他并没忏悔自己的罪过”。[①] 这些话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整个可怕的历史的总结。他竟不知道为什么郁郁不乐。他的任务，他的一切努力现在都在于，证明自己的不幸，使自己回生，在他的眼中，任何东西，全世界的任何幸福，任何随便哪种思想的胜利都不能赋予他个人的悲剧以任何意义。这就

① 《罪与罚》，第539页。

是为什么他只对索丽娅·马尔梅拉多娃说,他请求她给他读拉撒路的复活。无论是山上的说教、还是法利赛人和收税吏的寓言,一句话,任何由《福音书》译成当代伦理学的东西,按照托尔斯泰的公式"善、兄弟般的爱——就是上帝",都不能使他感兴趣。他审问这一切,就像托尔斯泰本人一样,感到并确信,从自己作品的一般内容里单独抽出来的东西已经不是真理,而是谎言。虽然他还不敢想到,真理不在科学那里,而在写着:"忍耐最终获得解脱"(《马太福音》,10:22)的那些费解和秘密的话的地方,但是他一直试图把目光投向索丽娅赖以生活的那些希望。"他想,要知道她和我一样,也是最底层的人,要知道她凭自己的经验知道,这样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也许从她的身上我会了解到,学者拉祖米欣不能向我解释的一切,会了解到,甚至一颗充满无限爱,准备牺牲一切的母亲之心所无法预料的一切。"他借口,考虑自己的痛苦就是,用当代科学的语言来说,"是个利己主义者",竭力在自己的记忆中重新恢复《福音书》的那个概念,即不拒绝孤独的、被杀害的人的祈祷和希望。他知道,在这里,他的悲痛会被察觉,人们不会用思想来折磨他,允许他说出一切关于自己的内心的可怕的真理,说出他诞生到上帝创造的世界上来时所带来的那个真理。然而他所以能够期待这一切,仅仅因为还没缩减的并没经科学和托尔斯泰伯爵修改过的、索丽娅读的那本《福音书》,因为写着拉撒路复活的传说和其他教诲的那本《福音书》。在这本《福音书》中,况且,拉撒路的复活本身就表明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它阐明了对贫乏的、欧几里得的人类智慧非常费解的其他话。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只在拉撒路的复

活中寻求自己的希望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在《福音书》中看到的不是这种或那种精神的说教，而是新生活的保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没有崇高的思想就不可能生存。而崇高的思想在地球上只有一个（着重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打），正是人的灵魂不死的思想，因为人赖以生活的一切其余的"崇高的"生活思想都只是由这一思想派生出来的"。[1]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10卷，第424页。

第十六章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科学”，况且，所有这一切直接违背了当代科学的基本出发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人类智慧的最新成就很少能够支配他。因此他从不努力让科学成为自己的盟友，同时一样提防用科学的武器来和科学作斗争。他很清楚，从老天那不会有更多的保证。然而科学的胜利、科学正确的必然性和明显性不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要知道，他早已告诉我们，对于他来说，墙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而仅仅是一种反对意见、一种借口。针对一切科学的意见他只有一个回答（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没有上帝我将在地下怎么样呢？苦役犯是不能够没有上帝的”。[①]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被捕的同伴们中唤起了对自己的科学性、清晰可见的明确性，以及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他们立即可以从他身上感到的不信上帝的疯狂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你这个无神论者！他们向他吼叫着，你不相信上帝，应该把你杀了！”[②]显然，所有这一切是不合理的。由于苦役犯把不相信上帝看成是最可怕的罪过，还不能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拒绝

①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 700 页。

② 《罪与罚》，第 541 页。

科学的无疑的结论。让一切苦役犯和地下室的人都完蛋吧,别因为他们而重新看待几十代人用劳动新获得的公理,别拒绝几百年前就认为是正确的、最终由哥尼斯堡哲学家的伟大天才所肯定的先验论。这种地上人很清楚的逻辑是和地下室人的不定追求相对立的。要调和这对立的双方是不可能的。他们会一直斗争到耗尽最后的力气为止,为斗争而斗争(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并不区分斗争的方法。自从有尘世以来,人们就诋毁、指责、诽谤苦役犯,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运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由的人。例如,为什么不给学者画一张漫画呢?为什么不嘲笑克劳德·伯尔纳[①]呢?或者为什么不诋毁和不唾弃自由出版物的记者和撰稿人,反而和这种人以及一切自由主义思想者在一起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就此罢休。为什么他一点也不捏造关于拉基金的东西呢!最绝望的苦役犯比较起这未来的自由派首领,一个为了25卢布竟愿出来拉皮条的人,显然是一位高尚的骑士。关于拉基金所说的一切是对自由主义者的真正的诬蔑、故意的诬蔑。可以对这种人说任何话,但是无疑,最优秀的、诚实的人也在他们的行列之中,然而仇恨是不分方法的。他们不相信上帝,应该杀死他们,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在动机,是他捏造各种各样关于自己过去的同盟者、自由主义者的谎言的动机。显然,纪念普希金的话曾号召俄罗斯各个阶层和组织团结起来,其实他的话却导致了永恒的决死斗争。“顺从吧,骄傲的人,努力吧,闲人”——难道陀思妥

---

① 克劳德·伯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法国杰出的生理学家。——译者注

耶夫斯基不知道，这些话正是在那些它们打算调解的人身上引起了狂怒和愤慨。这些话起了什么作用呢？它们让地上的人到地下室里去，到苦役中去，到永恒的黑暗中去。但是难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哪怕是一分钟，想过要大家跟着他走吗?！他清楚，他太清楚了，他的学生中那些不愿意虚伪的人不会响应他的号召。“现在，我们想在这里成为幸福的人”——这就是每个地上的人所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摆脱苦役，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据说，所有参加普希金纪念会的人都深深地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所打动。许多人甚至都哭了。然而，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要知道讲演者的话被听众当作文学作品，仅仅看作文学作品。这又为什么不能感动人，不能哭呢？这是个最平凡的故事。

然而也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事情看成别的样子，并且起来反对。他们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乐意接受他关于爱的崇高的话语，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也不应该影响人们“关心建立地球上的幸福，或者说，具有‘社会的理想’”。他们允许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但有一条限制，他要能够永远和自由主义者妥协。但是他不仅不会让步，他还对自由主义者的维护者，格拉多夫斯基[①]教授表示了疯狂的、无法忍受的愤怒，就真像格拉多夫斯基抢走了他的最后的一份财产一样。主要的是，要知道格拉多夫斯基不仅没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长篇小说和言词非常激烈的纪念普希金的演讲中所说的对人们的爱的伟大学说，而且，恰恰相

① 亚历山大·季米特利耶维奇·格拉多夫斯基（А. Д. Градовский，1841—1889），俄国法学家、政论家。——译者注

反，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上，仅仅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构造的计划。

然而正是这一点最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害怕。勒南在《以色列史》的前言中，对犹太人的先知们的意义有一段有趣的评价："他们是社会正义的狂热崇拜者，但却公然表明，让人们不正义或者变得易激动吧，他们宁可让人们去毁灭：虽然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完全被扭曲的，但却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既然一切学说都是绝望的，都是英雄主义的产物和人的权利的重大觉醒"（Ils sont fanatiques de justice sociale et proclament hautement que si le monde n'est pas juste ou susceptible de le devenir，il vaut mieux qu'il soit détruit：manière de voir très fausse，mais très féconde；car comme toutes les doctrines désespérées，elle produit l'héroïsme et un grand éveil des forces humaines）。格拉多夫斯基教授正是这样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的。他发现它们"实际上"是虚假的，但承认它们是富有成果的，也就是说，这些思想能够唤醒人们和让那些人类没有就无法前进的英雄出现。其实，希望更多的也不可能。至少，作为一个"导师"，这就应该是足够的了。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这种对待自己的态度中看到了自己的判决。他不需要"成果"。他不想满足于红衣主教老人起的"宗教大法官"的美好作用。他寻求一点，仅仅是一点：确定自己思想的"真实性"。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他准备摧毁整个世界，让人类注定要忍受永远的痛苦，只是为了赢得自己思想的胜利，只是为了摆脱对它的和现实不相符合的疑虑。最坏的是，在心灵深处，他本人，显然，害怕正义不在他这一方，害怕，敌人尽管比他肤浅，但却更接近

真理。这个东西正在激怒他，这个东西使他失去了自制力，因此他在反对格拉多夫斯基教授的争辩中越过了任何礼貌的界限。如果一切都正是像学者们所说的那样，他的亲身活动最终违背他的意志，帮助自由主义者，那么还有什么是富有成果的呢？而支配他的思想就是虚假的，那该死的善，迟早，确实会在居住着满意、幸福、喜洋洋的、重新振作起来的人们的地球上定居下来。

当然，持这些观点和有这种情绪的人最适合于不过问那些不可避免要与实际问题："怎么办?"相冲突的政论。例如，在长篇小说里，在哲学的推论中，可以肯定，俄罗斯人喜欢痛苦。然而又怎么把这种情况运用到实际中来呢？要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保护俄罗斯人免于幸福吗?！显然，这不合适。况且，由于降临到人类头上的痛苦事件，甚至不可能常常表达自己的喜悦。当人们生病和饥饿的时候，不会欢欣，不会为贫穷和酗酒而感到高兴。要知道，人们会为此而指责。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说，1873年1月份的《祖国纪事》的文章里说出的上述的思想，"从智慧、精神和经济上抢劫一空的灾难在威胁着改革后，和它甚至多少有点联系的人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是"新的开诚布公"。很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理解的，或者说，更确切些，他用《祖国纪事》的那篇文章阐明了思想。改革正是幻想者们所非常希望的，而它不仅没有带来可恨的"幸福"，而且用可怕的灾难来威胁人。显然，即使没有地下室的雄辩家所说的那种长着老顽固的面孔的绅士，事情也能完成。如果只是不幸而不是丰富的成果带来了最高尚和有益的开端，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水晶宫殿。确实，作为一个政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直接说出这些事情。他的"残酷性"恐

怕不会如此公开。甚至况且，他自己从来没有放过一次抨击的机会。“怎样抨击！”——这是残酷性的不同表现。例如，他起来反对欧洲进步，依据是，在阶级斗争使得我们的欧洲邻居变得有点聪明起来之前，会“血流成河”。这是他最喜欢的论据之一，他不知疲倦地重复了几十次。然而这里仅仅能够特别明确地相信，一切理由都是说教的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恐惧和鲜血吗？然而他知道，用什么可以影响人们，当需要的时候，他就描绘一些可怕的图画。几乎就在同时，他也指责欧洲人暂时还相对不流血的斗争，并且恳求俄罗斯人用战争来对待土耳其人，当然，哪怕是一场最小的战争也比几十次革命需要流更多的血。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有力例证。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的一个“熟人”赞同用树条抽打孩子，因为体罚会锻炼孩子并使他们习惯于斗争。关于“熟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在《作家日记》里，“熟人”的题材往往会说出一些“独特的”思想），我们，当然，和他们没关系，然而有趣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这种意见有兴趣，并且答应在闲暇的时候考虑这意见。而同时又是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方面把痛苦分给人们，甚至分给孩子，另一方面当谈到普希金笔下的塔吉亚娜的丈夫[①]的命运时，又突然多愁善感。如果塔吉亚娜决定抛弃他，使他不幸，那么一切理想都会永远地失去光彩！嗯，要知道，甚至不在“残酷性”的拥护者中间，我想，一份适当的“痛苦”对于一位高耸着肩膀和翘着鼻子的先生来说，也完全不是无益的。无论如何不比对那些，显然，在校外仍不被“痛苦”所遗忘的俄罗斯孩子们，更无

---

① 见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益。这种例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可以找到很多。在一页上，他要求我们为了把别人从痛苦中拯救出来而放弃个人私利，而在另一页上，几乎就是下一页，他又赞美这些痛苦……

因此得出结论，对于地下人，当他以人们的说教者身份出现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为了扮演这个角色，他必须永远深深地埋藏自己的真理，并且像老红衣主教所做的那样，欺骗人们。如果不能再沉默，如果终于彻底公开宗教大法官的时刻来临了，那么，人们就需要寻找献身者，已经不是在说教者中，就像过去那样，而是在总是乐意并忠实地(bona fide)完成着各种庄严的职责的学生中去寻找。说教者的最后的安慰被剥夺了：他们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人民的行善者和神医了。人们过去对他们说过，现在正在说着：治治医生自己吧。换句话说：去寻找自己的任务吧。你们自己的事情不在于治疗我们的疾病，而在于自己的身体。关心一下自己吧，只是自己。

第十七章

乍一看来，任务简单化了。但是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地下人、宗教大法官的观点，您就会明白，这种简单化中间隐藏着什么样的企图。显然，当任何治疗都已经没用的时候，当不能再想出任何东西的时候，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就请在地下治疗自己、关心自己、思考自己吧！然而奇怪的是：当不可避免的死亡威胁着人的时候，当在人的面前横着一条深渊的时候，当最后的一线希望消失的时候，从人的身上就突然卸下了一切繁重的职责，如对人们、人类，对未来、文明、进步的态度等，并且代之这一切就出现了一个关于他的孤独、渺小、平庸的个性的简单化问题。一切悲剧的主人公——都是"利己主义者"。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由于自己的不幸在追究整个世界的责任。卡拉马佐夫（当然是伊凡）直率地声明："我不接受世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卡拉马佐夫没有像大家那样，回避可怕的、难解的问题，而是就像熊迎着矛那样，直接迎着它们上去了呢？要知道这不是由于熊的愚蠢！噢，他是多么清楚地知道，这些难解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人是怎样用已经断裂的翅膀来撞击永恒的墙！然而他并没有屈服。任何自在之物、意志、超自然的神（deus sive natura）——都不能引诱他和解。这种被善所遗忘的人对于一切哲学体系都采取了

毫不掩饰的蔑视和厌恶的态度:“卡拉马佐夫说,另外一些无能的道德学家把渴望生活称为是卑鄙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无论哪位探索命运的主人公都没有用自杀来结束生命,不算基里洛夫,他如果是自杀的话,那么不是为了摆脱生活,而是为了试验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他们大家都赞同卡拉马佐夫老人的观点:他们不想忘记,他们是多么难以学会生活。伊凡·卡拉马佐夫的少年幻想就是这一观点的一幅有趣的图画。这些幻想是他在和鬼谈话的时候梦见的。一个罪人,在天堂的大门向他打开之前,必定要走一千万亿公里的路。罪人开始努力。“不走了”,他说。他躺在地上一点也动不了。就这样他躺了一千年,然后他爬起来又走了。走了十亿年。“天堂刚刚向他打开……还没过两秒钟,他就喊起来,为了这两秒钟不仅是一千万亿的路,而且甚至可以是一千万亿的一千万亿路,甚至增加一千万亿倍的路。”[1]关于这些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考虑过。这些令人头晕的走过的几千万亿公里,这些丧失理智的人为了用人类语言无法表达天堂的两秒钟而度过的几十亿年,仅仅是表达了这里所说的渴望生活。伊凡·卡拉马佐夫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私心浸透到骨髓里的利己主义者。他不是不能够,而是不想怎样在崇高的思想中敞开自己的个性,不想同“原始的统一的”大自然相融合,就像哲学家们所介绍的那样。尽管他受过最好的当代教育,但是他并不害怕面对整个哲学科学提出自己的要求。他甚至不害怕,人们把他和他的父亲混同起来(同时已经否定)。他自己直率地说:“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亲爱的

①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十二章,第272页。

爸爸，虽然曾是头小公猪，但是思考起来是正确的。"[①]而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本人，小公猪，很清楚地看见和知道，人们是怎样在想他。他"思考着"，尽管他已活够了，但是这种生活仍然太少。他还希望自己不死。这就是他和孩子们的谈话：

——伊凡，请说，有上帝，还是没有……

——没有，没有上帝。

——阿辽什卡，有上帝吗？

——有上帝。

——伊凡，不死是有的，嗯，总是有的，尽管很少，特别少，是吗？

——根本没有不死的。

——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

——就是说完全是零，或者彻底没有吗？也许会有吧？显然任何事都不会绝对的。

——完全是零。

——阿辽什卡，有不死吗？

——有。

——又有上帝，又有不死吗？

——又有上帝，又有不死。

——哼，也许，伊凡更对……

①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702页。

显然,果子已从树上掉下,落在不远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探索“崇高思想”的能力。要知道,谈话,请同意,是最典型的例子。“也许,伊凡更对”,这仅仅是客观的结论。它总是纠缠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害怕这一结论。然而,这里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需要认清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也许,读者会看到,如果有不死,那么无论如何不会轮到像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这样的坏蛋,也许能找到一种法律来宣判这个可恶东西的末日。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少关心读者的意见。他让拉基金远离自己的崇高思想,而让卡拉马佐夫老人接近它,并且吸收他,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苦役犯的可敬圈子。因此一切可恶、讨厌、困难、痛苦的东西,一句话,生活中一切有问题的东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都会找到热忱的天才的表现者。他仿佛是故意在我们眼前践踏天才、美、青春和纯朴。他的长篇小说中的恐惧要多于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恐惧描写得多么巧妙,多么真实啊!我们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能够这样叙述欺负和侮辱的苦楚,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在格鲁申卡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夫娜的故事中,任何东西都不会像这些女人所忍受的凌辱更令读者吃惊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夫娜在谈到托茨基时说,“……就是这个人会走来,……侮辱、欺负、发怒、淫荡,又走了——就这样她许多次想跳进池塘里去……”[1]而当格鲁申卡想到自己的侮辱时,她又经受了多少啊。她说,“就是现在,我的这个欺压者来了,我现在坐着并等待着。而你知道,我干嘛要这个欺压

---

① 《白痴》,第六章,第184页。

者呢？五年前，库兹马把我领到这里，我常常这样坐着，躲着，以便人们看不见我，听不到我。我瘦弱，有点傻，坐着并哭着，通宵不眠。我想：他，我的欺压者现在在哪呢？也许，他正和别的女人一起在嘲笑我，我已经是他的，我想，只要见到他，什么时候遇到，我就报答他，我就报答他！夜间，在黑暗中，我趴在枕头上号啕大哭，反复想着这一切，我故意撕碎自己的心，充满着愤恨。'我给他，我报答他！'我常常像这样在黑暗中嚎叫。我现在突然想到，我不会对他做什么，而他现在应该嘲笑我，但也许他已完全忘了，也不会再记起，我从床上滚到地上，流着无力的泪水，颤抖着，颤抖着直到黎明。到早晨我变得比狗还凶狠，愿把整个世界都吞下去。然后，你会怎么想，我开始积累资本，毫不怜悯地做着，发胖了，变得聪明了，你是这样想的，是吗？这是不可能的，在整个宇宙中谁也不会看见和知道这种情况，而如何对付夜间的黑暗呢，仍然还像一个傻瓜那样，像五年前那样，再躺着，咬牙切齿，整夜地哭，想着：'我报答他，我报答他！'你一直能听见吗？"[1]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男女主人公的信念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已经不是在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基里洛夫、沙托夫……他们大家都忍受着前所未有的屈辱。人们是多么艺术地把多尔戈鲁基(《少年》)从伊戈尔的房子里赶了出来，是如何唾弃地下室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收集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材料，以便重新以神秘不解的力量打击读者的心灵，但是这次已经不是为了读者变得更善良，每逢礼拜天和节假日能宽宏大量地把最底层的人称为自己的兄弟。现在是另外的

---

①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十二章，第420页。

任务。现在需要摆脱科学、“伦理学”,就像拉基金和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所说的那样,需要承认,大多数人满意的体制、人类未来的幸福、进步、思想等等,一句话,所有至今用来为某些人的死和屈辱辩白的一切,都不可能解决生活的主要问题。准确地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现实中,即使是最头号的和可靠的实证主义者,即使是最“善良的”人也未必能够有足够的心地来记住自己的理想。当遭大家诽谤的“利己主义”导致悲剧的时候,当孤独的斗争变成不懈的努力时,没有一个人会不知羞耻地说些大话。甚至是信仰坚定的心灵也会沉默……然而这里我们所抨击的已经不是实证主义者或者唯心主义者的学说,不是哲学理论,不是各种学术体系。人们可以开导,可以让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用指出悲剧的人的命运的方法来追求体系的综合和一致。但是怎样对待生活呢?怎样迫使生活来注意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卡拉马佐夫呢?要知道,它无论是羞愧,还是良心都没有。它冷漠地观看着人间的喜剧和人间悲剧。这个问题把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引到了他的继承人尼采的哲学上来。首先这一哲学公开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一句可怕的话:颂扬残酷性。

第十八章

我们细心观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信念的蜕化历史。简单地说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恢复地下室人的权利。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尼采的作品,那么,尽管从外表上看这些作品很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相似,但是我们首先会在它们中间发现这后者创作中令我们吃惊的那些情绪和感受的明显无疑的表现痕迹。尼采在年青时代也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脱离现实的幻想家。告诉我们这一点的决不仅仅是他的第一部作品——《悲剧的诞生》,而且甚至是论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些文章直接和文集《人性,太人性的》有关。在这本文集中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还是胆怯小心地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和人们。为了这个经验他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他的大部分朋友,包括瓦格纳,都和他断绝了往来。他们任何人,常会有这种情况,都不感兴趣发生在尼采心灵中的突然转折的原因。朋友们只会喊叫着,他背弃了过去的信念,并且认为,这一点就足够谴责他了。大家都知道,尼采病得很重,很痛苦。然而他们从这一点中却看不见可以减轻尼采罪过的情况。瓦格纳在不久前还高度评价过尼采的文学活动,在读了《人性,太人性的》之后却表示愤慨,以致不认为至少应该试图来劝劝自己的年轻朋友和学生。他只是保持沉默并且一直到死

都没有恢复同尼采的关系。就这样，在自己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按照一般的观点来看，当人最需要精神支持的时候，尼采却完全是孤独的。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许多的其他情况下，一般的观点在毫无疑义的真理的幌子下必定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在生活中真正困难的时刻，朋友的支持一般没有任何作用，也不可能给人提供什么，而只是会用厌烦的要求坦白和承认来使他苦恼。在这种时候最好让他独自一人。有足够的力量忍受自己的不幸，就会成为胜利者。不过——反正瓦格纳无论如何也帮不上忙。当然，我说的不是一般的生活困难。在遇到生活困难时，两个人的智慧总是比一个人要好，而我说的是，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当大地在脚下抖动的时候所发生的难处。要知道，这些难处往往在生活中比在小说中更常出现。朋友们在这里根本不可能帮上忙。然而尼采的朋友们就没想到要帮助他。他们变成了他的敌人，不想努力让自己去理解人，而用诬蔑来报复他。用尼采的话说，这次话特别值得相信，忍受别人的诬蔑要比自我蔑视更加难以接受。[①]确实，无论人怎样蔑视自己，在他的心灵深处总还生存着希望，他总还在探索摆脱困境的出路。而人们的判决却是无情的、确定的、彻底的。同时一旦定罪，就永远不能够翻案……

尼采自己承认，《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写成的时候，无论是对叔本华的哲学，还是对瓦格纳的艺术他已经都不相信了。而同时这些文章还一味地大肆赞扬他们。为什么需要这种虚假呢？尼采说明，在同自己的老师告别的时候，他想

---

① 《尼采文集》，第 2 卷，第 376 页。

为了过去向他们表示感激和谢意。我认为，读者会以为这种表示感谢的方式是不值得同意的。因为应该善于为了真理而牺牲自己的朋友和老师。也许，即便是尼采本人也同意这种意见，尽管他知道和他们告别的时候已经来临，还仍然作为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公开追随者在说话，那么关于这一点他也许会有别的不太好的但无疑是更深层和严肃的原因。显然，问题并不在于是老师，还是学生。因为如果尼采本人明确地知道，他离开了他们后应往哪走，他也许会很少讲礼节地和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导师再见。我们看到，感激和谢意并不影响他后来写出激烈批评瓦格纳的文章，也不妨碍称叔本华为“老伪币制造者”。然而这已经是到了他文学活动的尾声，即在1886—1888年间。在1875年他还不敢想，在他的心灵里会产生出一些还不定型的和混乱的思想和情绪，这些思想和情绪将可能反对严整的和完美的，已经得到公认的叔本华的哲学和名噪整个欧洲的瓦格纳的荣誉。他认为，人可能产生的最大恐惧，这就是脱离老师，背叛过去的信仰和信念。他想，人是从值得尊敬的老师手中获得终生的信念的。尽管他读了许多书，但是他根本没想过，这种从别人那得到的现成信念比自己由亲身体验和痛苦而产生出来的生活观更缺少价值。也就是说，看来他知道这一点。其实，甚至他说过这个意思，因为在他读过的书中（例如叔本华的），关于这一点已不止一次详细地说过。然而当他“亲身经历”的时候，尼采无意识地同一切和他处境相同的人一样，没领悟到书中说的一切。他只是恐惧地感到，在他的心灵里一种前所未有的讨厌的和可怕的东西在骚动。他处在痛苦和绝望之中，他还没认识到那个著名的“痛苦”。这一痛苦，他在继叔本华之后，在自己的第

一部作品——《悲剧的诞生》中赞同和提倡过。他很少感到自己像一个英雄，像许多有趣的罪人中的一个，像瓦格纳歌剧中出色地表演的那些罪人之一，扮演着坦盖泽尔的角色。在他的处境中没有一点他习惯于在古曲作家的作品中欣赏到的悲剧色彩的痕迹。他并没为了人类的利益窃取天火。他没像俄狄浦斯那样猜出斯芬克斯之谜。他甚至没有进过维纳斯的洞穴。相反，当他回过头来看待自己的过去时，他所看到的是一连串最可耻的侮辱。这一段话就说明了他是怎样为艺术服务的，也就是说明了他对待瓦格纳的态度："他运用了一句'蒙难者反对意志'的格言来说明，在一个政党中，有一个人，他要反对自己的同伴们，因为他们为了任何目的就利用他，对他随心所欲，却又太软弱和胆小，由于他比死更怕自己同志的反面意见；这是一颗可怜而又软弱的心灵。同伴们了解他，就利用了已说明的他的特点，使他成为英雄，而最终甚至成了一个蒙难者。尽管软弱的人总对自己说'不'，然而当他为了自己政党的信念时，甚至在断头台上，他也会高声地喊道'是'。这是因为在他的身旁站着一位他的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在用自己的观点和话语压迫着他，以致他确实认为值得去迎接死亡，并且从这时起成为一个蒙难者和具有伟大的性格的人"。[①] 如果这几句话概括了尼采的"过去"，那么是否可以相信，当同它告别的时候，人就产生了一种感激的情感呢？文章《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和《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之所以写出来，仅仅是因为尼采仍然一直继续在自己身上感到瓦格纳的观点（也许并不是一个瓦格纳），并且无力同他

---

① 《尼采文集》，第 2 卷，第 86 页。

的引路人的影响作斗争。真的,又怎么能斗争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自己来尊重自己,用现在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过去,承认那些他通常称为可怜的和不体面的人的报纸评论员叫他是“瓦格纳的仆人”是有道理的,换句话说,需要让自己注定成为最底层的“人”。迈出这可怕的一步,人不会立即下决心的,尼采一直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对自己组织有益的人,哪怕是用言论来支持党的原则和追求,至少要保存好的名声,至少谁也不会知道,他是如何厌恶和可耻地感到不幸。这还是有点值得的。尼采是一个高傲的人。他不愿公开自己的伤口,他想掩盖起来,不让外人看见。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伪装和撒谎,为了这一点,必须为叔本华和瓦格纳写一些狂热吹捧的文章,尽管他在心灵里已经几乎在恨他们,因为他认为他们是自己过去不幸的主要罪人。但是话又说回来,谁需要他的真理呢?如果他想说出真理,那么他又可能说出些什么?公开承认自己的卑鄙吗?但是难道在世界上这种卑鄙的人还少吗?难道这种承认会使任何人感兴趣或吃惊吗?要知道,其实,没有任何特别的。尼采曾想,他自己是一个肩负着重大事业的伟人。实际上,他错了,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和可怜的人。这种事常常发生在生活中。只是谁也没去想它罢了。例如,尼采本人就不得不相信,大卫·施特劳斯,这个德国人尊为伟大的哲学家和标准的修辞家的人,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有学识的市侩”,连普通的文学语言都掌握得不好。难道这种揭露使任何人,甚至尼采本人感到吃惊和害怕?当然没有。在地球上即使没有大卫·施特劳斯,也还会有足够的杰出的哲学家和标准的修辞家。如果尼采客观地来考虑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很容易确信,他个人的情况并没有

特别的意义。如果他同样能记住叔本华哲学的基本观点，那么他就完全可以告慰自己的不幸了。要知道"意志"是矢志不渝的，是否值得去想，一个人，也就是说意志的许许多多的表现中的一个，是郁郁不乐的呢？然而只要人去认真地接触生活，一般的哲学的基本观点就立即会从记忆中消失。如果尼采还记得叔本华，那么，已经不是为了在他那里寻求安慰或者支持，而是为了咒骂他，就像骂自己的最凶恶的敌人那样。"我对我的敌人说这样的话，任何一种方式的杀人与你们对我做的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你们对我做的，比任何一种杀人方式更坏，你们剥夺我的是无法挽回的：所以我对你们说，我的敌人。你们扼杀了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和心爱的东西。你们从我这里夺走了我的伙伴，怡然自得的精神。在这里我向记忆中的他们献上这个花圈和诅咒。这就是对你们——我的敌人的诅咒。"[1]这些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是针对瓦格纳和叔本华的。尼采咒骂自己的老师，是因为他们扼杀了他的少年时代……

---

① 《尼采文集》，第 6 卷，第 161 页。

第十九章

然而,我们又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大声咒骂(WOZU solch Lärm)呢?出了什么事呢?尼采要死了吗?难道这就有充足的理由来诅咒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吗?如果我们看看尼采最早的一些作品,如果我们来倾听一下查拉图斯特拉关于超人的"学说",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其实尼采决没有任何必要这样激动。一个生命的不幸,并不是任何灾难。大自然创造了几十亿个人,它的任务不在于保护和发展个别的人,而在于完善人的外表和种类。叔本华是这样说的,查拉图斯特拉也几乎是这样说的。那么扼杀一个教授少年时代的幻想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难道这会对人类构成什么威胁吗?

尼采十分清楚,他从叔本华那里吸收的哲学观点中包含着对他自己的判决。只要他有权认为自己是一个杰出的人!但是,在为自己辩白的时候,他甚至不能够表现出自己平时的天才。很显然,从上一章所引的格言"蒙难者反对意志"中就可以发现。那时他本人把自己仅仅看成瓦格纳的可怜的仆人。为什么如此渺小呢?是不是能更好地悄悄隐退,把生活的位置让给人类更称职的代表呢?现在正是尼采想要有机会来运用叔本华哲学实现自己庇护的公共道德的高要求,不是在口头上证明,而是事实上证明,自

我牺牲和舍己为公的思想——不是空喊，而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它鼓舞人，并给人以顺从地忍受最痛苦命运的勇气。但是尼采所做的却正好与他从伟大的教育家叔本华那里得到的、他过去的“信念”所要求的一切相反。尼采不是顺从，不是在不幸之中为人类过去的成就和新的希望而感到高兴，不是最能和《悲剧的诞生》中所说的信念相一致，他决心用自己的命运来检查千百年来遗留给我们的，人类最优秀的智慧多次出色地证实了的理想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早在《人性，太人性的》之中，他就已经“提出了关于非自私动机的价值问题，提出了关于怜悯、舍己为公、自我牺牲的本能问题。而这些本能正好是叔本华长期以来一直赞美、崇拜和奉为彼岸(verjenseitigt)的东西，直到最终它们对于他来说不再是对自己(an sich)有价值的时候为止”。[1]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像创作自己的最初的一些作品那样，不去请教哲学家、诗人、说教者，一句话，不去请教代代相传的说教者们的学说。他感到，在这一切中，他不会为自己找到答案的，仿佛人类的所有导师都说好了对于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东西保持沉默。至于他自己曾经以一个无所不知和无所不晓的法官的骄傲和自信写成的那些个人的文集，他长时间来不敢提一个字，只是在后来，过了许多年，他在写序的时候，或者，更确切些说，在给《悲剧的诞生》写后记的时候，才试图评价自己最初的文学经验。人心的构造是多么奇妙啊！尽管这本书在他看来许多方面写得很糟，尽管他出色地发现了它的一切缺陷(“……但是一本表现我年轻的热情和疑虑的

---

① 《尼采文集》，第7卷，第292页，第293页。

书，一本难以忍受的书应该从这种青少年的任务中解脱出来”。[①])，但他还是不能不对它充满着父亲般的温情。而同时，他自己又说，他应该痛恨它，就像对待叔本华的文章和瓦格纳的音乐。要知道，它最充分地说明了那种与生活的格格不入，那种对现实的恐怕，一句话，说明了那种浪漫主义。由于尼采受到特殊的娇惯教育，这种浪漫主义早在少年时代就完全控制了他的容易轻信的心灵。不仅仅是《悲剧的诞生》，而且所有的尼采最初的作品，直到《人性，太人性的》，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作者应该痛恨它们。它们都是最纯洁的浪漫主义，也就是用现成的诗歌形象和哲学概念多多少少地做着妩媚的游戏。对于年青的尼采来说，叔本华的话就是法律。在 1875 年，当他已经 30 岁的时候，当现实已经开始向他提出最初的严酷要求时，他写道，“我属于叔本华的读者之列。这些读者只要读了一页他的作品，就已经大概知道，他们要读完他写的一切，并且都仔细地注意倾听他的每一句话。他立即赢得了我的信任，即使是现在这种信任也并不比九年前弱。我理解他，仿佛他就是故意为我写的一样。”[②]显然，现在尼采已不信任了。一般地说，对待“信任”应该更小心些，叔本华最不像一个青少年的导师。这一点已经表现在他讲话中提出的那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年轻人，甚至是有才能的人也很少关心。这种情况在音乐方面也不更好些。瓦格纳及其歌剧对于不成熟的人来说是危险的，并且迫使他们提前进入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和难以达到的区域。后来尼

---

① 《尼采文集》，第 1 卷，第 3 页。

② 同上书，第 398 页。

采本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酷爱艺术，”他写道，“怀着真挚的热情，并且最终在一切存在中没看见任何东西，除了艺术以外。这是在那些年代，当一般的其他的热情在激动着人心的时候。”[1]

其实，相信叔本华的学说和迷恋瓦格纳，对人来说，也不总完全是必然有害的。如果尼采的生活没有遇到意外的麻烦的话，那么，也许，即使到了高龄，他还会在心灵中保留对自己导师的爱慕之情和忠诚。浪漫主义并非总会糟蹋和歪曲人的命运。相反，它常常使人们幸福地避免和现实冲突，并且促使长年保持那种纯洁的心地，那种明亮和幸福的观点，那种对生活的信心，而这些又是我们在各种哲学中给予最高评价的东西。尼采本来也能够一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都在发展自己在《悲剧的诞生》中所奠定的基本思想。他本来可以教人们同生活的恐惧相妥协，可以像他的前辈那样做，颂扬“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这样也许他会在同时代人中间获得极大的尊敬，并留名于后代。因为要知道里尔教授[2]称他的《悲剧的诞生》是一部天才之作。确实，也许在这位德国教授的这种评价中完全可能发现某种政治上的滑头行为。也许里尔教授没有找到全面指责尼采的合适方法，他又希望以一个公正的法官的面目出现，所以他宁愿过分地赞扬尼采的那本书。而这本书更像那些想放开自己的手脚再自由地创作其他作品的所有人所写的东西。但是仍然无疑，尼采如果继续用《悲剧的诞生》的精神

---

① 《尼采文集》，第 11 卷，第 130 页。

② 里尔(Alois Riehl，1844—1924)，德国实用主义者、新康德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批评家。——译者注

来写作，那么他不得不只是在现行观念允许和希望的标新立异的程度上脱离普遍的信念和观点。当然，在他创作生涯的初期，他就会有敌人，但是最终他会以造诣精深的阐释既使敌人屈从，又最能保证周围的其他人对他的可喜的敬爱。毫无疑义，如果尼采处在别的环境之中，他也许会写出其他的东西，里尔教授也许会心平气和地称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天才之作。

然而命运却并非如此。它并没让尼采平静地去研究整个人类的未来，甚至整个宇宙的未来，它给他提出了，就像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一样，一个不大而且又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未来。但是这位敏锐的、敢于正视全世界的恐惧的哲学家，在这个不复杂和看起来很容易的任务面前，发窘了并束手无策。在这方面他过去的渊博的学问对于他来说已是无用的了，甚至是累赘。他写道，“一切崇高都令我厌恶。我们是谁呢？”[①]而同时这种“崇高”是他以前赖以生活的，他曾把它看成伟大的智慧，并且以宣扬它为自己神圣的使命。但是现在必须把它抛弃了。那么抛弃了以后又剩下些什么东西呢？应如何面对所有的人呢？对瓦格纳说些什么呢？独自一人应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尼采努力使自己新的现实和旧的“信念”协调起来。正如已经所指出的那样，他写了关于瓦格纳和叔本华的文章，希望习惯能控制自己，他能重新逐渐习惯他现在所必需的理想信念。然而这种希望是错误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伪装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对于尼采来

---

① 《尼采文集》，第11卷，第153页。

说更是可怕的事,伪装变成了现在的努力。他已经发现,按旧的方式生活是不可能的。他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知道朋友们,主要是,瓦格纳决不会谅解他的背叛,他否定了原来的上帝,沿着新的道路走下去,尽管新的道路除了危险、折磨人的猜疑和永恒的孤独以外,决不会给予他任何其他的东西……

第二十章

他是怎样走上新的道路的呢？他用什么东西来取代旧的信念呢？回答只有一个：没有任何东西。除了现在讨厌的肉体的痛苦，除了对过去的可耻的被侮辱的回忆和对未来的疯狂的恐惧，没有任何东西。他不可能有任何希望，因为是一个精神崩溃的病人，他把生活中最好的年华花在了无益的、不需要的、对他没有任何用处的事业上，又能够希望什么呢？在30岁以前，他就像我们的伊里亚·穆罗密茨[1]那样深居简出，仔细地思考着别人的理想。现在需要站起来走了，但是腿又不听使唤，而现在没有带着神奇饮料的行善长老，将来也不会有，因为在我们今天不存在奇迹了。除此以外，病情却十分严重，以至于他不得不放弃平时整天在上的教授的课程，昼夜二十四小时地闲着，独自思考和回忆着。甚至夜晚他也不能休息和安宁，因为失眠、沉重的精神病常常使他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就是这样的人成了一个作家，他让自己用自己的话来对人们说。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样的人是否有权利来写作呢？他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呢？他过去和现在有什么可痛苦的呢？然

---

[1] 伊里亚·穆罗密茨，俄罗斯壮士歌中的主人公，勇士，俄罗斯土地的主要保卫者之一。——译者注

而我们已经从诗人那里听到了相当多的抱怨。年青的莱蒙托夫早就已经公开说出了隐藏在别人心中的那种思想。尼采是否痛苦,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在诗人又是一回事。要知道他们不是简单地在抱怨!他们把抱怨变成了响亮和美丽的诗,用他们的眼泪来浇灌花朵。我们在欣赏花,但不会想到眼泪。诗的美妙的和谐使我们高兴,即使是最凄凉的音调。但是尼采——是一个哲学家:他不善于,也不能够歌唱,他不得不说,难道他决定向人们讲述自己不得不经受的一切恐惧,这个千篇一律的故事吗?或者哲学有自己的花和诗,是它们构成了哲学关于存在的论据(raison d'être),这个科学的科学也是艺术,是一门把各种各样有趣的和引人入胜的东西当作真理的艺术?让我们来听听尼采的解释。在这些方面不是许多人可以用形形色色和多方面的经验来同他相媲美的。他自己详细地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写出自己的著作的。"他写道,谁只要能够多少猜出任何一种深层的疑虑会带来什么后果,谁了解任何一种与流行观点迥然不同的看法(jede unbedingte Verschiedenheit des Blicks)所必然会给我们带来的孤独的恐惧和寒冷,他同样就会知道,我常常是怎样不得不为了医治好自己,为了哪怕是暂时打个盹儿,在对任何的虔敬之中,在仇恨之中,在科学基础中,在浮躁和愚蠢中为自己寻找避难所。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找不到我所需要的现成的东西时,当我在人为地为自己获得避难时,我要杜撰和虚构(诗人们还能怎么办呢?整个艺术总的说来为什么会存在呢?)"[①]是一个不坏的坦白,难道不是吗?艺术被当

① 《尼采文集》,第2卷,序言,第3页,第4页。

作现实的一个故意的伪造品，哲学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说明的。否则就无法忍受孤独的恐惧和寒冷。但是难道伪造品，特别是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帮上忙吗？难道用这种欺骗理智和良心的办法就能使“自己的”生活观变得稍微乐观一点吗？而且，难道我们应该任意地改变“观点”吗？我们看见我们所见到的，在我们面前摆着的东西，意志的任何努力都不能够让我们把黑的说成白的，而是相反。显然，尼采考虑得不一样。在《文集》第3卷的序中他说：“那个时候（也就是指生病的时候）我学会了那种孤独的语言，这种语言只有孤独的和受过许多痛苦的人才会熟悉：我说着，没有人听，或者更确切些，根本没想要有人听，一直说着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又仿佛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东西。我那时学会了假装是精神饱满、客观的、爱追根究底的，首先是健康和爱嘲笑的艺术。我认为，对于病人，这是一个好征兆。然而，这本书（《人性，太人性的》）特别有趣的地方是不会回避较灵敏的和同情的观点。因为他发现，这里病人和毫无生活保障的人说话就仿佛他们不是病人，不是生活无保障的人一样。在这里人追求无论如何要保持平衡、宁静，甚至对生活的感激；在这里占主要地位的是严肃的、高傲的、永远饱满的、永远激昂的意志，它的任务是维护用生活反对痛苦、并且拒绝一切结论。这些结论就像毒海绵一样，在痛苦、绝望、厌烦、孤独的各种各样的沼泽地上滋生出来”[①]……

现在我们知道尼采是怎样写自己的书的。大概，他不该摆脱思想的控制。他曾经一边为瓦格纳和叔本华辩护，一边说着和他

① 《尼采文集》，第3卷，第5页，第6页。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却又装着仿佛它们对于他是有意义的。现在，他一边以“生活的辩护人”的新姿态来说话，一边又重新压抑自己的一切反抗、整个的个性、自己的一切，以便来赞美自己新的主顾。他又变得虚伪，重又起着作用，但这次已经不是无意识的了，不是问心无愧的，就像年轻时代那样。现在他认清了自己的行为。现在他知道，不这样是不行的。当他完全应肯定地说“不”时，他却不得不大声地说“是”。这时，他不仅不感到可怕，而且甚至为这种艺术而骄傲，并且在它中间看到特殊的魅力。他拒绝一切生长在绝望、痛苦、孤独的土壤上的结论，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只有在他这种处境中的人那里才可能产生的结论。究竟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在他身上活动着呢？谁应该拥有控制他心灵的主权呢？也许这是旧的理智，它已曾经恶毒地作弄过尼采，后来就丧失了一切过去的权利，现在又重新以力量或者狡猾占据了自己过去的首要位置吗？或者人的良心和羞愧引诱尼采重新回到与他格格不入的信念那去，并且让病人和毫无生活依靠的人去假装成健康和幸福的人吗？事实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应该指出，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直到最后的，尼采以一个最坚定的非道德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面目出现，他把中世纪作为与十字军骑士在圣地冲突的伊斯兰教教派之一的秘密暗语的那些可怕的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没有任何东西是合理的，一切都允许做”，在自己的所有的作品中，尼采都始终不渝地诉诸于某种上级，他要不简单地把这种上级称之“生活”，要不称为“生活的总和”，他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嘲讽的话最出色地概括出的印象，结果是：“一切都允许做，够

了！……只是如果想要骗人，那么为什么，我认为，还要赞同真理呢？"[1]对于绝对无上命令的崇拜者来说，尼采爱好赞同真理可以成为他的整个学说的最好的反驳词。我非常惊奇，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以表面的不可战胜的论据来反对他。况且，在尼采那常常遇见的和他的观点中往往遭指责的矛盾主要来源于，崇拜新的，现在已替换了许多老观点的，"抽象的惨无人道的屠杀"。我其实并不想这么说，赞美真理或者，更好地说，任何总的最终赞美属于那些人，他们声明不是一切都允许，并且拒绝欺骗，当然，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使用这一词的意义（要知道这样的说明还是必须的！）。不但如此，我已经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苦役的崇拜中，明显地表露出一种意思，就是赞美，正像唯心主义者至今所吹嘘这是自己不可分割的特权一样，被这些人窃为己有是完全不合法的。席勒曾毫不动摇地，甚至没想过可能有任何动摇，就让自己笔下的腓力二世[2]口中说出了下面的话：

我很中意

卡洛斯[3]不听我的劝告，但是

我很烦恼地发现，他很蔑视它。

(Gern mag ich hören,

---

①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十二章，第769页。

② 腓力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年），席勒等人作品中的人物。——译者注

③ 卡洛斯（1545—1568），西班牙腓力二世的儿子。他和父亲发生争执，死于狱中，他的形象经作家美化，成为许多作品的题材。——译者注

Dass Karlos meine Räte hasst, doch mit?
Verdruss entdeck ich, dass er sie verachtet.)

这句话正好永远确定了那些典型的关系。他们的代表是腓力二世和卡洛斯先生。卡洛斯先生鄙视,腓力二世则感到自己很荣幸,哪怕是从儿子那一方感到对自己的仇恨。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在善与恶之间,用更通俗的话说,这种关系是永恒的:恶无力战胜善的蔑视,所以就秘密地自己蔑视自己。也就是,赞美真理是属于卡洛斯先生和他善良的心地。那么腓力二世怎么样呢?如果他想"欺骗",那么就会希望任何的赞美。席勒的时代就是这样的。现在情况已经变化了。现在卡洛斯先生们就像期待施舍一样,在等待着腓力们的仇恨,然而除了蔑视什么也没得到。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苦役或者尼采以可怕的真实性,在上面已经引的查拉图斯特拉的一次讲话中,表明了这个思想,"你知道吗,我的朋友,你那公正的蔑视和折磨人的话,对那些蔑视你的人是正确的"。请把这些话译成具体的语言,而且任何一个想在书中找到不只是美的享受的人都应该作这种翻译,这样您就能获得腓力和卡洛斯先生相互关系的新公式。已经不是腓力知道蔑视的话,已经不是他追求必须承认,公正(赞美真理)不在他这一边,而在他的敌人的一边,而是相反卡洛斯先生得到了所有这些满意的回答。

第二十一章

然而我们先搁下赞美的争论不谈。当人们狂热地、凶狠地和无情地努力证明自己赞美权利的无可非议和特殊性时，他们自己得到了什么，先不说。现在我们谈别的。有一种作家，他自己不止一次地承认，他在写自己的著作时，仿佛他不是实际上应是的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作品呢？确实，尼采的方法对俄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我们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话就仿佛不是一个地下室人，不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是卡拉马佐夫，他伪造信念、爱情、温顺以及随便什么。我们有托尔斯泰伯爵，他超越了"虚荣、贪财和骄傲"，写出，他自己是怎样因晚期追悔而创作《忏悔录》的。因此我们不能直接否定尼采，如果我们想这样的话，就不得不接着他之后同样去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伯爵。也就意味着，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伪装，然后，它是否需要。这里我们来说说还是那个尼采。在《人性，太人性的》前言中，上一章里我们已经从这里引了一段，仿佛完全解释和表白了这种奇怪的方法："……尼采说，那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新原则：病人还无权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那时我便开始了同任何脱离现实的悲观主义的反科学的基本倾向展开了耐心的和努力的斗争。这种悲观主义宣扬和鼓吹个别人要忍受相当普遍的意见，甚至对宇宙的判

决……一句话，那时我让自己转到了另一方面。就是乐观主义，为了后来能重新获得成为悲观主义者的权利而需要恢复力量，您能理解这一点吗？就像一位医生，他把自己的病人换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去……这样我既是医生，也是一个病人，我迫使自己适应完全不同的，还没体验过的心灵气候”。[1] 但是难道这些想法足以说明作者的伪装吗？假定，病人确实无权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令人羡慕的字眼！）并且乐观主义是作为一种心灵气候的改变，那么也许真的对于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学生是有利的。然而当第一版的两卷集《人性，太人性的》还没附上前言说明时（只是过了8年以后才写出来），拿到书的读者怎么可能猜出，他们接触的不是简单的书，也就是说，不是作者所表达出来的观点，而是人为地制造出的，仅仅适合于某种人的病症和气氛呢？无论是文集的题目，无论是书中的阐释，都没表达出任何思想。假如尼采的文学活动仅仅局限于他的文集的前四卷，那么即便是最敏锐和最称许的眼光也不能够在这些论文集中发现作者的目的。甚至现在，当我们见到了长篇大论的序言，当我们了解了他的文集的后四卷，当我们熟悉了尼采的生平的时候，批评家们还努力坚持相信，在《人性，太人性的》和《曙光》中尼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证主义者。这样，显然这些书并没达到自己的目的。治疗经验的产生应该不是公开的，而是在自己的家里，不告诉任何人。尼采是否知道这个人人皆知的道理呢？所以，上面所说的那种解释可能对于我们仅仅只有了解生平的意义，并且很少能够为探索

[1] 《尼采文集》，第3卷，第9页。

尼采在自己生活的这一时期所运用的真理提供途径。然而正是在《人性,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里他已经非常明确地说出,尽管还不太大胆,自己关于道德的见解。在《道德的系谱》(*Zur Genealogie der Moral*)的序言中,他自己就指出过这一点。既然我们希望了解尼采世界观的根源,既然我们想知道他的新信念是怎样“诞生”的(要知道这是我们要做的一切事),我们就无权在他的“实证主义的”作品中看到的仅仅是自我治疗的经验。在它们中已经需要去寻找一切,并且在它们中一切都已存在。后来这一切使得尼采得出“善与恶的彼岸”的公式,使得他赞扬残酷,歌颂利己主义,确立了永远轮回的学说、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甚至超人的理想。当我们仔细地研究它们时,我们确信,它们有时更多地是在向我们谈论它们的作者,比查拉图斯特拉的激昂的语言和在“反基督者”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痛苦创作的放纵更多。这样就不得不认为自我治疗的事有很大的局限,甚至暂时要完全否定。

更重要的,因此值得更加注意研究的是另一种解释。我们已经稍微提醒过读者注意它。尼采说,在《人性,太人性的》里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使生活免于痛苦,拒绝一切像毒海绵一样,在任何多沼泽地上繁殖痛苦、绝望、厌烦和孤独的意见”。这已经无疑是寻找真理的一种方法,当然,尽管是否定的方法。我们只是应该来检查它的用途。它真的是否在寻找着,并且能够寻找到“真理”,或者相反(要知道,这对于各种方法来说是常事)——背离真理呢?让我们重新来看看尼采的经验吧。在论述苏格拉底及其学说时,他说:“哲学家和道德家在欺骗自己,以为,在向颓废宣战之后,就

能摆脱它。他们无力自拔，他们选择的作为挽救手段的一切方法，本身将仅仅是颓废的表现，它们只是改变了一种形式，但是实质仍然还是一样。苏格拉底的学说只是没被人理解。追求白天的光明，竭力追求理智，希望使生活明亮、冷漠、严肃、自觉、非本能化以及反本能化——所有这一切只是一种病症，一种新的病症，而决不是恢复'道德'恢复'健康''幸福'……同本能的斗争是勉强的，这就是颓废的公式：当生活在发展的时候，幸福与本能的意义相同"[①]。所有这一切都是属于苏格拉底的，属于他自我斗争的宣传或者属于"修改的理论"，就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在自己身上打倒颓废被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苏格拉底是一个颓废分子，他力图自拔的一切努力都只是颓废主义和堕落的新表现。他不适合当教师，他的学说本身也许整个都被推翻了。那么，而尼采本人呢？除了在他死后遗留下来的笔记中还保存着他承认自己在精神上接近苏格拉底的记载以外（"必须承认，苏格拉底离我太近了，以致我不得不常常同他作斗争"）[②]，就在论述修改的道德的那个第 8 卷中，作为绝望地拯救死人的绝望方法，我们在一篇论瓦格纳的文章的序中遇见了下面的一些话："我，就如同瓦格纳一样，是我们时代的儿子，是颓废主义分子：只是我懂得这一点并且同它斗争，我身上的哲学家在同这一点作斗争"。[③] 然而其实，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斗争本身只是"一种病症"，只是颓废主义的一种新表现。就是说，尼采的一切活动都等于零，无论自我医治的努力怎样，他

---

① 《尼采文集》，第 8 卷，第 74 页。

② 同上书，第 10 卷。第 452 页。

③ 同上书，第 8 卷，第 9 页。

都仍然是个颓废主义者吗？用他的话说，像苏格拉底和瓦格纳那样吗？怎样解决这个基本矛盾呢？是否承认，尼采不公正地评判了当代性，因而错误地评价了瓦格纳和苏格拉底。或者相反，同意与颓废主义的斗争也是一种颓废主义并且把尼采本人也归入绝望的、无用的人之列呢？显然，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很大的。然而由于问题很大才不应该忘记指出性格的心理特征。由于苏格拉底，尼采特别坚决地发表了关于任何反对"颓废主义"的斗争的努力都是毫无结果的观点，甚至千百年来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这位智者的荣誉也不能使他减轻自己对这位著名的希腊人的判决。但是当问题涉及他本人时，这种理论仿佛就不存在了。这时，不仅可以同颓废做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必然取得可靠的胜利，只要有足够的勇气、意志和力量。尼采在另一个地方说，"生活本身会因我们的坚定的生活意志，因我同自己进行的反对缺乏生活信心的悲观主义的漫长斗争，而奖励我们……我们因此从生活那里得到最大的礼物，得到生活所能够给予的最大礼物——我们重新接受我们的生活使命"，[①]然而苏格拉底是否就没表现出勇气和力量呢？这对于他是没有用处的！尼采毕竟得到了解脱，并且认为自己有权重新接受人们的教师的伟大使命，而这一使命对于苏格拉底则是不合适的。我在这里比较尼采的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当然，不是为了揭露他的学说的不合逻辑性。这里只有一种情况很重要，他拥有一切的"客观的"材料来把自己归入死人、颓废主义者、苏格拉底分子之列，但他不仅没有把自己列入这一范畴，而且，相反，他

① 《尼采文集》，第 3 卷，第 10 页。

庄严而又自信地把自己同它区分开来。这里表现的不是尼采一个人的特征,而是全人类的共同特征。我们中间的任何人,无论他外表怎样,都不会给自己下精神上的判决。这是不可剥夺的人类自然属性。大多数人由于各种崇高的学说而一点都没察觉这一点。尼采也是如此,当他在向瓦格纳和叔本华学习的时候,并没发现这一点。然而,在《人性,太人性的》里,他却已经认识清楚这一点了,"一个人身上是否有毒刺,要知道这一点,不是在人用脚踢他之前。妇女或者母亲也许会说,不是在人用脚踢爱人或者她的孩子之前。我们的性格更多地不是由我们的感觉,而是由我们所感觉不到的东西所决定的"。[①] 尼采本人就是这样。当情况好的时候,任何人(包括他本人)是否能够怀疑这个人呢?怀疑这个温和、软弱、善于无私地深信"毒刺"的人?或者,比如说,怀疑这个能够深信把地下室人引向两端论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人呢?这个两端论表明:要么世界存在,要么他,地下室人要喝茶。我重申,谁是否能够看着尼采,以把整个身心都贡献给科学和艺术的那种忘我精神和思想的坚定性来说,不是科学、不是艺术、不是世界、也不是人类是他的主要目的呢?在这个时刻,由于命运的安排,在尼采面前提出的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际问题:是维护他讴歌的人类文化的奇迹,或者还是他个人的、偶然的生活,此时,他是否必须拒绝自己最隐秘的理想,并且承认,如果不能拯救一个尼采的话,那么整个文化、整个世界就一钱不值呢?这个想法使得他疯狂。因为他直到死也不能够完全接受它,而且它越是拼命地折磨着他,他就越竭力摆脱

---

① 《尼采文集》,第 3 卷,第 33 页。

它，或者，至少让它依属于某种理想。这个想法因它给人们带来的毁灭感而使尼采恐惧。他感到它的虚无性是骇人听闻的，因为除了毁灭和否定，除了虚无主义以外，显然，它不能提供任何东西。然而，要摆脱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尼采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同它拼搏。我们知道，托尔斯泰伯爵曾付出过多么大的努力。以便从根本上铲除，从自己的心灵里彻底消灭利己主义的一切残余。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这样。然而，利己主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并且总是在以新的形式来提出自己的权利：它就像神话中的蛇，砍掉了一个头，又长出两个新头。尼采也是如此。他郑重地声明："你应该亲眼确信，不公平最明显地表现在：狭隘而可怜的最简单的个人生命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悄悄地，但又矢志不渝和顽强地去奋斗，并且不去争辩最崇高、伟大和丰富的权利。"[①]这些话并不像乍一看上去所能理解的那样，它们表示的不是尼采个人的观点。这里仅仅形式是独特的，而思想则是旧的，就如同世界一样。您能够说出一位哲学家或者道德家不把过分赞扬丰富和崇高的生活，贬低可怜和狭隘的生活看作是自己的职责的吗？只有在《福音书》中才说：乞丐在精神上是幸福的，但是当代的，不仅仅是当代的，而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一种存在的科学理解这句话都是很有条件的，或者，如果直率地说，根本就不能理解它，并且通常是敬而远之，就像在一些大型会议上回避那些老的、值得尊敬，但又是谁也不需要的，仅仅是请来的客人那样。大家都知道，富人在精神上是幸福的，而乞丐现在和将来永远是可怜的。尼采

---

① 《尼采文集》，第 2 卷，第 11 页。

的观点中所包含的仅仅是这一大家早就知晓的公理。他虽然奋起反抗一切,但却不仅不敢对它提出异议,反而无条件地把凤奉为信条,奉为凤仙花(noli metangere)。然而,如果他在口头上依照我们的已经根深蒂固的偏见行事,那么他却一生都在实现着完全相对立的另一原则。要知道,他本人就是一个乞丐。显然,他的确在挖掘,他的确在怀疑一切伟大、崇高和丰富的东西,这只是为了为自己可怜而贫穷的生活辩解,尽管他总是特别仔细和始终在隐藏这一动机。在1888年的一篇日记中,他自己就这样解释了《人性,太人性的》意思:"这是战争,但是,这个战争,没有火药和烟雾,没有军事行动,没有悲哀的气氛和断残的肢体——因为这一切本身仍是理想主义。这里,把错误一个一个地置于寒冰之上;理想者不是被驳斥——它冻僵了。例如,'天才'僵硬在这里;'圣者'僵硬在转角之处;'英雄'僵硬在厚厚的冰柱之下;最后,'信仰',所谓的'信念'以及'怜悯'都十分僵冷了——而在全书中,'自在之物'一直是僵硬的"。[①] 这是对《人性,太人性的》非常准确的评价。因为这不多的话语全面总结了书的两大部分,然而,同时,这仅仅是我们现在讨论"贫穷的,最简单的生活"主题,敢于怀疑一切最崇高和丰富的东西等等的合法权利的又一种形式。尼采"冷落"人们世世代代所尊重的一切,嘲笑英雄、天才、圣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在1876—1878年间,那时他身上只是勉强还保留着生命的最后余热,那时,用他自己承认的话说,他消耗掉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既对

---

① 福斯特-尼采(Förster-Nietzsche),《弗里德里希·尼采生平》(*Das Leben Friedrich Nietzsche's*),第2卷,第296页。

自己无利,也对别人无益地浪费掉了。显然,“信念”或者,如果想说的话,理论是一回事,实践却又是另一回事。记得,托尔斯泰伯爵就由于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分离而深感痛苦。他说,也许,存在着非常多的糟糕理论,如果这种观点可以成立的话。这还太不够了!我要向,是否哪怕有一种“聪明的”理论呢?哪怕是托尔斯泰伯爵,如果他在生活中一直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行事,他是否还能够是他呢?如果他真的“从自我中解脱出来”,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远离大家的视线,谁也见不到他,听不见他,他靠耕地来打发自己的日子,或者同邻里的农夫虔诚地交谈呢?要不,他如果真诚地屈从于自己的“理智”的推论,和尼采一起这样呢?然而,幸运的是,很少有人会屈从于理智的推论。在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着另一股强大的、不可扼制的力量。它控制着我们,并且嘲笑致使我们做出最没理智的举动的“意志自由”(指一般意义上的)。这一“意志”引诱尼采去指责苏格拉底。其实尼采(托尔斯泰伯爵也是这样)还有谁没指责过呢?如果这种指责不是一些空话,而具有现实意义,那么人类又会怎样呢?然而,自由的意志之所以自由仅仅是针对属于它的人而言的。只有在唯一的情况下,当它的评判不起什么作用的时候,它就会理智地放弃自己的权力。就像本能所感触到的那样,它除了灾难以外,不可能带来任何东西。

这也可以用来说明尼采评论苏格拉底和他自己时产生的矛盾。他论苏格拉底的话是一种观点。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在自己的文章里,他告诉我们,自己的生活,那种悲惨的生活。这种生活破坏了一切崇高和伟大的东西,这种生活为了保

全自己，怀疑人类的一切。这是另一回事。这里，自由的意志沉默了，这里只是勉强能听见，伴随关于“富裕生活”的评论而产生的一般声响。也许，在这种寂静之中，我们能听到一些新的话语，也许能揭示出人的真理，而不是令人厌恶的和折磨大家的人的真理。

第二十二章

这样，在尼采的文章里，我们完全不应该去寻找，尼采因回避自己心灵中自然滋生出的需求而得出的那些结论。恰恰相反，我们对待所有这一类观点也同样应该经常和彻底地加以拒绝和否定，就像否定任何不合法的要求一样。让病人和精神病患者就像一个病人和精神病人那样说话吧，让他们只去谈论对他们有意义的东西吧。看法的绝对差异（Unbedingte Verschiedenheit des Blicks）会导致恐惧和孤独的寒冷；对生活的深深猜疑更会引起可怕的后果，他这样说道。我们清楚这一切，然而我们需要尼采的仅仅是一个关于他生活的真理。主要是要知道，最终他自己竭尽全力想说出，向读者揭示出自己的痛苦秘密，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是一个"宗教大法官"一样。否则，又为什么要有序言呢？为什么要让我们确信，《人性，太人性的》，这是普通的书，在书中，一个健康的人就像好人一样在议论着客体，议论反正是大家感兴趣的东西呢？如果尼采到死也没能直率和公开地说出一切，那么只是因为同人们开诚布公地说明一切的时机还未到来。在人们的意识中，新的真理已经萌芽，但是它暂且还不被看成是真理，而是怪物，是来自我们陌生的另一世界的可怕幽灵。人们不敢直呼它的真实名称，而是用不明显的暗示、约定的符号、象征来谈它。我们看到，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多么狡猾：他的思想几乎不可能把握；甚至要追踪它都很困难；它真像鳗一样滑溜和弯曲，最终，仿佛是故意地，落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浓雾之中。尼采也是如此。需要聚精会神，用他的话说，需要那种“同情的眼光”，以便弄清楚他的文章，在混乱之中不放过那些没有根据的假说、随意的心理猜想、抒情插笔和神秘的形象。他本人也清楚这一点：他说，“难怪我过去是，也许现在仍然是一个哲学家，也就是慢速读书的老师。因为这最终使我养成了慢速写作的习惯。现在它已经不仅成为了我的习惯，而且成为了我的乐趣：什么也不写，以便不会把任何匆忙的人们引入绝境。哲学是一门令人敬重的艺术。它要求自己的崇拜者首先一点：走到一边去，给自己时间去思索、停下来、放慢动作。”[①]然而，也许，只有耐心和良好的意志是不够的。叔本华公正地指出，“无论是理解诗，还是理解历史，必要的条件就包括个人的经验，因为它就仿佛是它所用语言的词典。”这种词典在读尼采文章时某种程度上说是必须的。因为，无论其理论体系整个是什么样，他自己总是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感受，这一认识的唯一源泉：“他说，无论你怎么样，你都一定是自己经验的源泉”。[②] 不这样，显然是不可能的。虚假的体系最好也只能赋予作家的文章以优雅的仪表，然而绝对任何时候都不会给其增添必要的内容。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的思想就隐藏在暴露小说的形式之下：“请看，就是说，正如有时利己主义控制着可怜的两条腿的动物一样，常常会有

---

① 《尼采文集》，第 4 卷，第 10 页。

② 同上书，第 2 卷，第 292 页，第 293 页。

一些坏人和自私的人”。尼采毕竟不是小说家，他不可能通过像主人公这样的旁人的“嘴”来说话，他所需要的是科学理论。但是，难道就不存在接近他的新经验的那些理论吗？

只有选择的兴趣已是过去的事，而理论一定会出现。尼采研究过提出道德实用观点的实证主义，这仅仅是因为这一观点只要有一定的愿望，就能更大程度地揭示地下室思想。他可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热衷于极端的理想主义，起一个揭发者的作用。他可以抨击一切利己主义现象，也就是说出自己的“低下的”意念，并且对着自己的读者猛烈批判，就像托尔斯泰伯爵所做的那样。形式的选择一部分取决于机会，一部分取决于尼采独特的性格和心灵的那种压力，这种压力他在自己生病的最初几年就感受到了。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抨击和诅咒，所以他开始采取冷静认识的方式。然后，在自己最晚期的作品中，他已经进入了角色，并且用威严的雷神来武装自己。但是在《人性，太人性的》和《曙光》中，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一位实证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纯理性主义者，他冷静地把人类灵魂中的一切最崇高的现象降低为最低级和最简单的东西，仿佛是为了理论认识。尼采在1888年的日记中写道：“《人性，太人性的》是危机的标志。这本书被称为是一部为了自由智慧的书(ein Buch für freie Geister)：在书中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标志着胜利，在书中我摆脱了和我本性格格不入的一切。我反对任何一种理想主义；书名已经说明：在你们看到理想主义表现的地方，我看见的只有人的表现，唉！只有人的。我更好地了解人。”[①]

① 福斯特-尼采，《尼采生平》，第2卷，第296页。

显然，在1888年，比起在1876年，当他写《人性，太人性的》的时候，尼采已更大胆和更有信心。然而，直到现在，他还引那句话，他了解“人们”，就是说，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同时，《人性，太人性的》的全部内容只是来源于个人的经验：尼采只有机会确信，理想主义和他格格不入，在他的心灵里，理想追求的位置由“人性的，太人性的”动机所占据。在1876年，这一发现不仅没使他高兴，反而毁了他。要知道，当时他全身心地倾注于叔本华的学说。要知道，几乎当时他就赞颂自己的老师，感叹道：“叔本华要求牺牲自我，让自己服从于最崇高的目的，——首先是正义和仁慈。”[①]是否可以相信，他立即拒绝了“最崇高的”目的，并且承认自己的人的要求是唯一合法和公正的呢？唉！他并没走到这一步，甚至在生命垂危时，他也没能达到。在和叔本华与瓦格纳分裂的时刻，他，当然，把自己没有自我牺牲的能力看成是他一个人特有的心理组织的极大反常。在决定打着公认的学术理论的幌子，逐渐和隐蔽地谈论自己之前，他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试图使自己那颗迷途的心灵回到舍己为公的崇高学说上来。然而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越是更多地使自己相信必须拒绝自我，越是替自己描绘人类未来成就的图景，他就越痛苦、越耻辱、越伤心地想到，他赢得不了生活，他甚至丧失了促进人类未来胜利的可能。“人们将要达到自己最崇高的目的，在地球上将不再存在任何一个被侮辱的和可怜的人。真理会照耀一切和每一个人。难道这还不足以安慰你那颗可怜的心吗？难道这还不能够抵偿你的耻辱吗？忘记自己，摆脱自己，看看

---

① 《尼采文集》，第1卷，第410页。

别人，为人类未来的希望而感到欢欣，就如同古代以来的智者所教导的那样。否则，你就会再次感到渺小。否则，你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死人，而且还是精神上的死人”。这些较可怕的字眼，人只有独自一人时才会使用，并且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位最大胆的心理学家在上帝的世界上说这些话，即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尼采那颗受理想主义学说陶冶的良心却悄悄地告诫他。要知道，他出身于路德派牧师家庭，他的母亲和外婆都是传教士的女儿。您是否曾经听过或者读过德国福音教派的说教？如果听过或读过，那么您就会理解，尼采心灵里所发生的一切。人们并不曾问他，他是否能够完成向他提出的要求。人们并不曾想来充实他、教导他，对他寄予希望。只是一个威严的声音在他的头上日夜回响着，发出咒语：

> 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
>
> ossa arida，audite verbum Dei...[①]

尼采那时就明白了，他从人们那里等待不到更多的东西了。他在生活中第一次感到，什么是完全的孤独。整个世界在反对他，因此，他也反对整个世界。妥协、让步、赞同——是不可能的。因为二者必取其一：要不尼采正确，要不他的悲剧真的是那么沉重，那么骇人听闻，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应该忘记自己平时的喜怒哀乐、日常的事务和兴趣，同他一起为无辜被扼杀的年轻生命披上永恒的丧服，要不他本人应该摆脱自己，并且不加伪装而全身心地去完

---

① 《圣经旧约·以西结书》，37：4。

成以永恒智慧名义给他提出的那些要求。然而，如果不能强迫全人类去分担一位德国教授的痛苦，那么，反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企图和威胁要让这位德国教授自愿放弃自己生活的权利也是不可能的。整个世界和一个人之间彼此的冲突就这样出现了，这是两股势力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在“世界”的一方，有过去的一切悲剧，整个人类世世代代的智慧。尼采本人的良心，最后——还有显而易见的事实本身，而在尼采的一方，除了只有绝望以外，他这一方还有什么东西呢？……

在这场疯狂的和不平衡的斗争中，究竟是什么在支持着尼采呢？他从哪里得到了勇气？别说是斗争，哪怕是直接面对这种敌人看上一眼。无疑，斗争是可怕的、前所未闻的。然而不但如此，它令我们感到惊讶。在它中间是否隐藏着关于人的真理？是否隐藏着上一章结尾所说的真理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和世界一起反对尼采，人类的真理就是谎言呢？

第二十三章

这一点的实质是，尼采自己称之为的“看法的绝对差异”（unbedingte Verschiedenheit des Blicks），这一点在于，他的生活观和迄今存在的哲学观的一切形式的差异。人的理智、人的智慧、人的道德具有最终的审判权，它们对他说：你被压死了，你死了，你没救了，你没有希望了。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听见这些冷冰冰的、残酷的话。最高的、超形而上学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同平常的、普通的、从来也不看书的人的观点没有丝毫差别。叔本华、康德、斯宾诺莎、唯物主义者们、实证主义者们盯着尼采及其命运，不能对他做任何说明，为什么慢性子的白俄罗斯人对沉没的同伴说的那句著名的话：“别消耗体力，福马，沉到底去”，有着取之不尽的意义。区别只是在于，“学说”并不像白俄罗斯农夫那样直爽坦诚，除此而外，学说需要别人对自己持恭敬、感激和虔诚的态度，甚至感恩：要知道，学说给人以玄妙的或精神上的安慰！它们决不是来自这个世界，它们来自纯理智，来自纯观念（conceptio immaculata）！一切和它们不一致的，一切反对它们的，都完全属于可鄙的、不幸的、尘世的、人的“自我”。因此，哲学家们利用自己本性的崇高和天才，早就已经幸福地从“自我”中解脱出来。

尼采却感到，一切形而上学的和精神上的思想，对于他来说，

已经完全不再存在了。同时，那个受到诋毁的“自我”，却发展到了前所未闻的极大地步，它遮住了我们面前的整个世界……换一个人站在他的位置上，也许就会妥协，永远妥协。他确信，在上帝的世界上，存在着不幸，没有那些美化其他人，特别是雄辩的和激昂的善的老师的崇高美德，他也许会因此而死。然而，幸运的是，他自己在病前还来得及几次起到老师的作用，因而，在自己的过去，就已经有一些“心理学”的材料。回顾一下自己早期的一些文艺作品，它们曾得到瓦格纳和同时代的其他知名人士的赞扬，他自然应该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要知道，同其他作家相比，我并不比他们表现感激和理想更少些，我热烈而出色地宣传了善，强调真实，唱美的赞歌，——也许，我自己少年时代的作品并不比叔本华本人差。然而，命运的一个沉重打击，一件普通的蠢事，任何人，无论是世上的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可能出现的不幸，都使我突然确信，我从来在自己身上也不怀疑的那个利己主义，是我和普通的死人所特有的。是不是其他的一切老师都在伪装呢？是不是当他们在郑重地说明真理、善良、爱情、仁慈的时候，他们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庄重呢？哪些人是善意的、不知究竟，就像我曾经的那样，而哪些人也许不是善意的，是有意识的呢？是不是一切伟人和圣人，如果他们站在我的位置上，也会像我一样，很少能够用自己的真理来安慰自己呢？当他们在谈论爱情、自我牺牲、舍己为公，运用他们的一切美丽的辞藻时，就像隐藏在花丛中的蛇一样，那个该诅咒的利己主义又是怎样隐蔽着的呢？我曾突然在自己身上揭示过它，并且疯狂地和徒劳地同它斗争过。这个思想还不明晰，也许甚至还不是思想，而是本能，它决定着尼采最近探索的特点。他总的说来

还是不太坚决地冷淡理想，就如同他在1888年的一篇日记中所说的那样。在他的文章中，我们掌握了许多证明材料，说明他在独立创作的初期曾不得不产生过很多次动摇和怀疑。在这以后保存下来的文件中，有对1876年，也就是写作《人性，太人性的》的时代，所作的说明。他问自己，“怎么才能够满意那种陈旧的思想；我们所有一切活动的动机都可以归结为利己主义。”[①]显然，还不够坚定：思想对于他来说还是陈旧的，但是却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力量正在把他引向这种思想。后来，在1886年，他在回顾《曙光》的创作时说：“在这部书中，您看到地下人是怎样工作的——他怎样掘、挖、钻的。如果您的眼睛习惯于在深处辨别东西的话，您就会看见，他是如何缓慢地、小心地、温和而坚定地向前掘进，并不太流露出，他忍受着缺少阳光和空气的艰辛；也许，可以说，他满意自己在黑暗中的工作。甚至开始觉察出，他有某种信念，他有某种安慰……也许，他需要长期的黑暗，他需要自己不理解的、秘密的、猜疑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什么在等待着他：自己的早晨、自己的解救、自己的曙光。”[②]然而，信心和曙光离他还很远。有一种他心爱的思想，他那时从未抛弃过，并且把它变成许多不同的样子，这种思想表现在下面这些格言之中：“您想一下，在一切时代，任何优秀的东西在自己一方都有良心吗？科学，它已无疑是一种优秀的东西，但它长期以来都没有良心，它运用到生活中来，没有任何激情，总是秘密地、拐弯抹角地、隐藏在假面具和外罩之下，就像一个罪犯，

---

① 《尼采文集》，第11卷，第133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3页。

或者说得好一点，带着一种犯私贩应该有的那种感情。坏良心仅仅是前面一级台阶，而不是纯洁良心的反面：因为一切优秀的东西都曾经是新的，或者，是不习惯的，违反风俗的，没有道德的，并且它像一条蛆虫那样，啃着那第一个发现它的幸运者的心”。[①] 这足够说明，尼采在他的“新”道路上经受了多少次斗争、动摇、怀疑。到处都可见“人”，但他所害怕的就只是人，然而却必须同他在一起，不是由于简单的兴趣，甚至不是由于科学的求知心，他开始从事自己的地下工作：他需要长期的黑暗，他需要不理解的、秘密的、有猜疑的东西。噢，“回头”，这多么吸引他啊——回到简单的、轻松的、已构造好的世界，回到他青年时代一直生活的世界去！他多么想和“良心”妥协，重新还给自己权利：郑重宣布他同一切谈论崇高事物的导师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他的所有“回头”的道路都被堵死了：“他说，现在最坏的是能想到善与恶：这永远是一件非常有害的事，良心、善的名字、地狱，而有时甚至警察过去不允许，现在也不允许再坦白这一点；道德的存在，就像每一个政权的存在那样，不敢去想或者去议论：这里需要的是——服从！自从世界开始以来，任何一个政权也还没有自愿不同意成为批判的对象：批判道德，把它作为一个问题，作为某一种疑问，难道这意味着本身就没道德了吗？然而，道德不仅拥有各种恐吓的方法，以便吓跑无情的批评；而且它的力量和强度还更多地根植于迷惑人的、它所特有的、独特的艺术之中。因为艺术善于鼓动。道德的一个观点就足以削弱批判的意志，把它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甚至让它来反对它自

① 《尼采文集》，第 3 卷，第 49 页。

己。这样，批判者就像蝎子一样，把钩子缩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从远古时代起，道德就拥有了规劝艺术的一切方法：没有演说者不求助于它。自从地球上有人说话和规劝，道德就总是最伟大的诱惑者，至于我们，哲学家，它是我们的真正的狐媚女人"[①]……

这样，生活的一切就只是"人性，太人性的"——拯救、希望、新曙光就在于此吗？是否可以想出更离奇的观点呢？在尼采的早期文章中，他确信，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仅仅是客观真理，那时我们只有这些最早的文章，在我们给自己解释这种怪事时，把尼采看作是一个脱离实际生活的学者的普遍典型。这些人善于在从事理论工作时忘记世界、人们和生活。然而现在显而易见，尼采从来就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因为，在实证主义和新曙光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实证主义有自己的曙光、自己的希望、自己的理由；它的信念是实用道德，正是尼采老早就努力研究过的那种道德。实用主义有意不睬地下室的居民，它知道，它一点也不能够帮助他们。确实，它把人们的幸福看作自己的任务，原则上任何人也不愿拒绝生活的权利。然而，当人所谓身不由己地拒绝这一点时，实用道德没有丝毫办法，它不希望公开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就投向了理想主义的怀抱。没有经验的眼睛是看不出来的，它用别的词来代替了"人们的幸福"这个词，从表面上看这个别的词同这个词也十分相似，就是——"大多数人的幸福"。然而这种相似在这里只是表面的。"大多数人的幸福"不仅并不意味着就是"人们的幸福"，而且是截然相反。因为第二种情况是，大家都应幸福，而第一种则是，

---

① 《尼采文集》，第3卷。第4页。

少数人要为大多数人牺牲。难道实证主义有权号召人们去牺牲吗？难道它能够证明牺牲是正确的吗？要知道，它答应幸福，只是幸福，要知道，它除了幸福看不到生活的意义，而突然又冒出了牺牲！显然，在艰难的时刻，它没有理想主义的帮助是不行的；还有一点不太明显，但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实用主义任何时候都不想离开理想主义。它只是摆摆科学的架子，而在心灵深处（实用主义是有"心灵"的，谁都能够想象！）它则相信真实、善良、真理，相信直觉，相信一切崇高和神圣的词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写拉基金是"涂油的"时候，就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诋毁实证主义的信念。

然而，尼采早就已经告别了理想。"大多数人的幸福"诱惑不了他。牺牲吗？也许，他还能够被这个美丽的词鼓动起来，——但是，唉！他已经没什么可牺牲的了。他能够贡献出什么呢？自己的生命？可是，这已不是牺牲，而是自杀。为了摆脱讨厌的生活，他乐于死。但是奉献给祭坛的仅仅是丰富的赠品，痛苦的、毁坏的、扭曲的、不符合善的要求的生活。而善作为神的偶像，要求年轻的、美好的、幸福的、没接触过痛苦的生活。

第二十四章

因而，在实证主义的幌子下，尼采所致力于的完全是另外的任务。他利用实证主义、科学性是为了别的目的：有时他需要"显得"朝气蓬勃、好奇、好嘲弄人，等等；有时他需要一种患者和病人能够适应的理论，劝阻那些在他身上自然滋生出来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有的仅仅是纯心理学的意义，况且，尼采一直在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一套，只是在等待机会，以便从他的紊乱的理论中解脱出来，并且大胆地说自己的话。然而，勇气需要天才、力量，需要斗争的武器。这样，尼采过了几年。他决定首先公开宣布自己的"地下"思想。我，不过，还是认为，真正的实证主义者还是宁愿自己的图书馆中没有甚至像《人性，太人性的》和《曙光》这样的书。虽然在这些书中尼采同形而上学进行了经常的论战，他在自己的科学追求中却表现出有点失分寸的不安。实证主义的力量在于能够用沉默来回避一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它原则上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善于把我们的注意仅仅引向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那些生活方面：要知道，正是在开始出现不可调和矛盾的地方，我们的知识就够不着了。显然，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理想主义是实证主义最忠诚的同盟者。其实，著名的惠威尔[①]与密尔之

---

① 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英国哲学家，以其对物理学的介绍与兴趣为人所铭记，也是早期的科学哲学家。——译者注

争如果不是就词和科学术语之争，那么，无论如何，它所具有的理论意义是非常有限的。阿尔伯特·朗格[①]一边指责密尔，同时一边维护惠威尔和康德，只有一次向我们显示了人的癖好的例子。我再多说一点：按我看，不像朗格说的那样，是密尔，而更可能是惠威尔有点没诚意。为什么要让密尔毫无道理地去承认呢？任何其他的人物站在后者的位置上，都会找到机会挣脱，而不为那些极端的理由，众所周知，总是损坏各种理论名誉的理由，担负责任。难道康德的先验论没有陷入荒谬的境地？难道它没有导致用哲学语言来说的理论利己主义吗？难道它没有使每个人必须想起，在整个宇宙中除了他再没任何人了吗？最忠实的康德分子们也不掩饰这一点。例如，叔本华直接声称，要推翻理论利己主义是不可能的。然而，这绝不会影响他发展自己那些源于康德原则的哲学观点。他用玩笑来摆脱突然遇到的障碍。他说，理论利己主义确实是无法攻破的堡垒，然而它内部的防卫力量很弱，以至于可以不拿下它，就大胆地往前走，并且不用害怕腹背受敌。这几乎是把理想主义从威胁他的荒谬的还原理论（reductio ad absurdum）解救出来的唯一方法。另一种更加常见而可靠的方法，这就是干脆忘掉理论利己主义，“故意不理睬”它。如果密尔想采用这些方法的话，他就能够更加成功地结束自己的争论。然而密尔是个诚实的人，密尔是诚实的化身，甚至能同特别追求这一美德的德国人相媲美。而人们却给我们把他的诚实描绘成不诚实！我不知道，密尔是否

---

① 阿尔伯特·朗格（АлвБерт Ланге，1828—1875），德国哲学史家、新康德派、“回到康德去”运动主将。——译者注

曾不得不读过朗格的书，但如果读过的话，那么，可以肯定。朗格的书再一次在他的眼前肯定了这一条尽人皆知的真理：在人们那里找不到正义。

人们在哪里看见了密尔的不诚实？与康德相反，他不想承认非经验的知识，并且在现象的因果联系中，他看见的只是它们的事实、现实，而不是必须的关系。当然，密尔从来也没想过，要侵犯自然规律的不变性。但是难道千百年的经验不是不变性的可靠保障吗？其实在我们今天，谁也不会真的去怀疑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在这个时候，又为什么要求助于危险的形而上学的证明方法。形而上学恐吓着一个好的思想家。今天出现因果规律的先验性、时空的理想性，而明天在这种基础上人们开始证明先见之明、转动桌、巫术的正确——以及任何东西。密尔认为，允许先验性是哲学迈出的最冒险的一步。要知道，他的担心不是无用的：不久就证明了他是正确的。叔本华就已经利用康德关于时间的理想性的理论来解释先见之明的现象。而且要知道，他的结论在逻辑上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时间是我们认识的形式，如果因此我们仅仅只把它看作是现在、过去和将来，那么，其实会产生时间之外的东西，也就是同时（这反正一样），因而我们就有不能看清楚的过去或者未来，这不是根本不可能，而只是因为我们认识的能力是由明显的形象决定的。然而，我们认识的能力，就如同我们的整个精神组织，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出生的10亿正常人之中，逐渐可能出现脱离正常的现象。可能有这样的大脑构造，在它的支配下，人不再感受到时间的现象，也许，对于他来说，未来和过去、现在不协调，他能够预见还未发生的事件，看见为其他历史所吞没的事件。显然，结

论的逻辑推理的一致性是纯“数学的”。密尔由于诚实，如果他要承认时间的先验性，就不得不迫不得已相信预见。更糟的是，大概他甚至还未摆脱理论利己主义，不得不认定，在整个宇宙中只有他一个人存在！这样，他就有严肃的根据害怕康德的理想主义。然而这决不意味着，科学事业很少接近他的心。与康德的心相比，他不努力去肯定永恒的关于自然现象规律性的真理：他只是躲避危险的假说和冒险的论证方法。

同样，正是这一点，他的敌人提出了异议：如果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只有用经验来证明，也就是用过去的历史来证明，那么原则上，理论上，至少必须说，规律性在某个时候会有一个尽头。现在规律性还起着支配作用，但在美好的一天专断统治开始了。或者在地球上存在着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而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却没有。您不能提出任何相反的论证，因为历史观察可能有的只是有局限的、相对意义。任何一个其他人站在密尔的位置上，都会想方设法地躲开，但是密尔不能不是诚实的，他承认，我们真的没有关于明天和遥远星球的任何证明材料。简单地说，这就是今天很平静的物体不会独立地，不受外界原因的影响而运动。明天一切都可能是另外一个样，石头会跳到天上去，山会挪动地方，河流会倒流。[①] 也就是说，千百年来历史足以确信的一切，而原则上又不

---

① 我认为必须说明一下，我在用“自己的话”来解释密尔的观点。当然，密尔并没说“明天”（明天他维护实证主义），没提到运动的山和倒流的河：这一切具体的东西已经是我无疑为了用实物来说明而自己加上去的。为了避免非难，我从他的《逻辑学》中引出相应的引文：“我确信，任何人……都会不难想象，在星辰天文学把现在的宇宙分成许多部分中的一个区域里，事件可能一个按一个地意外发生，没有任何一定的规律。无论是在我们的丰富经验之中，无论是在我们的精神天性中，任何东西都不足以说明，

能否定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密尔这样或几乎这样说了，更确切些，他被迫这样说了。显然，一个好的思想家是不乐意接受这些结论的，而只有当他那颗特别发达的学者良心迫使他时，他才会这样做。同样很明显，为什么密尔一副沮丧、死人的样，当他承认这一切的时候。朗格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什么改变了密尔他平常的鲜明而平稳的精神情绪。朗格紧接着告诉读者，是这个原因——不纯洁的良心。因为密尔感到自己被逼得没有办法，又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就说出了连他自己也显然认为是不合理的结论。其实正好相反，密尔良心牺牲的不是"真理"，而是自己心灵的宁静。没有因果关系变化的可能性思想，从心灵深处来说，他是反对的。如果他哪怕有一点可能，他就会推翻它。然而理想主义者给他提供了什么呢？与转动桌前景相联系的先验性概念和对先见之明的信念吗？这样，最好的已经是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过上几千年，不讲原因地去行动(几乎是先验的因果性)。这里，第一点，别欺骗自己，而第二点，最终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利用这一观点，因为反正它实际上不会被运用并且任何人都不需要它。即便是康德本人也不会得到更多的。这样就有一个不明白的因素了，但是，我们知识的可靠性的经验主义基础是反对怀疑主义的支柱，任何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甚至是康德的，也都无法与其媲美。

(接上页注释)或者哪怕是有某种原因来相信，任何地方这都不会发生。我们初步认为(这完全可以想象)，宇宙的真正的有条不紊的时期已经结束，混乱已经降临。在这种混乱之中，事件之间没有一定的联系，并且过去不能保证未来。如果某一个人奇迹般地活下来，并且成为这种转变的见证人，那么，也许，很快就不再相信无论什么东西的一成不变，这样一成不变就会不复存在了"(《逻辑学体系》，第 3 册，第 21 章，第 1 节)。

读者看到,密尔的敌人是不诚实的。我不能够允许他们不感到理想主义的弱点。任何一个人,无论在哲学问题上有多少经验,都很清楚地知道,至今还不存在任何一个体系完全摆脱了矛盾。也许这一点不该太大声地说,但是要知道,还是叔本华就已声称,任何一个不承认先决条件的哲学都是招摇撞骗。这个秘密只有外行不清楚。而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说,简单的文学规则要求惠威尔或朗格他们让密尔安宁,不要触动他的先决条件,并且在争论中不越过明显的特征。在他们的良心上,存在着理论利己主义和先见之明——这些重大的罪孽。无论叔本华多么聪明地开着玩笑,都应该在密尔所允许的意义上原谅实证主义者们的无因果行动。要摆脱这些论断,只有用先决条件。何苦向密尔要求论据呢?而主要的是,这些要求会导致什么?总的说来,它们只能够破坏对科学的信任,也就是,破坏对简化、平静、加工、亲近现实的一切企图的信任。它们只是揭示了怀疑主义的途径。这条途径像鹰猎取食物那样,注意任何达到荒谬地步的信条。因此,由于任何东西都不能解释的理论要求,它们把一般的事情交给了只是可能存在的最危险的敌人。因为科学的主要任务,道德也是这样,在于给人们以牢固的生活基础,教他们知道,什么是有的和什么是没有的,什么是可能的和什么是不可能的。至于所采取的途径毕竟是第二位的;无论如何,途径并不是那么重要,不能为了它们而忘却基本的目的。康德主义者对这点理解得多么糟糕呵,而康德是多么清楚这一点呵!虽然他不能够不高兴和不认为自己的哲学新观点是自己的功劳,但他仍不把休谟看作自己的敌人,而是同盟者和先驱,并且高度评价了他的引证论据。而要知道,密尔对于科学来说,也

许，意义并不比休谟要小。仅仅请看，他在自己的《逻辑学体系》中，表现出了多大的耐心，运用了多少知识，或者在论功利主义的论文中，他避开了自己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暗礁，并且怎样矢志不渝地，如何用一只坚定和可靠的手把自己的学术航船引到彼岸，在那里有正确的科学，也就是，没有任何疑义，显而易见，最终就像是最高的成就，有康德和托尔斯泰的可靠性！难道这不是极大的功绩吗？难道先验论比密尔的方法具有更大的可靠性和明晰性吗？

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最终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甚至同唯物主义之争仅仅只是就措辞在争。无论争论的双方如何相互挖苦，旁观者很清楚，在实质上，它们之间是一致的，这里只是在重复一个古老的故事：自己人认不出自己人。至于尼采，仅仅是他的第一批作品就能够归入现存的哲学流派中的一个流派。从《人性，太人性的》开始，也就是，从他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时候起，他立即远离了一切体系。他从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那里找到了武器，来同唯心主义作斗争，反过来，又用唯心主义来同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作斗争，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真诚和深切希望的，就像人们所杜撰出来的一切宇宙观都将灭亡一样。被各哲学体系称之为最高和最终目的的，各流派奠基人都声称，是自己一切联系的基础的那个“牢固性”。它不仅没诱惑他，反而使他感到恐惧。对于康德、唯物主义者、密尔来说，它是需要的，因为它保障了他们那种生活观的不变，而这是他们所珍惜的。然而，尼采显然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观念：牢固性能答应他什么呢？先验性或者规律性，实证主义正是用此来诱惑我们的，但牢固性对于尼采来说就如同令

人难受的玩笑一般。他能够预见什么呢？过去的事怎么是不可挽回的呢？他怎么从来也没被医治好，最终疯了吗？这是他没有实证主义，没有科学就曾知道的。而康德的唯心主义除了宣扬绝对命令的极端道德，难道它说了别的吗？尼采过去和现在都只接近怀疑主义的语言，不是那种空泛的或者脱离实际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在玩弄文字游戏或者在建立理论。而尼采所接近的是渗透人的整个心灵并且永远把他从一般的生活轨道上驱逐出来的那种怀疑主义。“岸从我的眼中消失，无边无际的浪包围了我”，查拉图斯特拉说道。这里实证主义或者唯心主义能怎么办呢？它们以为自己的整个任务在于，使人确信，岸离得很近，以便不让他知道无限性，并为了使一切人一个样，屈服于确定的定义，成为习惯的和理解的人，把人局限在各种现象的有限范围内。在密尔看来，承认无因果行动的可能性的必要，即使是在遥远的星球，也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朗格，在康德之后，接受了先验性，只是仅仅没把自己看成能够在自然界为所欲为。然而，尼采与他们所关心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相反，他们所担心的正是尼采的希望。他的生活还起过作用，还能够起某些作用，仅仅在于这种情况：如果一切学术体系都只是自愿地自我克制胆小怕事的人类智慧。他的生活任务正是在于，超越科学和道德传统所局限他的那个区域。因此，他仇恨科学，这表现在同各个哲学体系的斗争之中；他厌恶道德，提出了“善与恶站在同一方”的公式。对于尼采来说，只存在着一个问题：“先生，你为什么抛弃我？”[①]你们明白这句普通、但却充满着无限

---

① 《尼采文集》，第4卷，第113页。

耻辱和痛苦的话吗？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回答：无论是习惯于平均和普通生活的人类科学，还是证明无过的、神化的、赞美的、受到间接的法律支持的人类道德(《十分虔诚地纪念罗斯托夫》《善就是上帝》)都是虚伪的。尼采用自己的话说：不存在任何真理的东西，一切都允许，或者要重新评价一切价值。

第二十五章

因此，尼采的哲学的特点是奇异的、与人们格格不入的。在它之中，没有稳定性，没有平衡。它根本就不去追求它们。因为它充满着矛盾，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一样。对所谓信念的牢固性，尼采不放过一个嘲笑的机会。先决条件，在叔本华看来是哲学所必需的。他不仅论证它们，而且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像平常那样去隐瞒，而在尼采那里则遭到了最恶毒和最刻薄的批判。"他说，在每一个哲学中，都有一个'信念'登上舞台的时候，或者用古老神秘剧的语言来说——驴子来了，漂亮，健壮了"(adventavit asinus, pulcher et fortissimus)[①]。然而，同这些观点一起，你们会遇到表面上与它们截然相反的观点："任何一种观点的虚伪性根本不足以反驳它的论据。因为这中间，也许，能听到我们的新语言的最奇怪的声音。问题仅仅在于，它在什么程度上鼓舞、支持生活，在什么程度上支持，也许，发展形式。因此，我们急于肯定，最虚伪的观点(综合的先验性观点属于这一类)我们是最必需的。不允许逻辑上的虚构，不把现实和虚构世界进行无条件的、永远平等的比较，不常常用数学方法来模拟世界，——人就不可能生存。拒绝虚

---

① 《尼采文集》，第7卷，第16页。

伪的观点就意味着拒绝生活、否定生活。承认虚伪是生活的基本条件，这就意味着，当然，陷入了与习惯的人类观点相违背的最危险的矛盾之中。而敢于坚持这一点的哲学正是采取了‘在善与恶的彼岸’的观点”。[①] 然而，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虚伪和虚伪的观点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如果它们促进了生命的生存，甚至发展，那么那些智者就不对了吗？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宗教大法官一样，在用虚伪冒充真理吗？这样不是更有利吗？就是只坚持传统，是指完全按过去那样，并且不追究到底什么是真理，并在这一点上不去意识那些复杂的观点，也就是承认那些先决条件、“信念”。尼采就是因为它们才想起古老的神秘剧的不恭敬语言的。既然综合的先验性观点对于人来说是如此必要，以至于没有它们就不可能生活，推翻它们就意味着否定生活，那么就让它们保持过去的真正的可敬的名称吧。这样，它们当然能够更好地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为什么要揭示出它们的虚伪性呢？为什么不把它们根植于另外的世界，如康德和托尔斯泰伯爵的观点，以便人们不仅仅相信它们的真实性，而且甚至确信，它们具有彼岸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呢？既然生活需要虚伪，那么人们就应更多地想到，这种虚伪不是虚伪，而是真理……然而，显然，吸引尼采的并不是他所关心的“生活”，而是别的东西，至少不是那种至今受到实证主义、综合的先验性观点以及它们的追随者、智慧的导师所保护的那种生活。否则他决不会几乎要到广场上去喊出哲学的职业秘密，而是恰恰相反，努力尽可能深地隐藏起它。叔本华就已经犯了方

---

① 《尼采文集》，第7卷，第12页，第13页。

法论上的错误,他宣布,没有先决条件就不可能有哲学。尼采比他更前进了一步。也就是,最终他感兴趣的决不是维护和支持他称之为“生活”的抽象字眼的问题。他所说的那种“生活”,就是许多人尽管说,但却不关心和不去想的“生活”。他知道,“生活”即便没有哲学的照料,照样存在到今天:它就是在未来也靠自己的力量就能胜任。尼采在用这种冒险的方法论证综合的先验性观点时,只是力图损坏它们的名声,为了给自己开辟研究上充分自由的道路,为了为自己赢得说出人们沉默不语的话的权利。

“查拉图斯特拉说,在那里,在下面(在人们那里),一切话都是徒劳的。在那里,人们即便看见最优秀的智慧,也能够忘记和错过。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这一点。谁想理解人们的一切,谁就应该攻击一切。”[①]在年轻时代,尼采本人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其他哲学家优秀。不是由于善良的意愿,他现在开始在别人错过的地方停住了,并且记住别人忘记的一切。“痛苦询问着原因,要满意则力图保住自己,不向回看。”[②]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痛苦都教会我们去询问。人是生活的实证主义者,他根本不需要一开始就经历神学和形而上学时期,以便对正确的哲学所介绍的认识的局限性感兴趣。相反,他在回避太聪明的东西,并且甚至他首先力图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摆脱痛苦。只有在那时,当这种正确追求的一切努力显得无益时,当他确信,不能“适应”,不能找到“痛苦”,不再纠缠自己的境地时,他就跨越了实证真理的界限,并且开始询问,不考

① 《尼采文集》,第6卷,第271页。

② 同上书,第5卷,第50页,第51页。

虑他的问题当代方法论和认识论是否允许。尼采说,“为了成为精通人类心灵的真正行家里手,我们大家都生活在相当大的危险之中: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知道追求认识的后果,另一部分人是由于寂寞,第三种人是由于习惯;我们从来也没听到命令的声音:‘认识或者去死’。在真理还没像剪刀那样来切割我们的身躯之前,我们对待它们总是轻视而克制的。真理在我们看来真像‘生有羽毛的梦’,我们可以接受或者不接受,就如同它们中间有某种东西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如同我们可以由于这些我们的真理而苏醒过来。”[①]显而易见,认识世界的范围是怎样展开的。需要一个命令的声音——“认识或者去死”,需要康德不曾提过的绝对命令。最终,需要真理像剪刀那样刺进身体,然而,这一点无论是在认识论中,无论是在逻辑学中,都不提起,一点也不论及。在那里,探索真理的过程被描绘成完全另一个样,在那里,思索是平静的、合情合理的,尽管也有点紧张,但却在没有找到探索物之前,毫无痛苦地从一个结论转到另一个结论。在尼采那里,思索就是痛苦、难受、痉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如果您记得他的长篇小说,也没有任何一个主人公按照逻辑的规则在思考:在他那里,到处都是发狂、紧张、哭泣、咬牙。哲学理论家在这一切中看到不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过度现象。斯宾诺莎说: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讽刺,而要理解(non ridere, non lugere, neque detestari, sed intelligere),他想,可以通过抽象的,或者,像人们乐意称呼的那样,客观的思考的途径来“理解”。然而,至今哲学“理解了”什么

---

① 《尼采文集》,第4卷,第311页。

呢？尼采提出了正当的疑问，斯宾诺莎介绍的和至今智慧的导师们一直实践过的方法是否真的指明了一条最可靠的或者甚至是唯一可靠的通往真理的道路呢？“也许在我们的斗争实质中存在着隐蔽的英雄行为，但是也可能在它之中没有任何神的东西，总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转来转去，就像斯宾诺莎想的那样。有意识的思维，特别是哲学思维，是最无力的，因此思索相对表现得较平静和稳定：这样正好哲学家会最容易被引向我们认识自然界的歧途……”①

然而，不仅是“哲学家”，就是我们大家，受过当代教育的人们，已经由于我们的发展条件，几乎能够正确评价自然界和我们认识的范围以及“真理”。确实，迷信一直生存在人们中间，并且不能把任何一个错误都不被认为是真理的这种时代称为是非常真实的时代。但是任何时候人们都还没有像我们今天那样，如此深深地确信他们的方法是绝对正确的。要知道，本世纪被称为是杰出(par excellence)的怀疑主义世纪。换句话说，人们认为，如果我们把什么东西看成真理，那么只能在经过最细致和仔细的研究之后，当已经不能够对它提出任何疑义的时候。即使我们想这样，但也完全不能“相信”。可是我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已经习惯“相信了”。主要是，相信最不切合实际的东西！农民的孩子或者年轻的野蛮人当然也相信老人告诉的一切。然而一般不告诉他们任何不足以信的、强迫思想的东西。例如，告诉他们，存在着妖人、树怪、妖婆。这一切是不真实的，这一切是不存在的。但是要知道这一切是可

① 《尼采文集》，第5卷，第253页。

以想像、理解的。从这些话中，年轻的思想家只会得出一个结论，存在着非常可怕和有趣的东西，他还不是必须看到它们，但也许在某个时候他将亲眼看见。我们社会的孩子是另一回事：孩子的头脑是脱离故事而自由的。孩子知道，魔鬼是不存在的，他们告诫自己的大脑别去相信这类传说，即使在他们的心灵中有好奇心。但是，还是在很小的年岁，人们就向孩子灌输了各种肯定的知识。这些知识的难以相信的程度绝对超过了最荒诞的童话作家所曾经创造的一切幻想。例如，人们用权威的语气告诉他们（用了这种语气，任何疑虑都将沉默和应该沉默），地球不是不动的。这种情况是多么显而易见的，太阳不是围绕地球转的，天不是圆的，地平线——只是一种视觉差等等，没完没了。孩子们在早年，在很早的童年就知道了所有这一切，甚至不需要最简单的地理教科书中所进行的那些描绘和证明。所有这一切都被看成是无疑问的，甚至不需要检查的真理，因为一切都来自长者，因为一切都写在书里。试问什么样的童话，甚至不是出自为人民的那些有教养的人之手的，而是出自以渔利为目的的那些文盲作者之手的，与我们传授给孩子的真理相比，包含着更多的对孩子的明显谎言呢？妖人、树怪、妖婆——这仅仅是新的东西，但是能理解的，并不反对明晰性。而转动的地球、不动的太阳、假的天空，等等——这一切要知道对孩子是最无意义的。然而这是真理，孩子知道这一点，也许要带着这不足信的真理要度过许多年。难道这种对孩子智力的强制能够不扭曲孩子的认识能力吗？难道相信荒谬的思想不能成为孩子的第二自然吗？难道最终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永远在心中乐意于把我们整个人类认为是虚伪的东西看成是真理吗？或者（如

果这个结论显得太离奇或太夸张了),既然只有它才是由清楚的论据所确定的,只有它源于学者之手或者他们的书,是不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准备相信对我们来说是足以信赖的谬论(用另一种话说,理解)呢?例如,相信叔本华的意志,康德的自在之物,斯宾诺莎的神即自然呢?我们的智慧,在童年就捕捉了许多荒谬的现象,丧失了自卫的能力,接受着一切,除了那些在童年就预先受到警告的东西,就是怪物,或者说,无因果行为。在这些行为中,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不被任何东西迷惑,无论是花言巧语、灵感,还是逻辑推理。但是既然没有怪事,那么一切都过得去。但例如,现代人又怎样"理解""世界的自然发展"这些话呢?请忘一会儿,只一分钟,如果只要这是可以的,请忘记自己的"学派",这样您立即就会确信,世界的发展是太不自然了:如果要不是存在任何东西,无论是世界,还是发展都不存在的话,也许会自然。然而,在当代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非常坚定地相信自然性的原理,就像一位笃信教规的天主教徒相信教皇的绝对正确一样。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主教徒还是可以用什么方法加以说服的,而当代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世界是不自然地发展的思想,也许,不会同意,自然界的随意性,密尔说的无因果行为,涉及的不仅仅是指出我们认识的界限。对于当代人,就像对于密尔和康德那样,这是真理,在它之外不仅不可能有思想,而且不可能有生活。谁要是摆脱了它,谁就要按照大家的意志受到现存惩罚中最可怕的惩罚:永远地徒劳无益。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保卫者在维护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呵!谁还有足够的勇气同它较量呢?一个普通的人,仅仅只是一个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建立这样的奇功,公开宣告:没有任何真理,

一切都是允许的呢？是否需要他在作出这一举动之前不再是人了呢？是否需要他在自己身上去寻找另外的、还不清楚的、没感觉过的力量，我们至今忽视、害怕的力量呢？请听一下尼采的祷告，您就会哪怕是部分地理解，信念是如何在我们的心中诞生，什么意味着走自己的道路，用自己的观点看生活："噢，上天，请让我疯狂吧！只有疯狂，我最终才能相信自己。请赐给我谵语和痉挛、突然的光明和突然的黑暗。把我抛进任何一个死人都没体验过的冷与热中去吧。请用神秘的声响和境地来吓唬我吧，让我哀号、尖叫、爬行，就像动物那样。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到对自己的信心。疑问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消除了规则，规则恐吓着我，就像尸体在威吓着一个活人；如果我不比规则强大，那么要知道我是人们中间最受蔑视的一个。我身上产生出的新的精神——如果不是从您那里来，又能从哪呢？请向我证明，我是您的——只要有疯狂就可以向我证明这一点。"[①]

---

① 《尼采文集》，第 4 卷，第 23 页。

第二十六章

尼采的祷告被听见了：上天赐给了他疯狂。当他一次独自一人在瑞士的恩加丁[1]山地散步时，突然，就真像一道闪电，“永远轮回”的思想令他感到吃惊。从这一时刻起，他的创作特点完全变了。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那个胆小和谨慎地，在与他格格不入的理论的掩盖下，挖掘通常的信念的地下室人。查拉图斯特拉相信自己的预言使命，敢于用自己的观点来反对一切人的观点，他在对我们说话。然而，奇怪的是，虽然尼采在永远轮回的思想中看见了自己新的世界观的开端和源泉，但是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详细和明确地展开它。几次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开始谈论它，但是每一次大概都是说了一半就终止了谈话。这样在头脑中不由自主地会产生怀疑，“永远轮回”最终只不过是尼采所感受到的突然的心灵冲动的不完全和不充分的表述。何况这是可以设想的，思想本身——是旧的了，并不属于尼采。毕达哥拉斯的信徒已经说过它了，而尼采，古典哲学的专家，当然不能够不了解这一点。显而易见，对于尼采来说，与古人相比，它具有另外的意义。因为他能够把它同另一些希望联系起来。准确地说，永远轮回的

① 恩加丁，瑞士的音河上游河谷的名称，长约100公里。——译者注

诺言能够给他的生活提供什么新思想呢？他确信，他的生活就像以前的生活一样，它充满着恐惧，已经无数次地重复过了，以后，同样还要无数次地，没有一点变化地重复下去。他从这种信念中能够汲取什么呢？如果毕达哥拉斯派所说的和尼采在“永远轮回”中所见的只是完全一样，那么又怎么能带给他一点新的希望呢！相反，既然“永远轮回”给了他新的力量，那么，也许，它答应了他某种别的东西，它不同于现实中已经有的那种简单的重复。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思想对于尼采来说，首先是标志着反对当今占统治地位的认识论，及其关于一个人在世上的作用和意义的实际结论。它并没表达出尼采所想的一切。因此，尽管他把自己称之为“永远轮回”的导师，除了轮回以外，他随意传授着一切，但他拒绝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晚期思想”。显然，面对千百年来的偏见或者人们的信念，即便是“疯狂”，也没有勇气彻底开诚布公，这里有一段查拉图斯特拉与生命的对话就是明证：“……生命用心地向后看看，又向周围看看，并且温柔地说：‘查拉图斯特拉哟，你对于我，你的真心还不足！你并不如你所说那样地爱我；我知道你想即刻要离开我！有一只古老的、沉重的、轰响的钟：它在夜间震响了你的洞府。当你听见这钟在夜中敲击着时辰，于是你在子时至亥时之间思想——哦，查拉图斯特拉哟，我知道你想即刻要离开我了！’‘是呀，’我踌躇着回答，‘但你也知道——’，于是我在她的耳边低声说了一些话，在她的纷乱的、黝黑的、愚蠢的卷发覆压着的耳边。‘哦，查拉图斯特拉哟，你知道那么，那没有人知道——’我们互相凝视，又眺望着冷森的夜所笼罩着的碧绿的草地，且相对哭泣。于

是生命对于我更亲爱了,比以前我对于智慧的爱更亲爱。”[1]查拉图斯特拉对生命低声说了些什么呢?这一秘密除了查拉图斯特拉之外,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了,这是什么秘密呢?显然,它和“永远轮回”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它很少是抽象的和无内容的。生命折磨得查拉图斯特拉痛苦不堪,他想离开她,但是促使他和痛苦妥协的秘密只有他知道。他在学会更加热爱现实,而不是智慧。紧接着在与生命的对话之后,作为那首歌(“第二舞蹈之歌”)的第三部分,写着一首奇怪的,但引人的诗。显然,这首诗应该哪怕是部分地阐明了“秘密”的意思。这首诗由十二行所构成,与半夜钟的十二下撞击声相对应。

“子!

哦,人类!注意!

丑!

深夜的声音确在说什么?

寅!

‘我睡了,睡了——’

卯!

我从我的深沉的梦中醒来。

辰!

世界是深沉了,

巳!

---

①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舞蹈之歌”(Das andere Tanzlied)。

深于白日之所能知。

午！

它的悲痛是深沉的——

未！

快乐仍深于悲痛！

申！

悲痛说：因此！去吧！

酉！

但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

戌！

要求深沉的永恒！

亥！”

显然，在“永远轮回”中，实际上起作用的不是被修饰的词，而是修饰词，也就是说，不是“轮回”，而是“永远”。无论痛苦多么深沉，它应该走开并让位于永久的欢乐。白日（指密尔和康德）不善于评论世界的深沉。查拉图斯特拉与生命低声谈的那个秘密是否在于此，这是否是他第一次说出永远轮回思想的时候，他“在海拔6000英尺的高峰上并且还高于一切人类思想”的时候，他就知道的呢？让我们先不谈尼采没说出的秘密的答案。因为，如果他不说，那么，他会有自己的道理；有一些事情，可以去想，但除了象征和暗示以外，不能说出来。至少当我们接受密尔的无因果行为只是为了遥远的星球或者是为了更遥远的未来的时候，当白日在评论世界的时候，现在不能说出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我

们遇到一系列想一下子通过智慧的力量摆脱当代理论控制的企图。例如,我指出,这本书第二部分中所包含的查拉图斯特拉的话("大宁静的时刻"),或者第三部分中的"新痊愈者","七印记",等等。然而,显然即便是尼采本人也还远远不习惯于自己的新半夜现实。他,这个前辈的继承人,能够只要一会儿就脱离实证主义所习惯的氛围。对于他来说,在被称之为可知世界范围内的生命,无论怎样吸引他,都还不是"正常的"生命。每次当他脚下的基础失去的时候,一种神秘的恐惧就控制了他: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他是否看见了新现实,或者他只是做了一些奇怪的梦。所以,他常常面临悲剧的二者择一:一方面是正确的,但被毁灭了的、无内容的现实;另一方面是新生活,它诱人、有希望,但吓人,就真像鬼魂。无疑,他常常在选择道路上动摇,时而他用可怕的咒语唤起自己的"最后的思想",时而他完全陷入漠不关心的境地,几乎是神志不清,以便摆脱特别的心灵紧张,而休息一下。在当代文学中,您找不到一位作家,像您在尼采身上看到的那样,会有那么快的情绪变化:几乎就在同一分钟,您会发现,他处在截然相反的人类思想的两极……

里尔教授公正地指出,尼采并不是教师。他的著作没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稳定的和不变的规则来引导学生。他本人就常常做实验,在自己身上实验。他有时认为,我们的生活只是在"实验已知的东西"。难道哲学只是为了"学生"而存在的吗?当然,青年,"青年一代",就如我们在古时候就说的那样,需要指点,需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但是没有必要带着这个问题去找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托尔斯泰伯爵,就是没有必要去找那些脱离一般生活轨道

的人们。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别的依据，那么要反对他们，就像反对教师那样，仅他们本人信念的不稳定性就足以说明了。如果他们本人都不能替明天作保，又怎能把年轻人的心灵托付给他们呢？例如，托尔斯泰伯爵如此郑重地颂扬了列文的家庭生活，但过了几年以后，在写了《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又写了《伊凡·伊里奇之死》，而后又写成《克莱采奏鸣曲》。列文的婚姻和家庭的故事是一个方面，而伊凡·伊里奇和波兹内舍夫的又是另一个方面。要知道，最终虽是同样的"故事"，只能用不同的方式在叙述，说明，或者，如果想的话，在评价。为了确信这一点，只要读一下《安娜·卡列尼娜》和《克莱采奏鸣曲》就足够了。列文和吉提的关系同波兹内舍夫和妻子的关系完全一样，这是不可能有怀疑的。但是列文的家庭生活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典范的生活，而波兹内舍夫却这样谈论自己："我们像猪一样在生活"。为什么在列文的故事中省去了在波兹内舍夫的故事中所强调的东西呢？……学生能够向托尔斯泰伯爵这类老师学到什么呢？……总之，人只要一次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就已经不适合当老师了。因为随时间变化的信念一钱不值。要知道，信念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保证能永远立住脚。信念不需证明，而只要接受，如果不能全部，那么哪怕是部分地信以为真，只能相信那些毫不动摇的东西，至少在我们的眼前没发生动摇的东西。一位真正的教师，一个具有一颗平静的良心，可以被看成是青年领袖的人，应该首先善于给自己的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永恒的"原则。这些原则适合于任何年龄，任何情况。这样的老师任何时候都不会绝迹，这样的教师很多。"青年一代"一般都向他们求学、求教，从他们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甚至何况，

这些老师善于使自己的学生免于由接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或托尔斯泰伯爵这类作家而产生的危险。请看一下文学史的教材，德国人对自己的歌德干了些什么！从现在的解释来看，甚至一个少年都不害怕落入“浮士德”之手。然而，从“教学”的观点来看，难道还可能有更有害的和更没道德的作品吗？托尔斯泰伯爵在《什么是艺术》中批驳歌德绝不是没意义的！确实，浮士德需要什么呢？他度过了漫长的、诚实而又艰难的生活，他赢得了人民的敬重。学生从四面八方来找他。他可以向他们灌输善的思想，传授那些尽管有局限，但是有益的知识。这些知识，他是通过长年的辛勤劳动才获得的。显然他为自己的高龄感到高兴，而他又不满足，同魔鬼打交道，并为了甘泪卿他向人类的敌人出卖了灵魂。这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用简单的语言说，这意味着：人老心不老，风流胜年少。我感到奇怪的只是，托尔斯泰伯爵提及“浮士德”时并未想起这个出色的俄罗斯谚语。他的心爱的谈话者，“聪明的农夫”，大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这些观点来看，瓦格纳[①]要比浮士德高明和道德得多，然而在歌德那里他却显得是一个可笑的蠢人。这仅仅是因为他，正如密尔和康德所教导的那样，局限于可知世界的范围，并且不和魔鬼打交道。请试一试，把康德的道德准则运用到浮士德身上来：如果一切人都像浮士德那样去做，放弃自己可敬的和有益的学术活动，并在白头之年开始爱上甘泪卿，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而瓦格纳就坚持了康德的原则！从密尔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看，他是对的，斯宾诺莎也不得不夸奖他。康德和歌德的

---

① 当然是指《浮士德》里的人物了。——英译本注

写作几乎是同时。然而，康德用最严厉的方式，禁止任何“永远轮回”的思想、魔鬼和甘泪卿来破坏自己的哲学宁静：它们一切都处在用智慧难理解的（或者，用一般的话说，在不可思议的）世界之中。歌德则把它们召向自己，并让瓦格纳按康德的道德方式去生活……显然，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对的，真的存在两个评判标准：一个是对一般人的，另一个是对特殊人的。尽管一些英明的俗语和哲学的学说用通常的道德来鄙视浮士德们，但他们摆脱了书斋和教育活动所给予的理想的好处，他们并没失去我们的敬重，在为自己寻找着生活。浮士德——是“利己主义者”吗？利己主义者——是最高的天性，那么自我牺牲的道德给予凡人瓦格纳了吗？

然而，我再重复一遍，至今，道德家的思想比其他任何体系都要更多地依赖于，从观察外部人际关系中所得到的全部“先决条件”。道德家在构造自己的自然发展理论时，本能地在追求局限学者们的那种观察视野。康德的绝对命令，密尔的实用主义原则只有一个任务——把人束缚在平常的、习惯的生活准则上。这些准则一般对于一切人都毫无例外是合适的。还是康德，还是密尔都深信，道德准则和因果律一样，是必需的、合理的且接近于每一个人的心。如果它能放弃自己的职责，那么除非在外星球的某个地方或者在无限遥远的未来（用康德的话说，在不可思议的世界），在这里，在我们的星球上，它应该被一切毫无例外的人所承认。然而，如果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希望拒绝“无因果行为”，不去在难以理解的和对我们无关紧要的范围里寻找个人意愿的足迹，而是力图揭示规律性已在地球上消失，在自己的身旁消失，那么怎么可以指望他们赞同把他们认为是自由的意志屈从于唯一对他们在世

上最憎恨的学术程序有利的一般准则呢？他们自己做的完全是另一样，就像《地下室手记》中的长着一副反动面孔的先生那样，他们开始破坏规则只是为了毁掉任何规定，这不是很自然的吗？无论是康德的洞察力，还是密尔证明的明晰性和可信性都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印象。洞察力并不能使这些人感到很奇怪，至于辩证法，即便是黑格尔本人也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哲学家面前屈服。他们在科学已达到非常和谐和一致的地球上，探寻着混乱和恣意妄为，这绝不是偶然的，甚至不是由于自己不安分的性格。因为一致与和谐在压迫着他们，他们在自然性和规律性的气氛中窒息。任何科学、任何宣传都不能把他们拴在现实上，尽管在公认的智者看来这是至今所承认的唯一的现实。他们现在还暂时相对地同"因果行为"相调和，因为表面的必要性迫使他们这样做。然而，如果随他们意志，他们早就已经移山倒海了，一点也不考虑，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会对国际贸易、航运和议会活动的极大失常构成威胁。然而这并非是他们的意愿。他们仅仅能够庆幸的是，因为因果律不是先天(a priori)注定的(这是密尔所珍惜的！如果要是地下室人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他们，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自身！)，因为甚至英明的密尔也不得不哪怕是一会儿，由于别的星球上无秩序而感到恐慌。他们暗自希望，未来的密尔们不得不在这一思想中感到更大的绝望。然而，在精神关系方面，在除了道德家的抽象规定以外，他们的自由一点也不受压迫的地方，只有他们能庆祝自己的胜利。无论康德和密尔怎样张罗，在这里，地下室人已经不再怀疑——他们的王国，充满无限多的完全未知的新机会的，不定的离奇王国。在这里，能亲眼看到奇迹在发生：在这里，昨天

还是有力的，今天就成为无力的了。在这里，昨天还是第一名的人，今天就成为最后一名了。在这里，山在移动。在这里，“圣人”向苦役犯鞠躬。在这里，天才不如凡人。在这里，密尔和康德如果仅仅是哪怕一分钟敢于离开先验论的狭小天地，并看一眼地下室的王国，他们就会丧失自己学术领域首领的地位……斯宾诺莎肯定地说，永恒性是完善的宾词，这条“公理”他看作是自己唯物主义伦理学体系的基础。地下室人的意见则不同：在他们看来，永恒性是极不完善的宾词。因此，他们在自己“重新评价价值”时，已经远远不把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的代表放在首位，——一句话，不把那些打着哲学的幌子向人类宣布，旧世界一切都合理的所有体系放在首位。

第二十七章

现在重新提出尼采提的问题是非常及时的:“怎么能够满足于那种陈腐的思想:我们一切的动机都能够归结于利己主义呢?”只有现在,当“永远轮回”的思想和浮士德的一切激烈的问题出现在我们身边时,“满足”这一词才显得已经不合适了。需要用另外的、更适当的词来替换它。显然,我们这里用了无上命令,用了人无力抵抗的绝对的无上命令,尼采是无意识的,完全没预见到他会走向何方,他走上了一条迷惘的道路。甚至,相反,他几乎确信,不会达到任何结果,他坚持“实证主义”,主要是因为他需要减少伪装,从语言的那种庄重性中解脱出来。在他认识到个人的渺小之后,这种庄重性是他最厌恶的。真是奇怪!人们常常得到警告,要反对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人们不断地得到确信,无论如何必须维护对理想的信念,然而无论是警告、还是确信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们大家都被一股不祥的力量引向前进,奔向不可知。我们是否有权在这种引力的自发性中看到未来成功的保证,是否应该因此现在在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中寻找的已不是敌人,而是陌生的朋友呢?拉斯柯尔尼科夫正确地指出:真的存在着两种道德:一种是对于凡人的,另一种是对于超人的。或者,用更清楚的,而且更富有表达力的尼采的术语——奴隶道德和老爷道德。但是这又出现一

个最现实的问题:这种或那种道德的源泉是什么。首先应该是,人的性格气质在这里是决定性的因素;奴隶或者凡人是顺从的,而老爷或超人是指挥人的。因此,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属于第二种,浮士德也是一样。可是浮士德先前并没意识到要反对"不可忍受的"生活,如果不是梅菲斯特的不幸干涉,他会这样死于从善活动的荣誉之中,他这样活到了高龄。也可以这样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一个偶然的机会破坏了他们的那种瓦格纳式的生活常态。如果一个不是经历了苦役,而另一个不是生了一场可怕的疾病,他们也领悟不到,就像大多数人领悟不到一样,他们的手脚都会戴上锁链。他们会写出善良的文章,来歌颂世界的美和顺从必然的人的崇高:他们最初的一些文章足以证实这一点。何况,读者一定记得,尼采自己承认过,每次当环境迫使他接受新"知识"时,他是多么地感到恐惧。他想按旧的方式去生活,而只有那时,当新知识像一把刀一样刺到他身上的时候,当他在自己身上听到一个威严的声音:"去认识或者去死"的时候,他才敢于睁开眼睛。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呢?为什么他的《地下室手记》只有一个腔调!在他对丽莎说的那些绝望的话中能听见多少痛苦,多少磨难的呻吟呵。浮士德也一样,在招来魔鬼之前,他规规矩矩地忍受了一切。一句话,所有这些"超人"起来反对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类道德法则的义务的束缚,他们的反对不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他们真像为主人劳动而逐渐衰老的奴隶被迫去追求自由。这并不是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是"道德的奴隶的奋起反抗",而这是用人类语言无法表达的。就是说,"性格"与这没有关系,如果存在着两种道德,那么不是凡人和超人的道德,而是习惯的道德和悲剧的道德。对陀

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术语作这样的更正是必须的。顺便说说，这种情况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对于“奴隶的”心灵的最细微之处都有惊人的了解，在他们身上赞美了心理的洞察力。尼采本人有一次曾指出，他认为自己最幸福的情景是，他不得不有些时候拥护自己未来的敌人。[①] 这样，他就了解了他们的一切“秘密”并且因此就有了同他们作斗争的强大武器。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说过这一点，但是，当然，他可能会说。真的，任何时候都还不曾出现过“善者”心理学，这种无情的现实和这两位作家在文章中所表现的是一致的。需要给尼采以公正的评价：在这方面他有时超过了自己著名的俄罗斯同伴。在尼采看来，“善”是无力的同义词，“善者”就是不强壮的，但却狡猾的爱嫉妒的人。他们敢于在一切面前都不让步，只是把自己贫困而可怜的生活迁怒于自己的敌人、“恶人”。例如，这就是尼采对于“善者”态度的一个小例子：“……他们都是凶狠的人，是体力遭到毁坏、被蠕虫蛀坏的人，这是一个巨大的、颤动的地下复仇王国，它贪婪、无边无际，暗中反对幸福的人，并且用艺术掩饰复仇，为复仇寻找借口，然而，他们什么时候将赢得自己最终的、最崇高和最伟大的胜利呢？无疑只有那时，当他们能够把自己的不幸，任何一种不幸强加于幸福者的良心时，这样，这些后者在一个美妙之日就会开始耻于自己的幸福，并开始对自己说：幸福是可耻的，地球上还有非常多的不幸”。[②]

从这些不多的话中，您立即就会听见，“奴隶心灵”的行家说了

① 《尼采文集》，第5卷，第245页。

② 同上书，第7卷，第435页。

些什么。这样出现了一个问题:幸福的、成功的、精神和体力上强大的人是否对世上那么多的不幸负有罪责！他们是否应该有责任来承担世界上现存的苦难！无疑,过去和现在人们都在把责任推给他们。只要每个人检查一下自己行为和良心的关系史,难道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没有想过,当周围还有多少人在死去的时候,幸福是可耻的吗？至于尼采本人,显然,在这方面他能够夸耀的特别是有趣的过去:“查拉图斯特拉说,你们永远送最虚弱的乞丐来求我的仁慈:送无可救治的无耻,来乞求我的悲悯。你们如果伤了我的道德之信心”。[①] 然而问题还不在这里。对于尼采来说,当他在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道德的系谱》时,关于虚弱的乞丐和无可救治的无耻,以及一切非常遥远的回忆,都已退到了后一位,并且早就已经不再打扰他了。也许,幸福者的幸福只是理论上使他感兴趣,依据是:道德家们用人类痛苦的图画使我们不堪忍受,为什么不用别的图画来对照,为什么不表明,“不幸的”人就像传染病一样,如何危害着那些在体力和精神上还强壮的人的生存呢？我感到遗憾,篇幅不允许我在这里从《道德的系谱》中的谈乞丐的文章里引上一两章。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伯爵教诲的俄国读者,不妨哪怕是稍微确信一下,辞令的力量、语调的激情,真诚能够不仅仅用于维护,我们传统上一般称之为“真理”的东西;确信一下,无论是“恶”,还是“善”都可以先使人振奋起来。如果您把托尔斯泰由于莫斯科调查所写的那篇遭到纷纷议论的文章和这里所说的尼采文章相比较,那么您就不得不承认,说眼力、激

① 《尼采文集》,第6卷,“坟墓之歌”,第162页,第163页。

情，最终、正当和公正的愤怒，在尼采的文章里不比托尔斯泰伯爵的少。然而如果可以既“痛恨”维护强者反对弱者，也同样“痛恨”维护弱者反对强者，那么，最终，真理究竟何在呢？谁“对呢”，托尔斯泰伯爵或者尼采？或者愤怒、激情、热情本身一点都不起作用，一点都不能主持公道，说明他们维护的事情谁对呢？要不，也许，强者或者弱者、善或者恶，对或者不对——这一切仅仅是托词，满怀激情的说教者们有完全另外的目的和用心呢？我们让说教折磨得够苦的了，最终，是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确实，说教者们何必把自己的愤怒带给我们呢？为什么托尔斯泰伯爵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人类的灾难呢？最终，我们是否应该也向他们提出这一切问题呢？托尔斯泰伯爵至今继续在证明，当世界上还存在许多不幸的时候，幸福是可耻的。让他向我们解释，他个人心灵世界的源泉在哪里吧！让他说明，他为什么羞于过宁静而欢悦的（这是他所喜爱的词）生活，当他周围还存在许多痛苦的时候！对于尼采，我们能够提出同样的问题，只是表面上提法不一。我们可以对他说，在指责不幸者的存在之前，自己应该成为幸福者，而在需要维护精神上的强者和体力上的健康者之前，自己首先应该在精神和体力上强壮。正是这些问题说明了，在读书时了解著者的生平是何等重要呵，也就是，要知道信念是如何“诞生的”。尼采，在 30 岁以前一直扮演着瓦格纳仆人的可怜角色（难以重复，但应该说出来，是瓦格纳的文学仆人）。从 30 岁到 44 岁，不治之症的严重而恶劣的发作使尼采痛苦不堪。从 44 岁到死，处于半失常状态的尼采来宣传反对不幸者和病人，就是反对身体残废的人！也就是同时，他又反对“善者和正义者”的卫道士！要知道，这一心

理学上的迷是值得思索的！我顺便提一下，在这一点上，就如同在许多其他点上一样，尼采的“信念”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念非常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痛恨“善者和正义者”，正如在自己的论著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他看来，他们代表的是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保皇党人。著名的、充满真正情感的涅克拉索夫的诗《在伏尔加河上》，在70年代不仅仅使得“善于独立思考的无产者”着迷，而且迷住了几乎整个俄罗斯知识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称作品“矫揉造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矫揉造作，然而涅克拉索夫的读者一般在读他的诗时，包括在读诗歌《在伏尔加河上》时，却流着真诚和纯洁的泪水！但是，正是这些怜悯的泪水，以及唤起同情的诗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在世上最痛恨的。这是真正的苦役犯、地下室人、悲剧的人的观点或者，如果愿意的话，是他们的“审美观点”。他们早就已经没有眼泪了，且他们知道，眼泪是无济于事的，而同情——是无益的。然而显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也无济于事，不仅仅是眼泪和同情——为什么要如此痛恨同情呢？显然，“恶人”也无力改变绝望的囚犯的命运——却为什么要如此厌恶“善者和正义者”呢？不仅仅是因为，善者和正义者在向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阐释自我牺牲理论时，没说服他们。错误可以原谅，何况是善意的错误，尽管为了它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别林斯基真诚地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唯一正确的并且自己因为它受了许多苦。尼采的老师们也不是别有用心地要把自己的学生引入歧途。

然而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不能和过去妥协了。他们现在在为未来而斗争。而善者和公正的人的怜悯剥夺了他们的最后希望。您一定记得，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囚犯的时候，他接收了

一位姑娘的施舍物，且长期珍藏着送给他的铜币。也许，尼采也不得不在自己的漂泊时期以感激的心情接受孩子或普通人的敬爱和同情的话语，这和我们理解的善与恶远没有关系。他拒绝对人的爱和同情，尽管它们已达到了最终原则的高度，确立了理论，并要求神权。他知道，当代知识分子能给他的不是一个铜币，而是几百个，甚至几千个，他们给他衣穿，给他火烤，给他食物吃，收留他；当他生病时，他们就像照看亲人一样，伴随着他。然而他也知道，这些关心既不是白白奉送给他的，也不是无私的施舍，最终他们需要他的不是感激——我们现在已超越了感激，而是承认，当他得到了如此多的关心和爱之后，他应该在心灵深处完全感到满足了，无论他的处境是多么艰难。在人们对自己的爱中，他应该看到最高理想的实现，也就是，人能够向生活提出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要求的实现。这个升华到理想的怜悯，就像它的献身者们一样，只能激起尼采的愤恨，尼采也只能够痛恨它。他看到，人们试图为了蝇头小利就来购买他的优先发现权。尽管他本人几乎不相信这种权利，但他不愿出卖。他鄙视、惊讶而愤怒地拒绝给他的礼物，以便能够不拒绝可能的斗争。

第二十八章

这一切说明了，为什么尼采需要地下工作，什么信念给予他忍受阳光和空气长期缺乏的力量。他本能地感到，当代世界观和习惯的道德，尽管它们依赖于所谓坚固的科学材料，但它们之所以有力量仅仅是因为人的轻信和人的软弱。他本人是“不幸的”，而且知道，怜悯，这个在道德看来唯一有救的方法，比完全漠不关心更可怕。“查拉图斯特拉说，难道怜悯不是一个钉上了热爱人的人的十字架吗？”①怜悯人就意味着承认，不能再更多地给予他任何帮助了。但是为什么不公开说出这一点来呢，为什么不跟着尼采重复：绝望的病人不应该希望成为医生呢？出于什么目的要隐瞒这一真理呢？尼采知道，“善者”怜悯不幸者只是为了他们不去思索自己的命运，不去探索，不去斗争：“现在我很明白人民寻觅道德的教师甚于一切的原因了。他们为自己寻求沉酣的睡眠，寻觅催人睡眠的麻痹的道德。在这些高超的哲人看起来，智慧便是无梦的安眠；他们不知道生命中的更高的意义”。② 当然，尼采可以平静地从这些打盹的人和他们的催眠的道德旁走过，如果他们给他安

---

① 《尼采文集》，第 6 卷，第 15 页。

② 同上书，“道德之讲坛”。

宁的话。但是我们记得，他的道德给予了他多么可怕的痛苦呵。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当自然规律，也就是疾病，使得尼采失眠且失去安宁的时候，人的规律，仿佛在故意嘲笑，则要求他安宁和睡眠，且威胁他，如果不按要求去做，照样要受到诅咒。当他完全丧失任何健康的力量时，"智慧"愿意给他提供催眠的道德，并且得到侮辱的回答。为了帮助受难者，它要求自己去歌颂和赞美。这是它的一般方式。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伊凡·卡拉马佐夫愤怒地反对"该死的善和恶"，因为它没有任何约束地竟敢要求人去牺牲。尼采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几乎重复了伊凡·卡拉马佐夫所说的话："查拉图斯特拉说：哦，我的兄弟们哟，在什么人身上隐伏着全人类未来的最大危险？那不是在善人和正义者的身上么？因为那些人的心理感到而且说出：'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善和正义；悲哉，那些仍然在追求善和正义的人们！'凡恶人所能做出的伤害，而善人的伤害却是最致命的伤害！凡愤世嫉俗者所能做出的伤害，而善人的伤害是最致命的伤害！哦，我的兄弟们哟，从前，有人看透了善人和正义者的深心，他说：'他们是法利赛人。'但人民并不理解他。善人和正义者也不能理解他；他们的心已被禁锢在他们的良心里。善人之痴愚乃是无底的伶俐。然而，这是真理，善人必须是法利赛人——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也是真理，善人必须钉死自树其德的人。"[①]穷人，"善人和正义者"！他们深信自己的真理是绝对正确的，是否能够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可怕的非难。然而这种非难已经有两千年了。

---

① 《尼采文集》，第6卷，"旧榜和新榜"。

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人看透了他们的心之后，说——他们是法利赛人。人们不理解他，这是真的。即使是现在，人们也不理解他，谁知道呢？也许，任何时候“所有的人”都将不理解。因为，用他的话说，人们不知道，创造什么。也许，那些不理解的人也不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们只说，痛苦就是这里所寻觅的那些东西呢？为什么他们用自己愚蠢的力量来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呢？或者这是“必须的”吗？然而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已不认为需要善人和正义者了（密尔们和康德们）。他们知道，只要人类有未来的话，人类的未来绝不依赖于那些已经有善和正义，在信念方面得意洋洋的人，而依赖于另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睡眠，什么是宁静，什么是欢乐，他们在斗争，在探索，抛弃了旧的理想，迎接着新的现实，无论这个现实是多么可怕和丑恶。在这里必须指出，一般对尼采学说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当代知识界习惯于道德说教透视，它在尼采所说的一切中，寻觅的仅仅是新的道德说教学说的痕迹。尼采本人也多多少少为这一点提供了依据。就像任何一个差不多的作家，也就是，向人们说话的人，他不由自主地会在某种程度上迎合读者的需要，并且在自己的观点中不仅有与读者协商的声音，而且有时还有读者决定的声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这样做的，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他感到自己与尼采相比是更紧密地与“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的。读者敏捷地和贪婪地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发现和捕捉“自己的”、熟悉的、理解的东西，而其他东西则一点也不关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那里，人们找到了道德，有的找到了新的道德，有的找到的是旧的。也许，未来几代人会像现在读歌德的作品那样，也平静地去读他们的作品。不多的阐释批

评会使查拉图斯特拉和拉斯柯尔尼科夫迎合“善人和正义者”的需要，使他们确信，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抽象的或者已经永远消失的法利赛人作斗争，而不是在同永存的日常现象(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作斗争，而日常现象是最危险的和确定不移的悲剧的人的敌人。尼采说过，当他和大家在一起时，他在想，大家究竟是为什么要去寻觅离群索居，他在想，只有独自一人时才感到自己的思想是自由的。日常现象是这样可怕：它吸引了千百万双眼睛，并威严地使一个思想家屈服于他。独居是艰难的！尼采带着痛苦的嘲笑指出：“独居，你自己会吞食自己；和大家在一起，许多人来吃你；现在——请你选择吧！”[1]但是最终不得不选择独居；它无论怎样比“寂寞”好，也就是，在许多人中间你同大家都格格不入的意识：“哦，孤寂！孤寂哟，我的家！我作为一个陌生人，生活于陌生的远方太久了，以致不能无泪回到你这里。现在你抚摸我如同母亲一样吧；现在，你如同母亲一样对我微笑！现在，你正好说‘从前如同旋风一样飞奔离开了我的是谁呀！谁在临别的时候叫出：我与孤寂同住得太久；因此我忘记了沉默！现在你知道沉默了吧？哦，查拉图斯特拉哟，我知道一切：你孤独的人，我知道你在众人中间比之与我同在更孤独！寂寞是一回事，孤独又是一回事，现在你懂得了吗？’”[2]读者现在看到尼采的任务在哪里。他承担了被善、科学和哲学所遗忘了的人的事业。我想，现在清楚了，为什么“利他主义”并不吸引尼采：在被遗忘的人们中间，利己主义和利他主

---

① 《尼采文集》，第 3 卷(2)，第 168 页。

② 同上书，第 6 卷，“归家”。

义彼此并不存在着旧的争执。甚至,它们两者都感到奇怪,它们曾经彼此敌视过,且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这真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确实怎能相信这一点,当它们两者,无论是利他主义,还是利己主义,都不得不在尘土中打滚,啃着泥土,面对必然性或者"自然发展"的当今巨怪上帝——"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而是你的",无意义地狂叫的时候。为了自然的发展!为了必然性!难道面对这种无力的上帝,利他主义比利己主义,甚至犯罪,有更多的意义吗?这里一切人为的差别正在永远地被抹掉、消除、毁灭。如果利己主义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应该抛弃它的话,那么就应该一起抛弃人,抛弃人所珍惜的一切。相反,如果我们可以无所畏惧地正视自然性,那么一个人就如同一个完整的世界,应该会去反对"必然性"。选择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尽管日常现象拒绝斗争的习惯道德,原则上肯定和向生活输入相反的观点,且竭力迫使一切人接受它通过"善人和正义者"之口说出的那些自己的原则。这些"善人和正义者"一方面是一些他们一般的代理人,各种各样的生活无保障的人和不幸者,另一方面是崇高的道德法规和理想。因此"寂寞的"、悲剧的人就不得不进行双重的斗争:一方面同"必然性",一方面同自己的同类。这些自己的同类的其他人还能够适应,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创造,他们在支持人类最可怕的敌人。因此,就产生了尼采的二项式公式:"不存在任何真理,一切都允许"。这一公式的前一部分是反对必然性和自然发展的。后一部分是反对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护"自然规律",侮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尼采不仅不力图从生活中排除一切费解的谜、秘密、艰难和痛苦,而且还在探索着这一切。在自然规律之中,在秩序和

科学之中，在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中，隐藏着不幸，而在生活的可怕之处，则预示着未来。这就是悲剧的哲学之基础：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就属于这一类，它们曾使康德感到害怕，它们被看作最危险的怪物，人们至今每一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摆脱它们……

人们常常指责尼采，他对弱者和生活无保障者的仇恨，以及他的贵族道德是有过错的。我已经指出过，任何一种道德，无论是贵族的，还是大众的，都和尼采格格不入。他的任务是站在"善与恶的一方"。他就像卡拉马佐夫一样，不接受道德的阐释和生活的辩白。然而在仇恨"弱者"方面他被认为是有错的，这些"弱者"就像他们通常的维护者，"善人和正义者"一样，令他感到厌恶。他感到厌恶的不是他们的不幸，不是他们的失败，而是同意接受"同情"，这种同情在他看来是一种安慰。他们阴谋反对生活，为的是忘记自己的不幸——这恰恰是尼采认为的最可怕的一种犯罪，是对伟大事业的一种背叛。这是他任何时候对谁都不会原谅的。他的整个学说，他的整个生活使命就在于斗争。他是否应该痛恨那些用自己的让步和胆怯不仅加强了许多且甚至无数的敌人，而且折磨着为数不多的还尚未丧失勇气的战士呢？奇怪的是：尼采的老师，叔本华，很少看重勇气，甚至不理解，它为什么在生活中会是必需的；他写道，"勇敢，其实，完全是第二位的，它仅仅是武夫的美德。在这方面，甚至动物都超过我们。例如，为什么人们会说，像狮子那样勇敢。"当然，叔本华有自己的依据这样来说：为了要具有悲观主义的倾向，但又怀抱乐观主义的信念，来写书，勇敢是不需要的。在这些事上，敏锐，善于找到美丽的比喻或者准确的修饰词，辩证

的机智才是无比高尚的品质。这些引自叔本华的话对于尼采应该是多么的奇怪，如果只有他不得不记起它们的话。“为艺术而艺术”，不论是在哲学中，还是在诗歌里，早就已不再诱惑他了：“他写道，反对以艺术为目的的斗争，永远只是反对道德化倾向的斗争，是反对屈从于道德艺术。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就是——让道德见鬼去呢！然而这还并不是说，艺术一般无目的，无思想性。简而言之，为艺术而艺术——是一条啃自己尾巴的蠕虫……如果在由悲剧艺术家所描写的恐惧和谜面前不是无所畏惧，那么他又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面对悲剧，我们心中战士在纵情狂欢；有的人习惯于痛苦，有的人寻求怜悯，——而英勇的人则在歌唱，他在经受悲剧的同时，赞美存在，悲剧作家为他一个人提供这种最甜蜜的残酷饮料”。[①] 显然，绝不是武夫一人需要勇气，人有时也不得不嫉妒动物的品质！“查拉图斯特拉问道，你们有勇敢么？你们有决心么？不是在见证人面前的勇敢，乃是即使上帝也不敢正视的鹰与隐士的勇敢？……以鹰的炯眼看透了深渊，——以鹰的利爪紧紧抓着绝壑：这才是我所谓的勇敢。”[②]查拉图斯特拉通常的伙伴是鹰和蛇：他向它们学习翱翔在云彩之中和在地上爬行，勇敢地看着太阳且不脱离大地。他好几次差一点死去，因为他常常感到绝望，感到自己承担的任务没完成，悲剧最终应该让位于日常现象！查拉图斯特拉的话带着希望和无望这种斗争的鲜明痕迹。然而尼采最终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敢于不

① 《尼采文集》，第 8 卷，第 135 页。

② 同上书，第 6 卷，第 419 页，第 420 页。

仅提出地下室人的问题，而且给它以回答。他说，“当我们敢于把我们自己认为是恶的东西变成善时，我们生命的伟大时代就开始了。”[①]这就意味着：尼采敢于把他曾称为“蛇的贪婪”而且害怕的“利己主义”看成已不是耻辱的、而是崇高的品质。这一思想还更鲜明和更彻底地表现在别一箴言里：“恐怕会使无辜者听得厌烦，我判明下面的情况：利己主义是任何贵族心灵的基础，——我指的是毫不动摇的信念。人，如‘我们’，其他一切人，按事物的最自然本性，应该对我们服从和为之牺牲。贵族认可利己主义的这一事实，并不表明这里有任何残酷性，任何暴力，任何专断，很像是由世界的规律所决定的。如果需要给利己主义寻觅一个名称，它会说：这正是正义本身”。[②]

因为这些话和尼采本人有关（这就是，它们能够有意义的原因），所以这里有点不太准确。他并不认为，利己主义，作为一个事实，不需要说明。一般来说，“利己主义”，正如我们所记得的那样，曾使得尼采非常、非常地痛苦。他曾以为利己主义是庸俗的、讨厌的，这样，因此，“贵族”一词应该用另一个词，不太漂亮的词“地下室人”来替换。何况，尼采说的关于贵族作风的一切同他本人只是间接的关系。他自己仅仅是一个“地下室人”，大概，正如读者早已确信的那样。他仅仅是通过旁边的想象来了解贵族是幸福的、是成功者、胜利者。这些完全可以由他下面所承认的来解释：“贵族出生的极大优势在于，它有力量来更好地忍受贫困。”[③]尼采以为，

① 《尼采文集》，第 7 卷，第 101 页。

② 同上书，第 265 页，第 266 页。

③ 同上书，第 4 卷，第 193 页。

装着贵族派头，他的贫困就很少会被发现。

这里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贫困毕竟是贫困，无论是什么派头。尼采所说的利己主义，不是那种平静而有信心地迎接牺牲的贵族的利己主义，而是穷人的利己主义，是乞丐的、是受折磨和侮辱的人的利己主义，甚至这种人的牺牲都遭到嫌恶。尼采的巨大的功绩完全在于，他敢于面对整个世界，捍卫贫困的“利己主义”，不是那种人们用各种社会改革来与之斗争的贫困，而是另一种贫困，为了它在未来的完美的王国里，除了怜悯、美德和理想，找不到任何东西，显然，在未来的国度里悲剧的人同样没有位置，就像在当代人的国家里一样。所谓资产阶级的道德在那里将仅仅根据“大多数人的幸福”的需要而改变。对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这类人，它将被完整地保存着，他们像过去那样，命中注定要获得闻名的禁欲主义理想和那个“美与崇高”，这一“美与崇高”压迫着地下室人的头脑 30 多年了。但是尼采不想要美德和禁欲主义，且不相信舍己为公的道德。他不是白白花了那么多时间来探索道德的说教者们的“心理学”的。他已知道，舍己为公的一切冠冕堂皇的话都是道德家和哲学家口中的假话。他说，“这是这些具有美德的人所共同的东西！”所谓美德，他们一般理解为那些保障他们在自己的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就的生活准则。尼采说，“在禁欲主义理想看来，一个哲学家能得到最高且大胆的抽象思想的最理想条件；他不能用禁欲主义理想来否定存在，相反，他用它来肯定自己的存在，只是自己的存在，完全可能，在这种程度上，肯定他大胆的思想不过是——让世界毁灭，而让哲学活着，让哲学家活着，让我活着

(pereat mundus, fiat philosophia, fiat philosophus, fiam)!”[①]……最后的一些话几乎是在逐字地翻译地下室人可怜的主人公的著名的话:“失去光明或者我没有茶喝?我说,让光明失去,而为了我有茶喝”。他是否能够在任何时候想到,他在恶冲动下抛出的使不幸的妓女目眩的话,将由著名的哲学家译成了西塞罗和贺拉斯的语言,并被作为确定最高的人类追求的实质的公式呢?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预见到,他的小人物能等待到如此伟大的荣誉,那么他,也许,就会省略《地下室手记》的注释……

① 《尼采文集》,第7卷,第143页。

第二十九章

这样一来，让世界毁灭，而让我活着，即便是整个世界完蛋，地下室人也不放弃自己的权利，并且不用它们来换取怜悯的“理想”以及当代哲学和道德专门为他准备的这类其他益处。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是可怕的真实，他敢于恐惧而羞愧地以自己小说中主人公的名义把它说出来。在尼采那里，这是新的和最伟大的“权利宣言”，为了它，他开始着手一切地下工作。尼采的残酷性就在于此。他力图把自己和人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在这方面，就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他远远地离开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导师，叔本华。众所周知，后者教导人们在生活中寻求安宁。他写道，“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用痛苦的代价。哪怕甚至是冒着痛苦的危险，来换取享乐。因为，在为了否定的东西，也许是为了虚幻的东西的同时，你要付出正确的、现实的代价。相反，总是谁为了避免苦难，而牺牲享乐，谁就能得到好处。”这些话对于叔本华的哲学以及一般的任何一种哲学来说，是特别典型的。正统的智者的思想总是把苦难看成是某种荒谬的、无思想性的、不需要的东西，从最本质上来看，无论如何应该回避它。这就是所谓生活的智慧，它是用这些话来表达的，永远都是这样对待苦难的。大多数民间俗语都把适度和仔细说成是最好的保障人幸福和平静生存的最高美德。不

要去追天上的仙鹤,只要把一只山雀弄到手。然而人类生活并不是由俗语和智者的格言来引导的,而是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那里都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它恰恰在永恒地、不倦地追求着没到手的幸福,这只道德家们总是警告我们别去追求的仙鹤。人们厌恶地避开山雀,尽管它们几乎是强行地塞到每一个人的手中来。亨利四世[1]曾幻想,每一个居民在星期日的午餐都能有一只鸡。如果居民们都把鸡看成自己的理想,只是追求宁静的生活,正如叔本华和俗语所教导的那样,牺牲“享乐”,只是为了不痛苦,也许人类的历史就不会那么触目惊心了。然而,居民们以及他们的统治者,则以另外的方式来看待生活,并且从来也不把无痛苦的生存看成是自己的理想。相反,人是由大自然所塑造的,人为了瞬间的幸福,为了幸福的幻影,愿意接受多年的苦难和伟大的不幸。在这种情况下,人往往忘记了任何盘算,任何顾虑,向前走去,走向迷雾,往往走上必然死亡的道路。真理何在,是在思想语言之中或是在实际之中呢?真的是否需要如此害怕不可知、痛苦和死亡呢?我们,受过教育的人们,从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书中汲取自己的思想,就习惯于这样去想。而普通的人却没忘记相信自己的直接动机,他知道的比最有学术水平的哲学家还多。他们究竟谁对呢?从当代正确科学的观点来看,当然,这里是不可能有问题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过苦役,了解自己的难友,也就是,那些把对苦难无所畏惧的精神引进死屋里的人们,从他们那里,他知道了另外的真理。由于苦役,他“坚信”,人的任务不在于,为马卡尔·杰

---

①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波旁王朝始祖。——译者注

渥什金哭泣，幻想在未来任何人都不将受到侮辱，而一切都是平静、欢悦和快乐的；人的任务却在于，能够接受现实及其一切可怕之处。不愿意，噢，他是多么不情愿接受这个苦役的真理呵！他开始想用虚幻的敬重来摆脱它，并重新复活旧的！然而，并不像叔本华认为的那样，不是人去追求真理，而是真理缠住了人。苦役的智慧一直驱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了许多年以后，当他已生活在远离西伯利亚的彼得堡时，生活在周围的正确的思想家中间时，这一智慧还迫使他承认自己，为自己服务。“俄罗斯人民喜爱苦难”——这不是奇谈怪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敌人所想的那样。这是真理，只是从另外的世界来的真理，而这一世界作家们遗忘了，即便是想起，也仅仅是为了转动着仇恨的眼睛说：它不应该存在。当它存在的时候，却不应该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道：别去爱假想的、幸福的人民，而要去爱不幸的、难堪的、丑恶的人民。过他们的生活吧。您能做到这一点吗？您想这样吗？您的帮助，您的一切改革家的意图——是最坏的事情。在这方面，那些“善人和正义者”看到的是些奇谈怪论。他们因预感到社会的理想和未来的人类幸福而振奋起来……

现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出现了尼采。他也来自苦役——来自地下世界，来自悲剧的领域，在那里已不存在日常现象世界中的年龄。请听一下他的声音吧，他说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说出的，也许能够，却不善于说明的东西：“查拉图斯特拉说，但我欢喜于以最大的**罪过**当作我的最大的安慰。但这些事不是为长耳朵说的。一切的话并不适于一切的嘴。这是精美而遥远的东西！不是绵羊的小蹄所能攫到。你们高人们哟，**你们以为我活着是纠正你**

们所做的错事么？或者你们以为我是为你们受苦的人们预备更妥帖的床榻？或者为你们不安的、迷路的、登山失道的人们，指示了新的和更容易的便道？否！否！第三个否！越是你们族类的更多更好的人越当死灭——因为你们的生活总当更不幸，更艰难。”必要的说明是：“一切的话并不适于一切的嘴”。[1] 地上的人想的和应该想的(他们有和必须有应该的和不应该的道德)是另一样。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则以地下人的名义来说话并且有权代表他们说话，——这当然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甚至在那些不想赞同他们观点的人中间。其实，如果即便有人提出异议，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悲剧的哲学根本不想去寻觅大家的支持与成就。它不是在同社会观念作斗争，它的真正敌人——是“自然规律”，人的观念使它感到可怕只是当人们用自己的存在来确定规律的永恒和不变时候。一个思想家无论多么勇敢，当他想到他所学会鄙视的大多数人，“所有人”，最终也许是对的时候，恐惧常常会不由地控制着他。然而，如果他的说话和写作的同行反对他，那么沉默的和过着特殊的和未经历过的秘密生活的人们就会支持他。不是那些托尔斯泰伯爵从他们那里寻求到对自己学说支持的“聪明的农夫”，而是需要重新教育、改造、培养，一句话，需要使之适应于我们理想的，不聪明的、愚蠢的和普通的人。人如果了解了生活的寓意，那么无论如何，就会按另外的理智去生活，这种理智我们无论是用清醒的社会、无论是学校、无论是拯救心灵的文学，还是进步都无法在他的眼里消除掉。他并不反对我们，他甚至还赞同我们，有时喝着我们

---

[1] 《尼采文集》，第6卷，第420页，第421页。

的茶，读着托尔斯泰伯爵为他写的故事并为之所打动，但是他已经按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了，寻求着自己的欢乐并且无所畏惧地去迎接自己的苦难。这不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罗斯人，而是任何一种人。在法国，在意大利，在德国，您能看见在俄国发生的一切。关于星期日午餐的鸡和一般幸福的理想总是由老师们、教育人的人所杜撰出来的。因此，也许，它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实现，尽管乐观主义者认为，他们的王国已不远了。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这样的老师，宣传热爱苦难，提出人们中的最优秀者应该去死，因为他们将越来越坏。他们这种老师可能出现的这一情况表明，实证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玫瑰色的希望只是孩子的幻想。任何社会改革都不会从生活中驱赶走悲剧。显然，不否定苦难的时代已经到来。苦难就像某个虚构的现实，可以像用十字架来避鬼那样，用具有魔力的话"它不该存在"来躲避它，然而却应该接受它，承认它，也许，最终能理解它，我们的科学至今善于的仅仅是回避生活中的一切恐惧，就仿佛恐惧是根本不存在似的，科学用理想来反对它，好像理想就是真正的现实性。对于"知识界"来说，一个艰难的时代来临了，起先它为苦难的人民而哭泣，呼吁正义，要求改变秩序，顺便说说，它并没有任何权利，它答应会出现另外的秩序并为自己的想法而感到高兴，它伪造艺术，撒谎，并把这看成是自己特殊的精神品德。现在，对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当然，不是由科学提出来的，——科学显然是学者们建立的，它要求的仅仅是，学者们最容易完成的东西。现在生活向我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它根本不提理想。它以费解的严肃性，用自己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们以前从未听过的事情、从未怀疑过的东

西。当说到我们将越来越坏时，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是在解释它的难以理解的语言。我们的打算并未得到证实。不是居民们星期日午餐将有鸡，而是，科学奉献给我们的一切物质和精神利益都将被剥夺。只有在那个时候，当在实证主义或唯心主义学说的好客的容身之处不再存在任何寻求解脱的，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希望之时，人们才会抛弃自己永恒的幻想，并且从那个狭小天地的半黑暗中走出来。这一半黑暗至今被称为是真实的响亮的代名词，尽管它象征着的仅仅是，保守人的天性面对的难言秘密，它又称为悲剧，所产生的是本能的恐惧。那时，也许，人们会理解，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由人性转向了残酷性，并且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奇怪的字：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教导我们温和、顺从、舍己为公。所有这一切词都是由哲学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杜撰出来的。当托尔斯泰伯爵说：请实现支配您到这来的意愿且“支配”一词是用小写字母时，我们已经知道，他追随他人，他的前辈，要求我们去实现他自己的意愿。他不加考虑地，用我们习惯的且因此不刺耳的形式来重复尼采和地下室人的话：让世界毁灭，而让我活着（pereat mundus，fiam）。对于所有的人，最终，都存在着只有这一条最后的规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高思想”）。然而“伟人”多多少少敢于说出它来，而普通人则把它消解在自己身上。规律对于一切人都只有一条。我们是否有权从多方面来发现它的力量的特征，并且因此而承认“合法的真理”属于地下室的英雄呢？难道尼采提出的权力宣言和他的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比至今充斥学术著作的那些理想和虔敬的欲望（pia desideria）有更多的东西吗？当

地下室人说，“自然规律”最使他感到耻辱时，也许他是在不公正地对待“自然规律”。嘿！要知道，它们，这些规律毕竟使得他，这个渺小的、卑鄙可耻的、大家都讨厌的人骄傲地意识到他的价值，使他确信，整个世界的价值并不比他一个地下室人更大些！

无论如何，悲剧的哲学在原则上是敌视日常普通的哲学的。凡是在日常现象说出“完”并且回头的地方，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看到了开端并且探索着。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有一个关于“最丑陋的人”的故事。它象征性地描绘了尼采个人的可怕生活。它太长了，我在这里只能够从中引些片断，但是我要告诉凡是对尼采的哲学有兴趣的读者，应该从头至尾地通读它，如可能，请读原文的。“即刻景象又变了，查拉图斯特拉走到了死亡国土。这里高耸着黑色和紫色的悬岩，没有草木，没有鸟雀的声音。那是一切动物，甚至于猛兽所绝迹的峡谷，只有一种可恶的、臃肿的、惨绿的毒蛇之种族来死在这里，当它们老惫了的时候。以此牧人们称这为‘死蛇之谷’。查拉图斯特拉又浸沉在黑暗的回忆里，因为以前他好像曾到过这样的峡谷。一种沉重压在他的心上，所以他走得缓慢了，更缓慢了，最后他站立着。但其后他睁开了眼睛，他看见了一种东西，坐在路旁，似人非人，是一种叫不出名的东西。”[①]这就是“最丑陋的人”。他离开了人们，来到这黑暗的死蛇之谷。为什么他要离开人们呢？“他们（人们）逼迫我：现在你是我的最后的逃避所。并不是他们的仇恨，并不是他们的逮捕；——唷，我嘲弄这样的逼迫，我骄傲而欢喜！自来最被逼迫的人们不都是成功

① 《尼采文集》，第6卷，第382页，第383页。

了么？越逼迫人的人越容易追随别人！但那是他们的慈悲。我为了逃避他们的慈悲，才逃来觅你。哦，查拉图斯特拉哟，保护我吧，你，我的最后的逃避所，你是唯一看出了我的人”。[①] 这种人，“死蛇之谷”的居民，来找查拉图斯特拉寻觅希望。他们需要什么呢？请往下听。最丑陋的人说：“别人但愿给我以他的安慰，他的慈悲，在言语和态度上。但为那我还不够为一个乞丐；这你很明白！我太丰富，丰富于伟大的，可怕的，最丑陋的，最不可言说的！哦，查拉图斯特拉哟，你的羞耻，使我光荣！我很困难地从慈悲之压迫中逃出，——我可以觅到现在唯一教训着慈悲是唐突、是专擅的人，——即你自己，哦，查拉图斯特拉哟！无论是上帝的慈悲，是人类的慈悲，那总是对于谦恭的袭击。不援助比去救济的道德更高贵。但现在慈悲被一切不屑的人称为道德：他们不知尊敬伟大的不幸，伟大的丑陋，伟大的失败……”[②]他们不知尊敬尊敬伟大的丑陋，伟大的不幸，伟大的失败！是这悲剧的哲学最关键的话。别把生活的全部恐惧都归入事物本身的领域，别先验地超出综合评论的范围，而要尊敬！唯心主义或者实证主义能够这样对待“丑陋”吗？当果戈理焚烧了《死魂灵》的第二部手稿时，人们说他疯了，——否则就不能挽救理想。果戈理的手稿也许会使许多不“疯”的评论家不朽，然而果戈理比写手稿时做得更对，他焚烧了自己的珍贵的手稿。理想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这样，他们需要“果戈理的伪装”，并不关心果戈理本人以及他的“伟大的失败、伟

---

① 《尼采文集》，第 6 卷，第 384 页。

② 同上书，第 385 页。

大的不幸、伟大的丑陋”。让他们永远地离开哲学领域吧！它到底对他们有什么用呢？难道他们的成就用铁路、电报、电话、消费社会以及甚至《死魂灵》的第一部，用他们促进进步，还不足以证实吗？然而哲学毕竟是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尼采的著作仅仅只说了“最丑陋的”人及其问题。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果戈理，他们本身都是最丑陋的人，没有普通的希望。他们试图在那个地方寻觅自身，在那里从未有人去探索过，在那时按一般的观念看没有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东西，除了永恒的黑暗和混乱，在那里甚至密尔本人假设过无因果行为的可能性。在那里，也许，每一个地下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那里，也许，悲剧的人们会找到他们所寻觅的东西……平常的人们不会愿意跨越这不祥的征兆，去追赶那不大可能的“也许”。然而，要知道，没有任何人去召唤他们来致力于这一事业。因此诗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喜欢惩罚吗？告诉我，你懂得什么是不可饶恕吗？

http://www.cp.com.cn


商务印书馆官方微信


ISBN 978-7-100-16627-0

定价：36.00 元